家国天下

杨恒均

目录

序言

鄢烈山

杨恒均来了。这个在文友和作家聚会场合自我介绍身份是“写博客的”人，来到了纸质出版媒体。2008 年 12 月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说：“有名的报纸没有不约过我的，有的约了七八次。我的博客虽然上不了报纸，但是改一改，还是可以的。可我就是不想改，作者的观点是不能修改的。”不想改，节选可以吗？在中国，你万事不能太较真，人家欣赏你，你还跟人家去上版权课？于是，有的报刊打声招呼从他的博客上转载文章，有篇“皇军要当你的家”就直接从网上专栏里扒了。《杂文选刊》算是很规矩的，选载他的博文一篇又一篇，都寄了样刊和稿费（这我最清楚，因为他行踪不定，委托我代收），不久前还给他搞了一个专题配写作谈。报刊不说，其实，他也不是没有印过纸质的书，而且印过不少大部头，比如“致命”三部曲（《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但那多是些间谍题材的虚构故事，影响的是那些有此偏嗜的“小众”。他这回出版的书，是面向大众的时政和社会评论文选，即便是谈父忆母述往事记见闻的散文随笔，也与当下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心心相印；换言之，他的这本博客文选，除了题材侧重公共的社会生活，目标读者也主要是关心时事而习惯于传统阅读方式的群体。

杨恒均无疑是很“自我”的人，因而大言不惭“你约稿我不写，给钱我不要，我就写博客”。只为表达，这是纯粹的写作，正是孔夫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夸饰于）人”，林妹妹所谓“我就为了我这颗心”。在 2008 年冬天的一个网志年会上，他谈起自己的博客写作缘起，“就在我母亲病危和我最六神无主的时候，我于 2007 年 4 月，在互联网上开了我的第一个博客。从此我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博客写作”。原来，他的博客写作触发于自我解脱。但是火花不能点燃水，博客之于他有很多意义，他强调的是“博客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是连接母亲、我和子孙后代的桥梁，博客是我的精神家园”。

其实，博客于他还有宗教意味上的“为己”功能，即对“人寿几何”的超越。他在为荣获“2010 腾讯博客十大致敬人物”而写的博文中说：“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迄今为止最宝贵的不是房子、车子和票子，最值得珍惜的是一种叫‘思想’的东西。那是我唯一‘生不带来，死却能带走’的东西，而我，并不想把它们带走……”

同时，杨恒均“为己”又是与“为人”统一的，这里的“为人”，就是颜之推所解的“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他不愿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带走”，他要“让思想插上翅膀”传播，证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同时，“总算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到了些微之力”。事实上，他出版这本书，也是他与网友、与社会互动的产物。他不仅在社交礼仪上有绅士风度，在博客写作上也尊重读友和“粉丝”的意愿，比如，有家长让他少用涉性比喻，以便推荐给孩子读，他就尽量采纳了。这回出书，一方面是出于网上“杨粉”的怂恿，他们说，周围还有很多人不上网，或者不习惯在网络上阅读，而他们希望这些朋友能分享杨恒均的博文，他们要杨恒均出版博文，以便他们买了选集送身边的亲友，增多共同的话题和语言。另一方面，是出版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鼓动，以致有四五家出版社的编辑说服他出书并报了选题，终于世界知识出版社签了 PASS。

杨恒均的博文有多火？他写博客时间并不长，三年多一点。其博客/微博点击量，固然没法跟女明星徐静蕾、姚晨们比，与兼有青春偶像特点的韩寒也同中相异，就严肃题材、话题而言，他的影响力是罕见的。我在凤凰网贴博客，看他的“凤凰博报”专栏是 2008-07-09开张的，到今天 2010 年 11 月 4 日上午点击量达 1912 万，评论 2957 条，而且跟帖讨论的居多。于建嵘是个研究社会问题的硬汉学者，又是一个雅兴不浅的“文艺青年”，写论文之余写小说画画，近日在微博上作世说新语式的“画家村记事”记杨恒均云：“恒均兄，小说家，名人，常有路人相识，献花签名，乐也。某会上，就有一小男生用生活费买花示爱，众似喝了陈醋。某日，邀三朋四友游小堡，见一美女捧花，急迎，接花称谢。女子伸出手来，他拿笔就在女子玉手上签上大名。女子言：您这位先生，买了花不给钱，打白条也不能写在手上啊。”这是文学创作或叫编派，故事虚实不可考但颇传神，一是表现了杨恒均粉丝众多，签名成了条件反射似的动作；二是说明其为人态度潇洒。

杨恒均的博文为什么这么火？这个现象值得研究，至少攻读新闻评论、传播学和新媒体的博士生都可以选作论文题。我觉得，最值得研究的是，他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中国社会有独立思考追求者的心弦？从他的“议题设置”及众多读者的关注，我感到在看似麻木冷漠拜金的当下，具有公共精神、关心祖国与民族命运的人并不在少数，借用鲁迅的话说，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这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

杨恒均是怎样修成的呢？顺便说一下，我不喜欢套用那部苏联“经典”小说而用“炼成”一词。我们中国人讲“修行”、“修道”，白蛇修成精也是贤淑的美妇人。杨恒均的修行，集中表述在他那篇题为《老杨日记：知识、常识、见识、胆识、赏识》的博文里，大家可以在本书里看到这篇博文，这里就不重复了。杨恒均穿行体制内外的经历，游走世界各国的阅历，是大多数写作者不可能具备的，但成就他最根本的，除了天赋的悟性，我以为是两点：一是坚守真诚善良正直的良知。他多次深情地回忆起儿时母亲朴实的教诲，“不要撒谎，不要欺负弱小，不要拿别人东西”。他说：“我直到开了第一个博客，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该回到母亲教诲的时候。”二是勤勉。不仅勤于思考，总在想事，也勤于写作，他的大部分博文都是在旅途中写就的。我曾与他同游俄罗斯，在飞机上、在旅馆里，得空他就拿出电脑开始写作了。这是事业心还是嗜好，抑或兼而有之？真令人敬佩又妒羡——对他，好像不存在“时差”

这回事。

不妨把杨恒均与韩寒、李敖、龙应台等几位有影响力的作家比较一下。韩寒在博客中写道："说到底是我们国家虽然很保守，但 G 点太多，一碰就高潮，还不允许你乱叫，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坏小子"的才气没得说，他七荤八素的调侃话语杨恒均也会说，只是"老杨头"有所收敛而已。韩寒博文有影响力的多是直接针对具体人和事的，"老杨头"则以思辨性为主，立意在于启迪民主宪政观念，主题比较宏大，虽然也是从具体事件入手。李敖以知识渊博傲视韩寒，却不知他与韩寒对大陆"国情"的感受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对民心民意的体察不可同日而语。杨恒均对大陆的体验比韩寒更多历史纵深，而李敖在知识层面也没有多少傲视杨恒均的资本，他的书本历史知识多一些，那也不过是"术业有专攻"而已；至于杨恒均行亿里路的阅历更是以不出门自诩的李敖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在大陆的语境中杨文不可能有李敖的恣肆，但杨文也没有李敖佯狂中的商业营销算计。杨恒均的博文与龙应台、林达的笔法倒有颇多相通之处。龙应台的杂文与时评是随笔写法，有较多叙事，理性融于感性之中；林达的海外题材文章，"以案说法"，借他山之石攻玉。杨恒均的博文也多有感性的叙述段落，并打通中外扩大读者视野，特别是发表在网上时贴些自拍照片，图文并茂，感染力与说服力更强。

杨恒均最可贵的是什么？有人慨叹中国当下的知识界有一种怪现状，（自我标榜的）"自由主义者"不宽容、"国学家"不儒雅、"基督徒"不谦卑。我看有些以"民主斗士"姿态出现的人，骨子里仍是划分敌我，"唯我独革"（不过把标榜"革命"改换成标榜"体制外"，将"改良主义"的旧帽子换成了"体制内思维"），以布道者口吻散布最大的恶意和仇恨。杨恒均不是这样，他欣然接受了"民主小贩"的蔑称。小贩是"个体户"，游走于街市，与"城管"斗智斗勇寻找生存与生意空间，贩卖人们需要的物品，并不可耻，何况贩卖的是"民主"？

这个"民主小贩"，与其说是态度谦卑，不如说是秉于善良和博爱。他懂得一个人需要有人赏识和加油，而也需要赏识他人，包括赏识那些比自己强和不如自己的，赏识表扬者与批评者，甚至自己的敌人。他说，在我"出离愤怒"的时候，也常常先找到爱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盯住仇恨的对象；爱与恨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你的心在哪一边，却能够决定你文字的重量。——因此，读杨恒均的博文，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为你好，即便不是"好话"，他是讲理的，而且讲的还真有那么一点儿道理。尽管，他的话未必能叫顽石点头。

杨恒均盼望着他的博文早点儿与大家说再见，为了这一天早些到来，那就让杨恒均的书广泛传播，让他讲的道理尽早成为中国人不言而喻的常识吧。杨恒均期待着，我也期待着。

2010 年 11 月 4 日 于广州

（本文作者系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名时评家、杂文家）

第一辑 家

母亲是盏灯，照亮我前行的路

夜里一定起风了，梦中我听到细雨中树枝的声响。天还没有亮，门廊那盏灯把院子里桂花树的枝叶投射到窗户上，恍惚间，我能够感觉到母亲的身影。我想开口喊，妈，你又这么早就起来了——声音没有发出，泪眼已经模糊。清明到了，那盏灯是我特意点亮的，今天，离去的亲人会归来的，有了那盏灯，早起的母亲就能够看清回家的路……

每一次听说我要回家，平时节俭的母亲总会把廊灯彻夜点亮，担心我认不出家门，又怕到处游荡的我在自家门前迷路。远游归来，疲惫的我在母亲铺好的床铺上睡得特别香甜。只是我发现，当我在外游荡时，母亲牵肠挂肚；可我回来了，母亲睡得却并不安稳。夜晚有哪怕一丁点儿的风吹草动，母亲准会比平时起得更早，蹑手蹑脚地来到我房间的窗户外。母亲怕吵醒我，更怕我醒了后不知道添加衣物就走出寝室，于是就找机会一次又一次悄无声息地来到我的窗户下，一旦听到我房间里有动静，她就会说，“老四，今天降温了，你要加一件毛衣才出来，我给你找来了一件……”

我都四十的人了，母亲还是这样无微不至。直到她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也未曾一刻放下做母亲的责任。回到母亲身边的好多个凌晨，只要我一睁开睡意蒙眬的眼，就能看到窗户外母亲那熟悉的小小身影。只是，今天我虽然能够感觉到母亲又来到了窗外，却再也看不见她老人家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姐弟在她的冰棺前陪伴了她三天。那三天，哭也好，笑也好，苦也好，累也好，我们都不愿睡觉。母亲生前是绝对不允许我们彻夜不眠的，但母亲再也不管我们了。

第三天火化前棺木被打开，我看到了母亲，她静静地躺在那里，那么小，那么冷，那么寂寞和孤独……我猛然想起，这竟然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和母亲一起，却听不到她来关心我，来嘘寒问暖，这也是第一次看到母亲安静地睡觉……我这个儿子从来不曾到母亲的窗户下细心等待，也没有悄声走进母亲的房间为她把被子盖好。每一次都是母亲来到我的床边，甚至在她得了白血病后，母亲还颤巍巍地来到我的寝室，东看看，西摸摸，仔细察看我的被褥，只要她老人家还在世上一天，她是不会让严冷的冬天把她的儿子冻坏的……是的，在我忙碌的记忆里，这还真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躺在那里的样子，如此安详、恬静却无限的孤独——而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那一刻，我想扑过去把她老人家抱住，让她感觉一次儿子的温暖和爱，却被早就站在四周守卫母亲的八个彪形大汉挡住了——母亲已经和我阴阳相隔。

当母亲化为青烟从高耸的烟囱中随风飘去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已流不出泪水，我的心在淌血，我的每一个毛孔都被悲伤填充，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哭泣。

老话说，那烧掉的只是母亲被病魔摧毁的躯体，母亲的灵魂已经飘出来，还会回来看望她最牵挂的人。于是第一个星期，我和母亲的两个孙子睡在灵位前的水泥地上，晚上不关门，她老人家的灵魂能够自由自在地飘来飘去。母亲的眼睛不好使，为此，我们点亮了每一盏灯……按照我们家乡的说法，母亲还会托梦给我们的，告诉我们她在那边的情况。于是，那

些晚上，我都在黯然伤心中强迫自己进入梦乡——只有在梦乡，我才能够再次见到我的母亲。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母亲都没有出现。我怀着思念和惆怅离开了故乡，对于我，没有母亲的故乡，只有伤心，失去了向往。

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离开家乡后，母亲的声音接连几次出现在我的梦中，那声音虽然显得有些苍老，有些疲惫，但却仍然是那么熟悉，问长问短，絮絮叨叨，是母亲的声音，只是，尽管我能够听到母亲的声音，却看不到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我想知道她在那边还好吗？白血病是否在继续摧毁她的皮肤和头发？她老人家穿着什么衣服，她还是那么冷吗……我在梦中喊道，妈，你在哪里？不要在我后面说话，让我看一下你。母亲以让我能够感觉到却听不见的声音叹息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母亲要走了，我挣扎着，使劲扭动身子搜寻母亲——终于醒来的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留下满脸的润湿。

可我知道，从今以后，母亲就在我身边，我虽然为了理想远走他乡，只要心中还有母亲伴随，他乡也就是故乡。

自从母亲得了白血病，我的世界就突然变了样，我辞去了工作，回到母亲身边，决定陪伴她老人家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但我却没有想到，那段时间却是那么艰难，使得我这个到处游荡、横冲直撞、天不怕地不怕的儿子竟然茫然无措，不但没有缓解母亲的病痛，而且差一点儿自己也迷失了方向。那段时间，一想到母亲会随时发病离开我，我就备受折磨。而且，我这才发现，哪怕我早就自认为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我其实对死亡的意义却仍然一无所知。

为了陪伴母亲走完最后这段艰难的人间路，也为了帮助我自己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开始写作记录母亲生病的长篇纪实《伴你走过人间路》。我想以此篇纪实探索家庭、社会、爱、生与死，我企盼在写作中找到慰藉和力量。我心中有一个愿望，我要和母亲一起探索和追寻：死亡会把母亲带到哪里去？又会把我引向何方？

就这样，母亲生病的前六个月，我白天和哥哥姐姐轮流陪伴在她身边，尽量让她开心，让她忘掉白血病，晚上我就一个人一边流泪一边记录下白天发生的一切，包括我的所思所想。2007 年春节是我们全家聚得最齐却也是最悲伤的一个春节。家人都很清楚，母亲所得的这种白血病是不治之症——陪伴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母亲，就要在节后的某一天永远离开我们……

2007 年春节过后，看到母亲日益衰弱的身体，看着母亲失神的眼睛，看着母亲开始出现血块的皮肤，我心如刀绞却又那么的无能为力，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把《伴你走过人间路》写下去了，至少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继续写下去。

就在我快要被死亡的恐惧摧毁的时候，母亲反而坚强了起来。一开始听到自己得了白血病，身为医生的母亲自然也知道在她那个年龄是很难挺过去的，可是一生都在和命运搏斗并把我们姐弟四个拉扯大的母亲，偏偏不信那个邪。那段时间看到我们姐弟忧愁痛苦的样子，母亲常常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死不了的！看到你们长大事业有成，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呢。

母亲的声音里充满求生的欲望和对生命的热爱。然而，那种欲望和热爱对于我们早从医生那里了解到病情的姐弟四个来说，无疑带来的是更大的悲伤和痛苦。

2007 年春节后，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要想隐瞒身为医生的母亲也愈来愈困难了。最后两个月，母亲自己已经清楚地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那时她有一半时间是清醒的，在她清醒的时候，总是拉住回来看望她的女儿、儿子、孙子和孙女的手，絮絮叨叨——母亲是在交代后事。

母亲一生没有积蓄，她常常说她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四个子女。她希望我们过得好，但母亲希望子女的“好”却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这一点是最让我惊讶的。母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权有势，荣华富贵，她只是想我们活得“好”。母亲活得“好”的标准太简单了，那就是活得快活，活得不辜负他人，活得对得起良心。多么简单的“好”，以致当今世风日下的社会，已经对这种“好”不屑一顾了。

母亲常常告诫做生意的子女“要做生意先做人”，生意做得再大，忘记了如何做人，枉活一世；她又反复嘱咐手里有点儿小权的儿子“不是自己的一分也不能拿”，否则活着就不安稳。

而最让母亲操心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母亲的断肠儿。刚参加工作时，因为工作的保密性，我曾经突然消失过好长一段时间，本来我也有办法给母亲报一个平安，可我疏忽了。后来我听哥哥姐姐说，那段时间，母亲想到了各种可能性，每天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头发都急掉了，没有少伤心……

现在最让母亲担心的还是我。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告诉母亲，我辞掉了可以让我舒舒服服过一辈子的工作，投身到一些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去，但我也告诉母亲，我喜欢现在所做的，我把它当成事业，而不是工作。我还告诉母亲，我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我计划从四十岁开始写作，写到四十五岁时，我将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也许会给我带来更多不便的道路。

这样的交谈以前也出现在我和其他至亲好友之间，结果可想而知，不是被误解，就是被数落一通，好像我已经误入歧途，不再脚踏实地。可是，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虚弱得说话都不太流利的母亲竟然连连点头，表示对我人生选择的理解。

我想，即使今天写下来，也许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不相信母亲竟然支持我走那座独木桥，不过我也不想解释了。我在想，今后我一定要面对儿子的质问，他们会问我，爸爸，为什么呢？

我该怎么回答他们呢？答案当然有很多，但我最想告诉他们的则是——因为你们的奶奶。是的，他们的奶奶，我的母亲，那个没有读过几年书的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永远在我身边，在我做出最艰难选择的时候，总是默默支持。她对人世间的认识、对民间疾苦的感受和对生命的热爱，影响我选择了一条我认为是正确的人生道路。

当母亲在交代后事的时候，我们姐弟几个总是强忍住眼泪，这些母亲不可能没有看出来，结果，一个让人惊讶的情景出现了，那就是在母亲一天一天接近死亡的时候，她也一天一天

坚强了起来，至少是在我们姐弟面前假装坚强了起来。我当然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做，正如她所说的，你们不要这样，我还没有死，你们就被死亡吓死了。

是的，死亡的恐惧快要把我吓死了。爷爷奶奶虽然也过世了，但我对他们了解不多，也没有住在一起过，母亲是我最亲近的人，也是第一个要离开我的人。母亲的病和即将到来的死亡给我的震撼不是颠覆，而是几乎粉碎了我的世界。以前我的世界里没有死亡，我现在则不得不面对死亡。

于是，我开始追寻死亡的意义。可我越是追寻死亡的意义，越是感觉到死亡毫无意义。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当时就走进了死胡同。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于《伴你走过人间路》里详细描写一个城市里的高楼和坟墓分庭抗礼、死人与活人平分秋色后不到两个月，一个叫余虹的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张背景是高楼大厦的公墓群碑的照片。不久后，余虹自杀了。而当后来读到余虹自杀前的一些思想时，我惊悚地发现，我当时和他想的几乎一模一样。我惊出一身冷汗。

是什么让我走出了当时余虹陷进去的那个困境？毫无疑问，就是母亲。一步一步陪伴我走出死亡阴影的竟然是正在急速走向死亡的母亲。母亲一再鼓励我，不要太悲伤，你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母亲鼓励了我，可母亲说着说着，目光就茫然了，她老人家宁愿一个人独自承担死亡的悲伤。去年清明过后不久，母亲走了。一想到母亲走了，我们强忍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母亲虽然被死亡带走了，但她并没有向死亡的恐惧屈服。母亲走得很平静，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她常常提到自己的母亲——我的外婆。她说，她的母亲在梦中告诉她，她们在那边都很好。母亲很小就死了父亲，母亲说，梦中外婆说，如果母亲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安心地过去吧，这样母亲就可以见到几乎没有了记忆的父亲。母亲说着，脸上会浮上一层光芒。

母亲走了，她不但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战胜了死亡的恐惧，而且，母亲被死亡带走的刹那，我突然发现，我也不再惧怕死亡。43 年前，我也惧怕这个世界，我哇哇大哭地来到这个世界，是母亲用双手和乳房让我安静下来，不久，我学会了笑，对母亲笑……

我不再惧怕死亡，因为不再惧怕那个陌生的死亡的世界，只因为我的母亲已经过去了——她老人家已经过去了，那个世界不再陌生。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母亲在那边，她会把一切都准备好。

我多么想把自己对死亡的认识讲给母亲听，我多么想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让母亲看一眼儿子多么坚强，听一听儿子的讲述。

这个清明节，我点燃一盏灯，照亮母亲回来的路……如果她就在附近，我要悄悄地告诉她：

妈妈，你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我前行的路！

母亲珍藏的报纸——谨以此文献给像我一样流浪在海外的儿女们

游荡了这么多年，从东到西，又从北到南，一年又一年，我在长大，知识在增加，世界在变小，家乡的母亲在变老。

二十一年前母亲把我送上了火车，从那以后，我一刻也没有停止地探索这个世界。二十年里，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香港，从纽约到华盛顿，从南美到南非，从伦敦到悉尼，我游荡过五十多个国家，在十几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每到一个地方，从里到外，就得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而唯一不变的是心中对母亲的思念。IP 电话卡出现后，我才有能力常常从国外给母亲打电话，电话中母亲兴奋不已的声音总能让我更加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和挑战。然而也有让我不安的地方，那就是我感觉到母亲的声音一次比一次苍老。过去两年里，母亲每次电话中总是反复叮嘱：好好在外面生活，不要担心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想着回来，回来很花钱，又对你的工作和事业不好，不要想着我……说得越来越啰唆，啰唆得让我心疼，我知道，母亲想我了。

母亲今年七十五岁。

我毅然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搁下心里的一切计划、扣下脑袋里的一切想法回国，回家去陪伴母亲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只是陪伴母亲。

从我打电话告诉母亲的那一天开始到我回到家，有两个月零八天，后来我知道，母亲放下电话后，就拿出一个小本本，然后给自己拟订了一个计划，她要为我回家做准备。那两个月里母亲把我喜欢吃的菜都准备好，把我小时候喜欢盖的被子“筒”好，还要为我准备在家里穿的衣服……这一切对于一个行动不方便、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的七十五岁的母亲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你肯定无法体会。直到我回去的前一天，母亲才自豪地告诉邻居：总算准备好了。

我回到了家。在飞机上，我很想见到母亲的时候拥抱她一下，但见面后我并没有这样做。母亲站在那里，像一只风干的劈柴，脸上的皱纹让我怎么也想不起母亲以前的样子。

母亲花了一小时一小时地准备菜，她准备的都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但是我知道，我早就不再喜欢我以前喜欢的菜。而且母亲由于眼睛看不清，味觉的变化，做的菜不是咸一碗就是淡一碗的。母亲为我准备的被子是新棉花垫的，厚厚的像席梦思，但我一点儿也不习惯，我早就用空调被和羊毛被了。我都没有说出来，我是回来陪伴母亲的。

开始两天母亲张罗来张罗去，没有时间坐下来，后来有时间坐下来了，母亲就开始啰唆了。母亲开始给我讲人生的大道理，只是这些大道理是几十年前母亲反复讲过的。后来母亲还要对照这些道理来检讨我的生活和工作，于是我开始耐心地告诉妈妈，那些道理过时了。于是母亲就会痴呆呆地坐在那里。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发现母亲由于身体特别是眼睛视力不好，做饭时不太卫生，饭菜里经常混进虫子、苍蝇。有时饭菜掉在灶台上，她就会捡进碗里，于是我婉转地告诉母亲，

我们到外面吃一点儿。母亲马上告诉我，外面吃饭不干净，假东西多。我又告诉母亲，想为她请一个保姆，母亲生气地一拐一拐在房间里噼啪噼啪地走，说她自己还可以去给人家当保姆。我无话可说。我要去逛街，母亲一定要陪着，结果我们一个上午都没有走到商场。

每当我们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母亲总以为儿子已经误入歧途，而我也开始不客气地告诉母亲，时代进步了，不要再用老眼光看东西。

和母亲在一起的下半个月，我越来越多地打断母亲的话，越来越多地感到不耐烦，但我们从来不争吵，因为每当我提高声音或者打断母亲的话，她都立刻停下来，沉默不语，眼神里有迷茫——母亲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了。

我要走前，母亲从床底下吃力地拉出一个小纸箱，打开来，取出厚厚的一叠剪报。原来我出国后，母亲开始关心国外的事情，为此她还专门订了份《参考消息》。每当她看到国外发生的一些排华辱华事件，又或者出现严重的治安问题，她就会小心地把它们剪下来，放好。她要等我回来，一起交给我。她常常说，出门在外，要小心。几天前邻居告诉我，母亲在家看到一幕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电视剧场景，在家哭了起来，第二天到处打听怎么样才能带消息到日本。而那时我正在日本讲学。

母亲吃力地把那捆剪报搬出来，好像宝贝一样交到我手里，沉甸甸的。我为难了，我不可能带这些走，何况这些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可是母亲剪这些资料下来的艰难也只有我知道，母亲看报必须使用放大镜，她一天可以看完两个版面就不错了，要剪这么大一捆资料，难度可想而知。我正在为难，这时那一捆剪报里飘落下一片纸片。我想去捡起来，没想到，母亲竟然先捡了起来。只是她并没有放进我手里的这捆剪报里，而是小心地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当我老了

“妈妈，那一张剪报是什么？给我看一下。”我问。

母亲犹豫了一下，把那张小剪报放在那一叠剪报上面，转身到厨房准备晚餐去了。

我拿起小剪报，发现是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当我老了》，旁边的日期是《参考消息》2004 年 12 月 6 日（正是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打断母亲的话，对母亲不耐烦的时候）。文章摘选自墨西哥《数字家庭》十一月号。我一口气读完这篇短文：

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儿耐心。

当我把菜汤洒到自己的衣服上时，当我忘记怎样系鞋带时，请想一想当初我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你。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早已听腻的话语，请耐心地听我说，不要打断我。你小的时候，我不得不重复那个讲过千百遍的故事，直到你进入梦乡。

当我需要你帮我洗澡时，请不要责备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千方百计哄你洗澡的情形吗？

当我对新科技和新事物不知所措时，请不要嘲笑我。想一想当初我怎样耐心地回答你的每一个“为什么”。

当我由于双腿疲劳而无法行走时，请伸出你年轻有力的手搀扶我。就像你小时候学习走路时，我扶你那样。

当我忽然忘记我们谈话的主题，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回想。其实对我来说，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能在一旁听我说，我就很满足。

当你看着老去的我，请不要悲伤。理解我，支持我，就像你刚才开始学习如何生活时我对你那样。当初我引导你走上人生路，如今请陪伴我走完最后的路。给我你的爱和耐心，我会报以感激的微笑，这微笑中凝结着我对你无限的爱。

一口气读完，我差一点儿忍不住流下眼泪。这时母亲走出来，我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母亲原本是要我带走后回到海外自己再看到这张剪报的。我随手把那篇文章放在这一捆剪报里。然后把我的箱子打开，我留下了一套昂贵的西装，才把剪报塞进去。我看到母亲特别高兴，仿佛那些剪报是护身符，又仿佛我接受了母亲的剪报，就又变成了一个好孩子。母亲一直把我送上出租车。

那捆剪报真的没有什么用处，但那篇《当我老了》的小纸片从此以后会伴随我一生……

现在这张小纸片就在我的书桌前，我把它镶在了镜框里。现在我把这文章打印出来，与像我一样的海外游子共享。在新的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给母亲打个电话，告诉她你一直想吃她老人家做的小菜……

父亲的眼泪

父亲现在年纪大了，流眼泪的时候就多了，有时还会哭出来。在我看来这些眼泪和年岁有关，很多无关痛痒的事也会弄得父亲泪流满面。人老了，就回归孩子了。然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却很少流泪。在我的印象中，我八岁时父亲哭过一次。

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有一次在外面玩耍，结果和住在街上的一个同龄玩伴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稍微占了上风。之后，我悄悄回到家里，没敢告诉父亲，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由远及近，不久就听到了叫骂声。我听出是刚刚和我打架的那个孩子的声音，心中暗暗叫苦。原来那家伙不服气，一路叫骂着冲我们家而来，还手里拿着一块砖头，身后像滚雪球似的跟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只是看热闹的孩子，后来听到他的叫骂声后，连街上的大人也跟来看热闹了。当时孩子打架，哭闹叫骂是很普通的，不可能吸引如此多观众。可是从这个和我同年的八岁的孩子嘴巴里叫喊出来的内

容却吸引了大家。我也听出来了，他没有骂我，他在叫父亲的名字，而且每叫一句，就加上一句充满童稚的恶狠狠的叫骂声：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你××！

父亲当时虽然是被管制的对象，但还是学校校长，母亲是公社（原湖北省随州市草店公社）医院妇产科医生。父亲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谨小慎微，从不敢惹事。

父亲也听到了叫骂声，他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朝外面瞅了一会儿，然后回头盯住衣衫不整的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仍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脸色阴沉沉的。这时门外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这架势，早已经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遍叫喊父亲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来越带侮辱性的形容词。不过我发现，最让父亲紧张的是"地主"、"大地主"。门外每次传进这两个词时，父亲紧紧握住门把手的手都颤抖一下。

那天父亲一直没有开门出去。两个哥哥也在家，他们都是大孩子了，他们气愤得脸都紫了。可是当他们看到父亲的表情时，他们只能紧张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足足有半个小时，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骂累了，还是被好心的邻居劝走了，外面没有了声音。

可是房间里却传出了声音，是父亲害怕邻居听到而压得低低的呜呜的哭泣声。我们兄弟几个站在那里，吓得一动也不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像孩子一样哭，我原来以为做父亲的是不会哭的。父亲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对两个哥哥说，你们的弟弟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你们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不知道我们多艰难吗？人家今后打死你们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个小地主，街上每个人都能骂我们，我们要让着所有的人，知道吗……

父亲那天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能完全记得了，但大概是让我的两个哥哥再次明白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级。父亲说得很白，他说我们是地主，我们是贱民，就是你弟弟也没有和孩子吵架与打架的权利，他还不懂，但你们今后得看住他……

父亲说了很久，而且都是对两个哥哥说的——其实父亲不必说那么久，而且我也完全懂事了。只是我无法控制一个做孩子的天性，会在外面玩耍时不知不觉间得意忘形，和小朋友闹矛盾。如果和某个知道我是小地主的人闹矛盾，而且他又喜欢使用这个武器的话，我就完蛋了，我就得被辱骂甚至被打，不能还手。父亲的哭声再次提醒了八岁的我，我是被打上烙印的。我想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后来在整个小学特别是在随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期间，我都夹着尾巴做孩子，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悲惨时，有些高年级的孩子只要喊一声"地主崽子过来"。我就会收起一个孩子的心，乖乖地过去，甚至曾经被命令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

我没有任何反抗，就在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人大义凛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丢进水井里活活淹死，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父亲是老师，他知道这些事，更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世道。有段时间我一度误解父亲，认为他太软弱，但后来我理解了他。当时作为我们这类人，压根儿就没有软弱和勇敢之分，我们根本无法和整个强权对抗。要想幸存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软弱和屈服。

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哭泣，后来我再也没有让他在我面前哭过，虽然我付出的是整个童年和一个正常人的成长环境。

父亲在我面前的哭，让我认识到我从出生就是一个弱者，是低人一等的，是被欺负和侮辱的一类。父亲的哭把我永远和弱者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哭也形成了一个八岁孩童一生的性格和人格。直到今天，就在我丰衣足食、遨游世界，时不时自认为天下老子第一的时候，我心底深处仿佛还能够听到父亲的哭泣声，那声音又时时在提醒我：你永远属于弱者，你永远和弱者站在一起，你永远不能忘记那些被侮辱和被欺负的人！

正因为父亲当我面的痛哭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常常想，等我当了父亲，我是绝对不会在孩子面前哭的。再说，估计也没有什么情况会迫使我忍不住在儿子面前哭吧。我并不知道，在自己儿子面前的哭不是演戏，是发自内心的，如果真要来，挡也挡不住的。就在我儿子铁蛋八岁的时候，我竟然在他面前忍不住流过一次眼泪……

那是七年前，我刚刚把儿子铁蛋从美国送到澳大利亚悉尼读小学二年级。儿子当时比较好动，加上在美国公立学校野惯了，一到悉尼相对环境比较好的学校，就连着闹事。当然由于成绩还可以，我也就不管了，再说，我想象不出他能闹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没想到就出了一件事。有一天，一个意大利裔的老太太通过老师找到了我们，老人英语不行，断断续续讲开了，我听了很久才闹明白，她跟儿子儿媳一起从意大利移民澳大利亚，她的孙子和我的儿子铁蛋一个班。孙子刚从意大利过来，英语还结结巴巴，加上身材比较矮小……

老太太讲着讲着眼泪就出来了，她说铁蛋是孩子头，他们不喜欢她的孙子，经常调侃他，嘲笑他讲话不流利，又跑不动，还找机会戏弄他，例如把他绊倒在地，……孩子身体不好，英语也不好，刚刚过来，被同班同学一欺负，就想起了家乡意大利……做奶奶的看着心里也难过……

老太太最后说，她专门过来求我们，希望我们让铁蛋不要欺负她孙子……

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听进了这位意大利老太太的话，因为我已经气得在发抖，我忍住没有晕过去，向老太太做了保证，把她送走了。

老太太走后，我让自己尽量镇静、镇静，再镇静，不要干傻事，不要冲动，不要犯法（打孩子）。我想慢慢对儿子铁蛋讲道理，儿子毕竟才八岁。我开始等铁蛋放学回来，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孩子回来了，我一开始还能心平气和，可是，讲着讲着就失去了控制，我的语气越来越重，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我使劲推了儿子，把他推倒在地上，他半天还爬不起来，儿子吓得连哭都忘记了。这是我儿子出生后我第一次打了他。

最后我高声喊道，你可以不读书，你可以考零分，你可以没有工作，我带你去要饭，你可以被别人欺负，但记住，永远永远不能欺负比你弱小的同学，永远永远不能欺负那些没有能力和你抗争的同伴，永远永远……没想到讲着讲着我竟然流出了眼泪，而且最后忍不住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儿子面前哭。

其实，我当时还断断续续告诉了儿子我的过去，我在小学被人欺负却不能顶嘴、更不能还手的悲惨世界。可是我知道儿子没有完全听懂，这不怪他，儿子是铁定无法了解我生活的

时代的。后来想一想那天的事，我心中也充满了后悔。那天我对八岁的儿子实在太严厉了，我因为想到了自己的过去，从而对儿子的行为感到极端愤怒。我的生气也包括了对自己的不满，由于一直和孩子缺乏交流，我最痛恨的欺负弱小的行为竟然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后来我找机会对儿子说了对不起，再等他长大点儿，我又逐渐给他讲了一些事情，我这才发现，也许儿子当时没有听懂我的话，但他记住了父亲的眼泪，也是我唯一一次在他面前流泪。

也不知道是长大了，真的懂事了，还是因为他们学校的教育，又或者真是我的眼泪起了作用，铁蛋成长为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少年，而且在某些方面，他竟然比我希望的走得更远。

由于我自己的遭遇，我从小就教铁蛋一些武术动作和踢打沙袋，他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跟随韩国来的高手练习跆拳道，六年级时候已经是少年黑带四段高手。看到铁蛋已经可以很轻松地打倒同龄人时，我想把自己做人的原则传给儿子：永远不要欺负弱小，但也永远不要放过欺负自己的那些看似强大的 Bully（专门欺负其他同学的不良学生）。儿子接受了前者，却对后者也提出了异议。儿子宣布他绝对不会用跆拳道对付同学和其他少年，不管他是弱小还是强大，最后他竟然不再练习跆拳道。在我有些生气时，他告诉了我他的原则：人家欺负你，有老师，还有警察，如果我打他们，就是我不对了，等等。

这也许是好事，儿子生活在现在，成长在一个法制的国家，离我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实在太遥远，他永远不能完全理解我在说什么，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这一代永远不用去理解我们曾经的遭遇。仅仅是理解，已经足够他们痛苦的了。

我会对儿子说，如果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就当我是在讲故事吧！

——杨恒均于父亲八十岁生日之际

每天都是父亲节

儿子给我打电话，预祝我父亲节快乐。这才想起澳洲的父亲节正是这个星期日（9 月 7 日）。全世界各国定的父亲节和母亲节好像都不是同一天。记得以前在母亲节时打越洋电话回家，母亲就会很好奇，她会说，母亲节还没有到呢。我说，妈，我不在中国，今天是这个国家的母亲节，这里又没有我的母亲，我不给你打电话给谁打呢。母亲就笑开了，喃喃地说，真好，那我要过多少个母亲节？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呀！

如果母亲还在人世的话，我会把每一天都变成母亲节。我会告诉她老人家，这个世界上有二百个国家呢，每个国家都有母亲节，剩下的一百六十五天，我为你设一百六十五个母亲节，这样儿子就可以每天给你过一个母亲节！

母亲被白血病带走了，母亲节也倏然陌生而令人心痛起来。记得以前打电话回家，一会儿妈妈把电话抢过去，一会儿爸爸把电话接过来，听到母亲数落父亲不听话，听着父亲讽刺

母亲生活过得斤斤计较，感到老两口在电话那边开怀大笑，我都能一口气和他们讲上一个多小时，可是现在，和父亲讲一会儿就找不到话题了，而每一次打电话过去，好像也总觉得应该找一个话题。以前我们还过母亲节的时候，父亲总是鼓励我们过母亲节，好像他对父亲节很不屑一顾的样子，我们也自然不太重视父亲节，有几年竟然忘记打电话了。

感谢儿子给我电话，告诉我世间还有父亲节。至于我，世间已无母亲节！

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会忘记小时围坐火炉边听他讲故事，他总能够把大道理融入小故事中；在最艰难的时候，读私塾出来的父亲总能够用他特有的方式梳理岁月，把更艰难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呈现给我们，帮我们度过现在。我更不会忘记当我参加工作后意满志得地向父亲炫耀，我现在多么威风，我的工作能够赚到多少外快的时候，父亲只是轻轻地提醒我，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而当我终于走上寻求理想的道路后，父亲又不忘及时提醒我：人，光有理想也不行。父亲一直督促我不要忘记学习，告诫我做人一定要活得明白，而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就是最能让人明白的方式。

母亲去世后，我人生的目标之一就是让父亲过得不寂寞，过得快乐，安度晚年。父亲喜欢大自然，一直对我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感到不安，他说应该去山山水水之间陶冶一下。父亲上两个月还刚刚去过河南的鸡公山和湖北的武当山旅游。他喜欢上了一个新的旅游方式，那就是到接近大自然的地方找一户农家旅馆住下来，畅游于山水之间，慢慢观赏，细细品味。这让整天奔波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我好生羡慕，好在每一次和父亲通话，他都会对我絮絮叨叨一通，把凡尘俗世中的我拉到他所在的山水之间。

我答应过父亲，等到有一天，我会把父亲走过的路都走一遍，爬过的山都爬一遍，那首歌怎么唱的？“路过你的路，苦过你的苦，感受过你的感受，爱过你的爱……”

儿子在父亲节到来之前打电话，开口就是我想你、我爱你，让我感动，更提醒了我，父亲节时给父亲打一个电话。不过，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接起父亲的电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我想你、我爱你”的字句的，我们宁肯绕东绕西啰啰唆唆说一通家长里短，问父亲身体每一个部位的状况，直到父亲感觉到儿子的关心、感激和爱为止。

我曾经后悔没有把人世间的每一天都变成母亲节，如今，世间已无母亲节，我将把人世间的每一天都变成父亲节。

每天都是父亲节。

我的老师

自从小学时开设了作文课，《我的老师》这个题目就一直是我最熟悉的，小学语文老师引导我们如何从描写熟悉的老师入手刻画人物的外貌和言谈举止。一直到初中，还在写这个题目，只是那时强调的不再是老师的外貌而是他们的内在品质。到了高中准备高考时还在练习这个作文题，而且已经背诵了很多既可以用于描写老师也可以用于描写其他人物的高尚品

质和独特个性的经典范文。

正因为这样，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好像突然穿越时空，回到了儿时的课堂。我猛然抬头，虽然并不见眼前有老师站在那里，但心中却产生了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那是一种正准备完成一篇命题作文的感觉。

不错，我正在完成一篇命题作文，虽然并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然而，我却强烈地意识到，现在是完成这一篇作文的时候了。这些年，《我的老师》这个题目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而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完成这样一篇作文，不但是用笔，也用我的一生。

大概是由于自己的愚笨和好学，在我足迹所到之处，我有很多很多老师，中国的有，外国的也有。他们传授我知识和学习方法，给予我帮助、教诲和扶持，没有这些老师，我根本走不远，更不用说走出原来的自己。

记得高中的数学老师废寝忘食挑灯夜战，终于猜出了大部分高考数学题，使得我这个至今对代数和几何一知半解的学生获得了数学高分的高考成绩;也无法忘记大学的老师根据我的情况，向海外推荐我去做研究的用心；更感激那么多次被我请教的老师不厌其烦的教诲……至今，与这些老师虽然几乎都失去了联系，但我会永远记得他们。

然而，这却都不是那个和《我的老师》这个作文题目一起悄悄深印在我心底达二十多年的老师，那个老师叫李广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湖北省随州市草店人民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时，他是那里的民办教师。

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李老师的记忆不但没有淡薄，而且，和那个作文题目一样，越来越多地浮现在我脑海，冲击我的心灵。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要求我必须完成这篇作文。与此同时，我的心灵深处也为没有完成这篇命题作文而越来越惴惴不安。

我一直没有落笔，一是不知道如何写，二是因为我不愿意窥视自己的灵魂深处——现在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我强烈感到，如果再拖延下去，对不起我的老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到利民小学上小学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发展到高潮。这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说，那时我们家的日子很艰难。父亲是中学老师，家庭出身又不好，在“地富反坏右”中占了头号，外加“臭老九”，所受冲击可想而知。好在我上中学时，“春雷一声震天响，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父亲翻身得解放，姐姐回城把学上。”——记得这是当时父亲教我写的一首革命诗歌。我上大学后，父亲经常找机会教育我，给我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折磨。然而，我的表情一直很漠然，这让父亲难以接受，他归咎于我那时太小，什么也不记得，也就自然没有什么感受。

然而，事实到底如何？那事实已经深埋在我心底太久，久得我不愿意把它挖出来。就在父亲认为他受到冲击遭受折磨的时候，作为“地主狗崽子”和“臭老九”的后代，我几乎每天都遭到欺负和污辱。那些欺负和污辱来自和我同龄的孩子，他们知道，只要一喊出“地主狗崽子”这句话，我就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们可以任意欺负我，甚至让我跪下，接受他们心血来潮的惩罚。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者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毕竟太小，还不到十岁，但就是这十岁的心灵，已经早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天生是一个罪犯，是低人一等的，我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必须老实……我没有权利和人吵架，更不用说斗殴，但如果我老老实实，接受其他家庭成分好的孩子的惩罚，我会得救，我的父亲会感到安慰，我不能为他添麻烦了……

这就是我的世界，这就是我整个小学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十岁的孩子接受了事实，他是一个低等人，是一个其他家庭出身好的孩子的出气对象。我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父亲早就交代过我，而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每次当我在外面受到欺负，衣服肮脏甚至破烂地回到家里，父亲都以为是因为我顽皮而不爱惜造成的，他甚至为此打过我，而我只能咬着牙关，一次也没有告诉父亲，他十岁的儿子正因为他的阶级成分在遭受炼狱的折磨（请参阅《父亲的眼泪》，里面有一次遭遇）。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当时的成年人向我声泪俱下地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我都很没有耐心听下去，有时甚至会生出不屑。我一直认为，作为成年人，他们无论受到什么迫害和冲击，都有能力应付，你可以选择抗争，像张志新烈士一样千古流传；你也可以选择屈服，像大多数人一样；当然你还可以选择成为凶手或者帮凶，从而遗臭万年……你甚至可以选择自杀，结束自己无法控制的生命，像那位勇敢地走向未名湖的老人那样……作为成年人，既然有那么多选择，事后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可是，我，当时不到十岁的我，有选择吗？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自己是阶级异己的后代，是地主后代，我只能逆来顺受，我不知道我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可以打架可以还击可以哭可以报告老师，当然更不知道人还可以用自杀来获得解脱——于是，只要有同龄的小朋友不高兴了，只要他们叫我一声“地主狗崽子”，我就得凝固不动，任他们欺负污辱……而在学校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活动和聚会中，我内心心惊胆战，外表垂头丧气，我察言观色，对所有随时可以把我打翻在地的人赔着笑——我想，大概从那时起，我的心灵就再也无法长大，我的灵魂就此被彻底扭曲了……

被打倒的成年人终于等到平反的一天。可是，谁来平反我那扭曲的灵魂，谁又能平反那无数被扭曲的孩子们的灵魂？

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李广学老师，我那扭曲的灵魂会把我带向哪里去。李老师当时是利民小学的民办老师，他自己没有读什么书，因为家庭出身好，他成为学校的音乐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二十出头的他，瘦高个头儿，头发有点儿乱蓬蓬的，皮肤有些苍白，好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眼睛很大很有神。他负责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始终没有直接带过我的课，只是我在遭受欺负，不得不大多数时间一个人待在学校的墙角时，常常听到他指挥的乐队演奏的革命歌曲。

大概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的某一天，在学校大扫除时，我的扫帚不小心碰到一位同学的脚跟，当他转头看到是我时，口中喊了声“狗崽子”冲上来就打，我抱着头蹲下来，以为像往常一样，只要他发泄完了，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大扫除，到处是扫帚，那位贫下中农的后代抓起一把扫帚劈头盖脸打下来，我的头被打出了血——

在我抱头痛恨自己又惹祸，痛苦地思考如何向父亲解释身上的血，从而心里也痛苦得流血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大吼，随即，那位同学停下了手里的扫帚。我怯怯地抬起头，看到李广学老师满脸怒容地站在我面前。他斥退了那个打我的同学，然后走过来，弯下腰，向我伸出一只手。虽然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我仍然认为那情景是那么的不真实。当他用大手牵着我的小手走向他的办公室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自豪……在我们湖北一些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比北京和上海要彻底得多，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会来关心一个地主和臭老九的后代，就连我的父亲也无能为力，在我还没有懂事时他就开始告诫我在外面不要惹事，能低头就低头，不能低头也要低着头，我也确实这样做了——现在，在我已经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现实的时候，一个苗正根红的学校老师少有地牵住了我的手。

我高高地抬起沾满血的头，仿佛那是一面胜利的旗帜，我看到操场上很多同学羡慕地看着我。

李老师一路都没有松开我的手，我记得由于他个头儿高，我不得不把手高高举起，生怕脱掉了。我随李老师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擦红药水，问了情况，我含着眼泪承认了是自己不对，碰到了同学的脚跟。他打断我，大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我长到十岁鲜有见到的亲切怜惜的目光。他叹了口气，问我，想学拉二胡吗？随即，就从墙上取下一只二胡。他说，今后课余你可以到我这里学习拉二胡，拉得好，就可以参加文艺宣传队了。

从此，我就经常到李老师那里练习拉二胡。我发现到李老师那里学习乐器的人不止我一个。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孩子中有些是因为体弱多病，无法参加学校经常性的体力劳动，大多却是像我一样，父母是阶级敌人，自己在学校经常受欺负……李老师显然不止牵过我一个人的手……自从李老师把我保护起来后，那些本来欺负、骚扰我的同学有所收敛，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有了靠山，心里踏实多了。

在我整个无法言述的痛苦的童年里，李老师一直用他特殊的方法保护我，这是在那个年代我唯一感觉到的关心和爱，至今我不但还能感觉得到，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越来越强烈。

离开家乡后我一直没有回去，听家乡人说，改革开放不久，由于李老师没有系统学习，也没有文凭，最后被学校辞退了，生活都有一定困难。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里拿出一些钱托人给他，但所托之人告诉我，他早就离开了，先是到河南种木耳，结果碰上洪水，之后他只好带着家人到南方打工去了，至今音信全无。

我的李老师应该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他能干什么工作，身体是否受得了？

在我一生中，传播我知识给我教诲的老师很多，但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我的李老师。他的学问和知识有限，没有给我带过课，他沉默寡言，更没有教诲我什么人生的道理，就连那让我能够待在他身边的音乐，我也是半途而废，然而，我知道，他传授给我的是我一生都用之不尽的对生活的希望，对弱者和幼小者的关怀和那广博无边的爱心。

没有李老师，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会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已经干出了什么。因为我真不知道自己那被成人社会扭曲的幼小的灵魂会把我牵引向何方。是李老师轻轻牵起我的手，用

爱抚平了我那本来伤痕累累、充满仇恨和报复的心灵。我原本想让那段历史淡忘，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风雨半生之后，童年的经历连同李老师的形象，在我心中反而愈益清晰和明亮。我终于坐不住了，我决定拿起自己的笔，写出邪恶和善良，写出绝望和希望。

然而，首先，我得完成这样一篇命题作文。

在我终于有勇气完成了这篇命题作文的同时，我早已经下定了决心，自己的下半生将不再沉沦和沉默，我将尽我所能，以我能想到的方式方法抗击社会的不公正，锄强扶弱，以让自己的灵魂能够永远平安，也以此回报我那早已经背井离乡在外打工的老师——李广学。

知识、常识、见识、胆识、赏识

看到台湾一位学者谈论“五识”教育，提到上面这五个“识”，甚合我意，这里借题发挥一番，把我对这“五识”，也是对自己为人处世与做学问的标准做一个注释。

人要有“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知识来自于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现实中的经验与教训。鉴于目前的教育在很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我认为获得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是阅读。尤其对于年轻人，阅读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积累了一定书本与现实中得来的知识，你就需要有一定的“常识”。为什么把常识放得比知识还高？原因很简单，没有知识的人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靠“扫盲”与补习来纠正他，可那些有意或者无意罔顾常识的人，才真让你受不了，他们也是黑白颠倒与指鹿为马的一群人。一个普通的人并不需要搞清楚登月火箭的原料构成与 DNA 的结构图这种知识，但他得知道基本的善恶与美丑这些常识。对于青年人交朋友与寻找另外一半，我的建议是，对方没有知识不要紧，但对于那些分不清常识的人，最好离他远一点儿，有时知识并不能挽救他，那是世界观的问题。

一个人只有在拥有了一定的知识，懂得辨认常识的时候，才能更上一层楼，拥有自己的“见识”。这见识就是你自己看问题的观点，你的思想与世界观，这是一个学者与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我常常遇到一些年轻人，由于知识有限，连基本常识也分不清，一见面就想发表一通“高见”，弄得你不听也不是，听也不是。当然，更让你难受的是一些很有知识的学者，却一点儿“见识”也没有……

有了上面三种“识”，你就是一名有学问、有看法的人，一般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了。大多数有学问的人，也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无法上到更高一级的那个“识”：胆识。胆识就是在你拥有了知识，也分清楚了是非曲直的时候，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勇敢地表达，甚至去实施你的“见识”。一个人哪怕学富五车、观点超前，可因为种种原因，却闷声发大财，到了该出手的时候，连个屁也不敢放，这种人，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关于胆识，大家还要分清楚一点，“胆识”可不仅仅是大胆，更不是“有勇无谋”。“胆

识”必须是在前三个“识”之上的“有胆”，一个无知的人，一个连常识都不懂的人，一个毫无个人见识的人，他即便再“勇敢”，得到一些人暂时的喝彩，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甚至会贻害无穷。

最后为什么还加了一个“赏识”，而且放到了更高一个层次？原因很简单，拥有了前面四个“识”的人，缺乏的往往就是“赏识”，结果，让他们在人格修为、在事业奋斗与理想追求上，功亏一篑。

大家在人生路上踽踽独行的时候，都有偶遇他人“赏识”的时候，请问，你是什么感觉？我相信，有时他人的一两句“赏识”，往往成为你继续走下去的动力，造就了你的一生。当然，我这里的赏识，不是指人家对你的赏识，而是你是否懂得“赏识”他人，包括赏识那些比你强的和那些不如你的，赏识你的朋友与对手，你的表扬者与批评者，甚至你的敌人……

生活中不难碰上，那些拥有了“知识”、“常识”、“见识”，尤其是“胆识”的人们，往往都有高傲与目空一切的缺点，他们失去了“赏识”他人的能力，结果很简单，不会赏识他人的人，肯定很难再进一步，久而久之，他们也不再被他人赏识。你想，一个孤家寡人，一个脱离了普通人的“伟人”，即便“有胆有识”，又能走多远呢？

赏识他人，就是我迄今为止得益最多的一条法宝，我把它送给你，尤其是青年朋友。

第二辑 国

十年后的香港人，依然还能感动我

虽然 1997 年离开后，我又多次经过香港，但每次不是从机场匆匆转机，就是从机场到会场，或者呆在酒店和老朋友聊个不亦乐乎，很少去逛街，更没有一个人到处游荡过。不过这次就因为办理赴俄罗斯的签证而独自一人在湾仔和铜锣湾逛了三个小时。让我想不到的是，三个小时不但让我找回了久违的感觉，而且没想到十年后的香港人竟然还能够让我一次次感动。

上午十点半，从新鸿基中心俄罗斯领事馆走出来后，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到哪里去。因为办理签证要等几个小时，这个时间会朋友显然不够，于是决定还是去逛逛街吧。不过左边是中环，右边是铜锣湾，我提着行李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一位刚刚从我身边走过的中年人停下脚步，回头打量了我一眼，转身走向我。他微笑着用发音不准的普通话问道：“请问你要到哪里去？是不是需要帮助？”

虽然看着他转身走回来，并冲我微笑，但当他开口对我说话时，我还是微微有些吃惊，而且一下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但随即我意识到这是在香港，于是也微笑着说：“谢谢，

我还没有决定到哪里去。”他微笑着点点头，转身离开了。

我想以我这身打扮特别是手里的拖箱，那位香港人一眼就看出我是游客。他以为我不知道怎么走，于是主动来询问我。在香港，你问路，他们热情地回答，并不能说明什么。现在即使在内地，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里，你问路，也绝对会碰上越来越多的热心人。但，看到你站在那里犹豫不决而主动来问你“是不是需要帮助”的，在大陆就并不多见了。

中午在铜锣湾时代广场购物，又看到了一个情景，虽然很平常，却又让我感动了一回。一位购物的妇人头昏不支，摇摇欲倒。两个经过的年轻人急忙趋前，一个扶起她躺到凳子上，另外一个到旁边商店叫了急救车。结果不到五分钟，不但四个急救人员推着轮椅赶到现场，还有两个警察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在旁边守护。而让我感动的并不只是这些，而是看到那几个敬业的医生。这个妇人大概只是轻微的呼吸毛病，但赶到的急救人员却一丝不苟，那位主要的急救医生更是全程跪在地上（因为妇人躺在凳子上）为妇人进行各项检查。

下午我坐地铁回到湾仔取护照和签证，由于走错了出口，竟然一下子找不到新鸿基中心，不过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也就不那么急，并没有询问路人，而是走来走去，凭记忆东找西找。等我在大楼之间走来走去显然又回到了刚刚走过的地方时，一位香港少妇走过来，微笑着问，你是不是迷路了？

她大概是在旁边等人，看到我走来走去，就主动问我。她的普通话不错，而且，这位少妇楚楚动人，是我过去几个月看到的最美的少妇了。我说我要找新鸿基中心，她想了想，竟然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对她说了谢谢，就又继续去找。大概走了不到五十米，她从后面跑过来，对我说，新鸿基中心从左边第二个路口进去，走过去第三栋大楼就是。她说，她刚才问了人，别人告诉她的。

十几年前，当我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前往香港工作，参与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人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我，最终改变了我。

十年后的香港，众说纷纭。有人说制度停滞不前，有人说风俗越来越大陆化，甚至贪污腐败和溜须拍马都出现了，听得我胆战心惊。然而，就在今天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经历的这几件小事，让我再次被香港人感动。

香港人没有变，香港也就有希望。祝愿香港人民永远生活幸福、平安！

马英九，请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5 月 20 日是马英九就职台湾领导人的大典日，网友督促我一定要说两句，我也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等到坐在电脑前，“啪啪”几下，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标题：

马英九，请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这个标题能够反映出我两个月来最想说的话。在台湾大选前，我写了一篇《建议马英九访问大陆》，在大选开票当天，我又写了《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在这些激情澎湃的标题下，寄托着我对马英九的一份强烈的期望。

其实，很多大陆朋友都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这些年，台湾的民主经过波折逐渐成熟，也渐渐融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记得台湾大选开票当晚，当马英九以高票当选的时候，我身边的大陆朋友好像比马英九竞选"总统"的台湾同胞还要激动和兴奋。

毫无疑问，马英九是带着无数大陆同胞的殷切希望而当选的，我们希望他上台后能够期许两岸一个美好的未来，盼望他能够为祖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更想他能够给台湾的民主带来新气象。

马英九不负众望，高票当选，并在当晚发表了让大陆同胞听得如痴如醉的感言，让我喊出了"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不过两个月过去了，今天，我们的激动之情还在吗？

当选后的马英九不但没有如我所愿地出访大陆，为我一厢情愿地给他设计好的政治理念奔波，而且，两个月里，他一个接一个地讲话，从重申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到任用"台独"分子主管两岸关系，再到日前放出重话：他在任期间不会和大陆谈统一，而且，他说，自己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两岸统一了……

我想，如果你曾经像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马英九身上的话，你一定也会像我一样开始失望。我刚刚在电脑上打的那行"马英九，请你不要让我们失望"的话正是我这两个月来心情的写照，我想，很多大陆朋友也有同感。

可是当我想到马英九即将成为台湾领导人，再看一眼自己写的那个题目时，我心中感到强烈的不安，这不安随即取代了失望。于是，我"啪啪"几下，把文章的标题改为：

马英九，我们没有权利对你失望！

我们为什么会对马英九失望？很简单，因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没有希望，自然也不会有失望。希望越大，失望越重。可是，转念一想，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有权利对马英九感到失望吗？换句话说就是，马英九承载了我们对他的期望吗？

马英九当选和我们对他的希望好像没有任何关系，马英九当选，是台湾民众希望他当选并用手里的选票做出了决定。马英九当选不但和我们这些大陆同胞的希望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如果大家对两岸关系有所了解的话，不难知晓，当大陆民众都在希望马英九当选的时候，实际上给马英九在台湾的竞选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两岸长期隔膜的状态下，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支持的候选人往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马英九在竞选过程中，曾经使劲地把自己和大陆划清界限，让人心酸。

我们希望也好，企盼也罢，马英九不是我们大陆民众选出的，当选后的马英九要对那些用选票把他推上领导人职位的选民——台湾选民负责。马英九也清楚，台湾民众之所以选他，与其说是看上他的执政能力，不如说是一部分人不想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想换人干干。在这种情况下，上台后的马英九必须竭尽全力，让那些选他的和没有选他的台湾

民众都满意，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下一次更重要的选举：四年后的台湾大选。成熟的民主政治的精华就凝聚在选民手中的那张小小的选票上，民众用这张选票选择最高管理者，以此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想到这里，我突然汗颜，是的，我有什么权利对马英九感到失望？我和我的朋友都希望他当选，然而，那只不过是希望而已，是马英九并不一定承载的希望。马英九是在中国的一个小岛上，被那里的民众以手中象征权利的选票推上宝座的，马英九未来四年，将会以手中被赋予的权力，回馈那些选举他的人。

是的，马英九，我们不但没有权利对你表示失望，而且，你有足够的理由对同为中国人的我们感到失望，可是——我情不自禁地又一次修改了短文的题目：

马英九，请你别对我们失望！

我想，当我们大陆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对马英九表现出失望甚至愤怒的时候，马英九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对我们感到失望！

同为中国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把那么沉重的希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什么两岸关系的改善，什么孙中山等革命先烈的百年梦想，民主和宪政等……太沉重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岛屿上两千三百万中国人选出的领导人，我们大陆不是有同样血脉的整整十三亿中国人吗？我们把那么多、那么重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受得住吗？他受得起吗？

马英九是完全有理由对我们感到失望的！如果以前我这样说，很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日前马英九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却清楚地显示我说得一点也没有错：他不但对我们失望，而且在我看来，甚至是绝望。

马英九在答记者问题时说，在他任内不会谈统一问题，他强调说，在自己有生之年，台湾和大陆不会统一。台湾现在是民主、法制的制度，台湾人民很满意。

陈水扁说过类似的话吗？一定说过，甚至更加严重，但我没有记住，也不介意。可是，这些话从马英九口里说出来，就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不是我们对他的失望，而是他对我们的失望。

哪一句话让人感到马英九对我们失望？不是他对统一时间表的预测。按说马英九才五十多岁，如果按照台湾人的平均寿命计算，他还有将近三十年左右光阴。所以他的话可以解读为三十年内大陆和台湾不可能统一。这话乍听上去让人气馁，但却并非无法接受。为什么？中国分分合合，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分裂都不算什么，只要大家都承认一个中国，一百年并不久，绝对没有必要兄弟相残，来个只争朝夕，更何况，连香港都可以保持自己的制度五十年不变。

让我觉得马英九对我们失望到差不多绝望的是后面的那句话，就是他所说的两岸无法统一的原因。他说台湾人喜欢的是现在的民主和法制，公民有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制度……

马英九，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知道你早就说过，大陆制度如果没有改变，两岸不可能

统一，你的话也表明作为一名中国人，你希望的是“一国良制”而不是“一国两制”，你反对一切不民主的制度，这是你一贯的思想，台湾人民都认同，大陆很多同胞人也有同感，可是……

可是，你难道认为在你有生之年，我们大陆十三亿民众还无法实现一种更好的制度？完善我们的民主与法制，从以人为本到公民享受充分的自由和人权？难道你认为我们大陆人用选票当家做主的日子还那么遥远？

马英九，我只能对你说，你对同为中国人的我们太缺乏了解，也缺乏信心了。中国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但你也应该看到，中国人民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以人为本，推广民主和法制，使得中国在多个方面都逐渐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5 月 20 日是大陆同胞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哀悼日，也是你就任台湾领导人“登基”大典的日子，也许有人觉得这一天海峡两岸一哀一喜、悲喜交加，很不协调，但我却看到里面的那种内在联系。这一天，虽然是你喜登宝座的时刻，但你不会忘记，台湾走到今天，是那个小岛上无数民众和各党派共同努力和打拼的结果。

而在中国大陆这个举国上下同悲的日子里，你也一定看到了我们在苦难中艰难跋涉的进步，看到我们在悲痛中隐含的力量和希望。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本着以民为本，全力救援，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中国政府不但公开各种信息，而且对民众的批评建议从善如流。你当然也应该知道，这一次连续三日的哀悼日，不但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相信我们，中国大陆民众和政府一定会把悲伤变成前进的动力，把这块土地建设成一个以民为本、尊重人权、繁荣富强、民主和法制的伟大国家……

马英九，请你不要对我们失望！

陈水扁，这次你该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

还记得陈水扁那本《台湾之子》自传书出版时我第一次拿到手的情景，书里有一句话在我后来写的文章中反复出现过，那就是“一路走来……”——陈水扁多次使用这个文学性很强的语句描述自己从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路拼搏，考上大学、当上律师、踏上从政之路，随后位居台北市长，登上权力的阶梯……如果说现今陈水扁成了贪污犯，就否认他当时的奋斗之路，也许欠妥。可是，事实是，自从陈水扁当上台湾领导人、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后，他那“一路走来”越走越让人胆战心惊。

究其原因何在？最近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众说纷纭，都不乏一定的道理。可是我想强调的是陈水扁走到今天，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他自身，说白了，就是他对民主没有好好理解，或者他不知道民主制度的厉害。

这话说出来，反对者众。想一下，一个民主地区的领导人，不懂民主？难道就你杨恒均懂？其实台湾实行民主也就不到十年，想一下美国，还记得尼克松在总统职位上黯然下台，让白宫总统宝座蒙羞吧？尼克松最主要的毛病就是“不懂得民主”，当时杜鲁门对尼克松的

评价一针见血：“他（尼克松）读过宪法，但没有读通。”

在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登上权力顶峰的总统“没有读通”宪法，可见说陈水扁不懂得民主，不知道民主的厉害，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了。

按说，陈水扁对民主的厉害是懂得很清楚的，是什么让他一介穷书生“一路走来”最终打败了大陆政权牺牲了无数先烈才赶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民主!陈水扁的民进党正是使用民主这个“致命武器”，不费一枪一卒把百年老店国民党赶下了台。

可问题就在于他一旦夺取政权后，就忘记了民主的本质，就把民主当成了登上权力的踏脚石弃之不顾，甚至玩弄于股掌。他忘记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做主”，民主制度也许有很多缺陷，但却有一个好处：从长远来讲，是人民做主，任何人、政党和团体都不可能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后可以全身而退，可以永无后顾之忧。

民主制度看起来漏洞百出，但实则是世界上最严厉和残酷的制度。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任何利益集团都不可能长期胡作非为。我在国内常常被一些年轻的朋友质疑，他们说，你难道真相信美国的政府没有贪污腐败？我说，世界上再好的制度都不可能阻止贪污腐败，就像任何制度都不可能限制一个罪犯去杀人一样。可是，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公民的知情权等，让任何一个想作奸犯科或者偷鸡摸狗的公众人物都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尼克松的例子太残酷，那就还拿克林顿的例子。克林顿属于耍小聪明的人，他闹出那么多事，其实都不危及他的总统地位，唯一危及总统地位的竟然是他那句谎话“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做爱”。他差一点儿为这一句每一个偷吃的男人都会顺口说出的谎言丢掉了总统宝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政府官员和掌握权力的人，如果给他们机会，说你贪污后永远不会被发现，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他们那里的贪官污吏绝对比中国大陆多好几倍，贪污的数额更大（人家的钱更多）。可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一再残忍地告诉所有掌握权力的人：只要你做了坏事，千万别指望任何人给你保密（揭露任何恶行的人都会被保护，甚至会成为英雄），你迟早会付出代价，到时人民不会放过你的。

我早就说过，台湾过去十年政治舞台上使用民主最熟练的是陈水扁，但对民主最没有经验和知识的也是陈水扁。陈水扁是当今台湾政坛中少有的几个土包子，不但没有到欧美留过学，而且他的所学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的民主知识。可台湾的政治架构就是从美国拷贝过去的。如果陈水扁懂得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也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那狼狈的样子，他还会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的权力宝座上忘乎所以、唯我独尊？

陈水扁看似“民主斗士”，而当他获得权力后，他恰恰不具备民主领袖的最基本素质：宽大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和谦卑的态度等。他上台后，始终像在竞选时一样用一个一个口号来忽悠台湾老百姓，如果说前四年还可以谅解（为了连任），那么后四年就让人没法忍受了，我也是到他第二任才发现此人原来仍然是“民主斗士”——他在和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民主作斗争。

陈水扁让百年老牌子的国民党知道了民主的厉害，登上权力顶峰，自己却忘记了民主的厉害！如果他稍微有一些民主知识，就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转型成功的民主国家——东南亚诸国、韩国等，前几任总统几乎都不能善终。而他们无法善终的原因都是忘记了民主

是把双刃剑——你可以用这把剑刺伤政敌，夺取政权，政敌也可以用这把剑伤害你。可是……

这把剑归根结底不会被掌握在你或者你政敌的任何一方的手里——这把剑始终是像它的名字所昭示的一样：掌握在民众手里，由人民做主。

这也是民主制度的犀利之处。民主制度以其权力来源（民选）、权力制衡以及权力监督（例如媒体等）等把真正的权力交到了普通大众手里，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看到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人模狗样地在那里表演，但他们其实都是民众手里的牵线公仔。如果陈水扁懂得这个道理，他不但会避免重蹈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覆辙，而且他应该想清楚：你贪污的那些钱准备怎么用？难道你不知道作为一个民选的领导人，至少到你的子孙辈，他们无论身在何处，台湾的媒体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任何一点儿钱财来源？看一下美国和欧洲的总统的孩子，有几个能够花费超出他们经济能力负担之外的钱财而不被公众质疑和追问的？

在任何一个制度下，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不管你的法律如何完善，不管你是什么职位，你都可能犯罪。例如受贿罪，美国总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接受贿赂，而且非常巨大，这和制度没有关系。但一个掌握权力的人犯了罪，是否能够被揪出来，是否能够被依法惩处，是否能够被媒体报道和一追到底，是否可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就绝对和制度有关了！

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相较于其他制度，民主制度在制约、威慑和彻底揭露贪腐分子方面有明显的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水扁家族贪污被揭露出来，说明台湾的民主进程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要横向比较了，就来个纵向比较吧。台湾国民党执政期间，不要说权力顶峰的人，就是各级官吏包括将军们，总共贪污了台湾人民多少民脂民膏？可是，除了权力斗争偶尔造成的官员落马外，有几个贪污腐败分子落网？我想说到这里，台湾人民都心知肚明了。你们想要一个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还是要一个成熟得有些腐烂的专制制度？你们要一个能够把最高领导人绳之以法的民主制度，还是想回到蒋介石那个一党专政、腐败盛行的时代？

写到这里，我还想啰唆几句，算是给马英九的几句忠言，你虽然很熟悉美国的民主，但你的团队好像没有很好地研究白宫的故事。知道你为什么上台后民调下滑如此之快吗？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福特总统的故事，他是美国历史上道德水平最高为人也最善良的总统之一，但他接替尼克松后只干了两年，就永远告别了白宫。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太软，他突然宣布赦免了尼克松，也原谅了尼克松，然而，美国人民永远没有原谅他。

所以，你千万不要顾影自怜，不要一念之差放过陈水扁家族，放弃一个提升台湾民主的机会。你一方面可以让陈水扁、你自己和那些今后会登上权力顶峰的人知道民主的厉害之处，另外一方面也让台湾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民主是用来保护他们，限制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权力，阻止那些掌握大权的人贪污腐败的最有力的武器！

民进党，你什么时候再感动我一次？

美国大选中最让我感动的场景不是奥巴马竞选中说到去世的外婆时眼含泪水，也不是牵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手，四位黑皮肤的美国人一起走上前台，登上美国最高权力宝座；不是奥巴马的获胜感言……最让我感动的场景是在胜负一分，在奥巴马阵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时 CNN 记者拍摄到的一个画面：画面中一部七成新的马自达四驱车孤零零地从地下车库开出来，缓缓而去，车里那位满头白发的司机同样显得孤寂和落寞——他就是离权力只有一步之遥的美国老兵麦凯恩！

在这之前，麦凯恩的演讲已经感动了我一次，是他，奥巴马的对手，在演讲中第一次说出来这次选举的伟大历史意义，并表态"我将尽我所能支持"奥巴马，继续服务国家和民众。

这就是民主的伟大，失败者心服口服，胜利者戒骄戒躁，愈益谦卑。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的人和执政党完全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人物"们通向权力之路，好像是在玩一场游戏，玩一场由民众最终掌握着控制按钮的游戏。当胜负判定的刹那，有人梦想成真，有人梦幻破灭，但无论哪一种，总能让人类感叹和感动：这确实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下类似的感人场景一再出现在民主国家和政体里，不但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屡见不鲜，亚洲新兴的政体如台湾，也出现过类似的感人场面。

2008 年 5 月台湾举行领导人选举，马英九以高票胜出，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然而，更加感人的演讲却来自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的候选人谢长廷，他的落败感言可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退出政坛的统治集团最感人的演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失去权力的执政者或者集团还能保全身家性命、还会被给予机会来发表这样感人的演说。

当然，民进党让人感动的还有很多，就在八年前的 2000 年的大选上，陈水扁当选为台湾领导人，完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也为此欢呼和感动过。虽然说陈水扁执政八年让感动变成感慨，然而，没有人能够否认 2000 年民进党上台、政党轮替的伟大历史意义（这意义一点儿也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奥巴马当选总统）。

即便到了今天，台湾民众也不会后悔台湾实行了民主、完成了政党轮替，更没有人会怀念蒋家王朝的集权统治。陈水扁的腐败无法掩盖执政近百年的国民党的腐败。政党轮替是民主政治，是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人民有"试错"的权力，在"试错"中进步，比在原地踏步几千年都没有多少进步的政体要强得多。那种连人民"试错"的权力都不给的政治制度，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只会在历史的怪圈里打转。

2000 年的政党轮替不但让民进党获得了权力，更让国民党完成了"合法性"的转变，得以浴火重生。从这一点上说，2000 年的政党轮替，对国民党的意义一点儿也不小于对民进党的意义。所以，我至今仍为 2000 年的台湾政党轮替而感动，而当时的主角无疑就是民进党！

台湾的民主是台湾民众觉醒和奋斗的结果，是台湾现代化幕后推手蒋经国高瞻远瞩的结果，是国民党内部进步力量妥协和推动的结果，更是民进党长期艰苦抗争的结果。

民进党最让人感动的是自它成立以来，在台湾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坚持抗争，以棍棒、石块和汽油弹，以眼泪和鲜血，迫使当局一步步妥协，最终完成了民主转型。最终，台湾民众不再需要和民进党一起用棍棒和汽油弹来决定影响台湾的政策；最终，台湾民众用手里的选票把民进党推上了权力的顶峰；最终，台湾民众又用手里的选票把没有能够成功转型的民进党抛离了"总统府"……

这就是民主，民进党，这就是你们拼搏而换来的民主！

民进党必须认识到：台湾民众在 2008 年 5 月份作出了选择，马英九政权是台湾民选的政权，也是民进党必须承认的政权。民进党如果不认同马英九的大陆政策，他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使用民主的途径包括游行示威抗议等等，但却绝对不应该用一个政党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去支持鼓励暴怒的民众使用汽油弹和石块对抗当局，袭击打伤警察。

民进党大概没有忘记，当初他们就是带领台湾民众使用汽油弹和石块来对抗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当局的，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为之感动和喝彩。是他们的勇敢，他们的执著和坚持，最终使得台湾民众不再需要使用棍棒、汽油弹和石块，而只需手里一张小小的选票，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决定自己的命运！

难道当台湾民主已经逐渐走上正轨，当民众用和你们一起争取而来之不易的选票把你们拉下权力宝座的时候，你们转而想使用棍棒、石头和汽油弹来对付当局？难道刚刚选举失败的民进党要用汽油弹和石块取代民众手里的选票？

民进党里有人说，台湾现有的游行规定是违反"宪法"的，那么，你也清楚记得，过去八年在台上执政也有能力修改"游行法"的是民进党而不是国民党。在和当局对抗的时候，我希望现在的民进党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在野的国民党。

对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百万红衫军游行，我并不太支持，但看到人家哪怕在暴雨中都秩序井然，怎能不感动？（特别是宋楚瑜和施明德两位先生的反腐败和平诉求，让人感动。）

民进党，这才是民主。民主不是有些民进党人所理解的：只有你民进党做主的时候，才是民主。人家当选就会出卖台湾，就会背叛民主。他们忘记了台湾大选刚刚结束不久，选票都还没有清理干净。在台湾逐渐完善的政体下，马英九又如何能够出卖台湾？民进党的斗争哲学是否该收敛一点儿了。从我这位经常来往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看来，增强两岸经贸往来，开放"三通"，扩大两岸民间和高层往来，不但不会出卖台湾，而且甚至迟早会让台湾的民主发扬光大。

大家都应该知道，民主是你有时执政，有时在野，而什么时候执政和什么时候在野的决定权在握有选票的民众手里。使用阴谋诡计，使用卑鄙下流的竞选策略，使用高调不着边的宣传鼓动，很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例如某次竞选的时候），但在相对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欺骗广大的选民（例如陈水扁执政八年时间里）。

我能够理解这次落选后对民进党的打击，特别是部分民进党认为民进党赖以生存的"台独"本钱被陈水扁八年执政弄得入不敷出。（相对而言，大陆过去八年对台政策反而从武力威慑逐渐调整到更加灵活和自信的多头并进。）一个政党，一个真正理解民主的政党，必须

把工夫下在“政治”之外，必须搞清楚民之所欲何在，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处处以自己党的利益为本，以党纲为主。我理解民进党以“台独”起家，然而，如果民进党把“台独”作为终极目标，反而把民主只是当做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那就本末倒置了，是让人痛心的。

民进党要想浴火重生，必须从自己党的名字入手：“民主”和“进步”!

专制的历史已经终结，但民主的路还很漫长。老牌的民主国家如美国至今还在为民主不断努力，每一次选举下来，都被欢呼为民主的又一次进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民众通过选票挑选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在民主政体下，政党的胜败实乃“兵家之常事”，有时因为内外的环境，以及民众对政党的期待，使得有些政党在较长的时期内都无法执政，但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那个执政党没有把民之所欲常放心中的原因。一个政党，只有胜不骄败不馁，才能够浴火重生。

民进党大概不会忘记，在 2000 年夺取政权的时候，海内外台湾问题专家包括我自己也认同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可能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执政了（民进党内部智囊自己断言的是五十年到一百年，因为他们本土人一定会选本土人的狭隘岛民观念）。结果又如何？结果是短短的八年，民进党以如此悬殊的票数落选。台湾民众在艰难的八年之后，不但没有对民主失去任何一丁点儿的信心和希望，反而愈益成熟。让人在感动中禁不住拍案称奇！

民主不会走回头路。我希望民进党痛定思痛，不是因为一个党派之利，而是深深感受到台湾需要成熟的政党。我希望民进党能够趁在野的机会更深地体会什么是民主，尽快完成转型——从一个用石块和棍棒进行斗争的党，转型为一个在民主政治游戏规则下按照民主和文明的方式服务于台湾民众的现代化政党。

民进党，你什么时候能够再一次感动我？

大陆游客在台湾可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朋友很兴奋，说台湾放开大陆游客了，他要赶第一波奔赴祖国的宝岛，问多次到过台湾的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他去的，又问，在台湾时干啥事最有意思，而且是在大陆做不到的。

我还真被他问愣了，去过多次台湾，可还真没有发现台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我每一次去好像都没有心情玩。现在回想一下，台湾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第一次去时，我对台湾城市缺乏现代化高楼大厦还挺失望的，朋友说，由于土地和房子都私有化，你真想拆迁、统一规划，还真不是一般的困难，所以谁当选也不愿惹这个麻烦。所以，台湾的城市布局可没有大陆那么雄壮和整齐划一。不过，去过几次后，却也发现别有一番韵味，很多老房子保持了原来的风味，看上去另有一番和谐和温馨。等到再去过几次后，就喜欢上了这种充满人性化的城市。例如前后两次到台中，第一次去时，下火车后看到眼前的那个上百年历史的火车站时大吃一惊。眼前的火车站简直没法和我们任何一个市级的火车站相比。但第二次去就喜欢上了，还专门在台中火车站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品出了百年小站的味道。

回想起来，我每一次到台湾，最享受的就是在僻街陋巷的小食店和当地人一起吃台湾小吃，感受他们的生活，看着红男绿女从眼前的街道飘然而过。至于风景名胜，我都是匆匆扫一眼就离开了。

所以，现在朋友问我应该到哪里去看一下时，我还真不好说，难道让他去逛街，去小巷子里吃台湾牛肉面？啊哈——突然想起了那个老头。

我建议他到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走一下。这条经常用来检阅和游行示威的宽大街道，一头连“总统府”，另外一头是原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不是了）。上两次到台北，我都在台北中央党部的门前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抗议示威的老者。他就是那位因支持国民党而意外死亡的女孩的父亲（或者爷爷？）。他长期在国民党党部门前抗议示威，要求国民党给他补偿，也要求讨还公道。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你如果过去，最好去看一下。你还可以和他一起照相，他很热情，会给你讲他女儿（孙女？）的故事。

当时看到那个老头，我真的愣住了。因为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华盛顿白宫门前的那个抗议专业户。那个故事《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过，我再重复一遍。在白宫的北门，隔一条马路的草坪上，长期有一个白人在这里驻扎。什么叫长期？就是说很多老华盛顿都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抗议的。他有自己的帐篷，一度宣称自己是越战老兵，他最早来抗议据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过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后来他在抗议什么呢？这就要看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因为这些年下来，他逮到什么抗议什么。例如里根上台，他就抗议星球大战，抗议经济不景气；布什上台，他又抗议伊拉克战争；克林顿上台，他又抗议污染和性丑闻，而且，每一年他都要换几个主题来抗议，可谓与时俱进。

白宫附近基本上还算环境优美，也很干净，可这哥们儿就一流浪汉，邋遢得很，他自己在这里不说，还把自己的全部家当——一些从垃圾堆里找到的东西塞在帐篷里。据报道，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警察也曾经多次想把他赶走，但都被这个家伙以美国宪法和自己的天赋人权挡了回去。说实话，在这个地方抗议白宫的人经常有，几乎每个月就有人组织一群人，或者某个人过来举着标语晃荡一圈，等电视台赶过来拍了录像，就欢天喜地地散去喝咖啡了。可这个流浪汉长年累月在这里安营扎寨地抗议，好像还独此一家。

后来据报道，有一次警察过来想把他迁走，他说自己是美国公民，有在这个地方抗议的权利。警察说要检查他的身份证和护照，结果他竟然说十年前就找不到了。警察这下子可逮到机会了，说，你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抗什么议？结果这流浪汉一句话就把警察顶了回去，他说，你不能证明我不是美国人呀。他说得警察无话可说，因为公民不但有丢掉身份证的权利，而且还有失忆的权利。他只记得自己就是美国公民，其他的住什么地方等一概忘记了。

于是，他继续住在白宫对面自己那个肮脏的小帐篷里。那些年每次经过白宫，如果是穿着西装的，还会遭到他吐口水，他不会对游客吐口水，但会对所有穿西装的人骂道：你们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就是被你们搞坏了！大概在他的印象中，凡是穿西装经过白宫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到白宫看到这个流浪汉时，我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一度认为这是美国白宫的阴谋诡计，否则很难解释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抗议的流浪汉，FBI 和警察根本不可能没有办法把他弄走（哪怕收买），可是，神通广大的 FBI 这么久还除不掉白宫周边的这个污点？这难道不是白宫的某种阴谋？那么是什么样的阴谋？

全世界到华盛顿游览的人几乎都要在白宫附近溜达一圈，在他们震惊于华盛顿国家大草坪（TheNationalMall）的绿油油的青草和白宫附近的宁静时，都会看到这个肮脏的流浪汉。那么当他们看到这个流浪汉后是什么反应？我想除了一开始的怀疑和好奇后几乎都会转到对美国制度、美国宪法和美国人权的深思上。美国白宫和政府怎么就能够容忍一个这样的流浪汉在全国权力的核心位置长期驻扎，进行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抗议？

至少我得承认，当初连我也被这个流浪汉引导到对美国宪法和人权的思考上。要知道，对于美国冠冕堂皇地吹捧自己言论自由和游行自由，从大陆来的我毕竟有些半信半疑，可是，这个流浪汉却以活教材告诉我们：你要想声讨白宫，没有关系，去游行抗议吧，虽然使用高音喇叭需要申请，但如果你声音大一些，你完全可以让总统或者他身边的人听到你在那里抗议和侮辱他。

对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在台北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突然看到这个抗议的老头（刚好也隔了一条街道），我简直感到有点儿时空混乱、时光倒流。如果以前还怀疑台湾没有学到美国的民主精华的话，这次我是彻底被他们说服了，不是陈水扁的下台，也不是马英九的上台，而是被这个长期坚持抗议的老头弄信服了。

不过，我那写间谍小说的充满了阴谋论的脑袋又琢磨开了：难道这个长期在“总统府”和原国民党总部前示威抗议的老头也是台湾情报机关安插的阴谋？

那么这阴谋的目标是谁？哈哈，你猜猜看。台北的街道也不怎样，但凯达格兰大道附近还是很不错的。可这么一个长期示威抗议的人就出现在你眼前，你想什么呢？我提醒你，意志一定要坚强，千万不要被和平演变。

对了，朋友不是还问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做吗？其实台湾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了，如 KTV、夜总会以及其他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场所，大陆和台湾相比，反而更便宜。不过刚才说到原国民党总部门前的事，突然让我想到，大陆游客如果有兴致，倒可以尝试做一件你这一辈子估计都没有做过的事。

那就是看完那个老头后，不妨掉头顺着凯达格兰大道走向另外一头的台湾“总统府”，然后——各位我咨询过了，好像不算触犯台湾的法律——举行一个即兴的游行示威！可以把旅行团的各位组织起来，围成一圈，也可以一个人单个地进行，最好能够事先准备好标语，例如写上“打倒台独”、“统一祖国”，或者“马英九，你无耻”（至于为什么马英九无耻，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以不用解释），或者你只写上“支持环保”、“保卫钓鱼岛”等标语，在台湾“总统府”前举着这个标语的时候，让旅行团带队的给你拍照留念。

各位大陆游客，我想，这也许是你到台湾能够做的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事，你想一下，中国五千年历史，你什么时候可以那么轻松地到一个权力中心去行使你的天赋人权？

而且，我得提醒那些只有一次赴台旅游机会的大陆同胞，如果错过这一次机会，也许你今生今世都不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在台湾——咱们中国人的土地上，站在当局的权力中心，行使你那比统治者的权力还要神圣的天赋人权！

火车站那让人心寒的温馨问候

“十一”长假结束了，大多乘坐火车出门旅游的人可能都不会忘记来到火车站时首先听到的那段温馨的问候语：欢迎各位来到××火车站……

——这段话一般是女子的声音，也有使用带点儿女腔的男子播音员的。接下来的一两句，有的地方会介绍你刚刚到达的这座城市的特点，例如“美丽的江城武汉”，例如“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有的则会告诉你当地的天气情况，对于背着大包小包、扶老携幼、风尘仆仆的旅客，这样的问候显然不失温暖。不过两句温馨的欢迎后，话音一变，几乎所有的广播都转到了如下的内容：……旅客同志们请注意，请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不要相信所谓老乡……请不要随意借用不认识人的手机……不要相信帮你买车票的人，请不要相信帮你提拿行李的热心人，以免上当受骗……

请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听到这样的问候语，这些问候都是以贯穿你耳膜的高音喇叭播出的，震耳欲聋，你不至于麻木到充耳不闻。就我所知，广州火车站的告诫内容最长，听得让人脸红，让人心跳，让人胆战心惊，因为如果你都听进去了，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我们什么人都不能相信！

其实，国外的学校尤其是小学，也经常告诫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或者“不要上陌生人的车”。美国的情况比较糟糕，澳洲好多了。澳洲两千万人口，可一两年内也总有一两个小学生被骗的事，结果学校把孩子的安全教育当成重中之重。小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告诫孩子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可是，那毕竟是对小学生的教育呀！我去过那么多国家，到过记不清的火车站，还真没有见过哪一个地方像我们任何一个堂堂的大都市火车站里每天反复上百次（也许上千次）用高音喇叭告诫公民：请不要相信老乡，不要相信热心人，不要相信陌生人……

是不是我们不懂得国际规矩？把一个社会搞得如此不堪、草木皆兵？当然不是，短短的三年里，我自己认识的人里面，就有好几个被骗的，有两个正好就是在刚刚走下火车就掉进了骗局的。而当时，这个以高音喇叭响彻整个火车站的“温馨问候”已经响了好几年了，只是随着 GDP 的提高和火车的提速，播音的频率更密，播音员的语气越来越急促，告诫大家要提防的名单越来越长……

你说，如果没有火车站民警和播音员的及时提醒，那受骗的人不是更多？想到这是对中国成人的嘱咐和警告，我简直就不敢想下去了。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大人们对孩子又是如何教诲的。听说，上学放学家长很紧张的，有的要重点保护，把孩子和外界隔绝起来。我有好几次看到街上可爱的孩子，想逗他们聊天，都被警惕的家长拉走了……

不要相信那些热心的人，不要相信那些想帮助你的人，不要相信那些要把手机借给你的人，不要相信陌生人！那么能够相信熟人吗？

据说，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差不多，那些真正欺骗你的，让你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的几乎都是你的熟人。这些年经常传出国外包括美国和澳洲出现了折磨华人的血汗工厂，但如果你不怕人家说你种族歧视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些工厂的老板十有八九都是中国人。在海外被欺骗的华人，也绝大多数是被华人欺骗。中国大陆的情况能好到哪里去？你得到的告诫是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和熟人，甚至那些想帮助你的人……

那么，我们到底该相信谁？难道只能相信我们自己？可扪心自问一下，你相信你自己吗？或者说，你能够告诉我，你自己又相信什么？你相信诚信、善良、勤劳致富？相信公正、公平？你如果连你心中想去相信的东西都不敢去相信，或者你想去相信的东西已经在现实社会里行不通，甚至让你走上不归路，你又如何能够相信自己？

如果你连自己都无法相信，或者你不得不收起自己相信的而随波逐流，那么，你又能告诉自己的孩子去相信什么？

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抓紧时间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话，我想，我们会越来越不再相信自己，而且，总有一天，母亲们不得不这样告诫自己的亲生骨肉：孩子，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孩子，千万不要相信熟人!！孩子——你也不要相信我，因为妈妈不知道早上把你送进学校，晚上你是否能够从废墟中爬出来！不要相信妈妈，因为我也不知道，亲手喂你的牛奶是否会让你疼得死去活来，甚至夺去你幼小的生命……

我们离 1984 年有多远——读龙应台的《野火集》让我悲喜交加

Hornsby 是悉尼北边的一个小镇，今天我在街道上散步，信步走进小镇图书馆，高兴地看到图书馆里设有中文图书。几百册中文图书都比较旧，顺手翻了翻，准备离开时，看到一本龙应台先生的《野火集》，是 1985 年出版的。于是坐下来，翻开看了起来，没想到，这一看就是三个多小时，直到把一本《野火集》从头看到尾。这本《野火集》分三部分，后面两个部分都是当时台湾各界人士评价《野火集》以及部分读者来信的，我也匆匆扫了一眼。

放下书走出图书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按说，龙先生的《野火集》没有人不熟悉，而且其中几篇文章我也在很久前看到过。不过如此仔细地阅读全文，却是我从事写作后的第一次。而且，其中有多篇文章以前只是听说，并没有读过。当时想得很简单，二十多年前的批评文章，不看也罢。

这次一气读完后，感慨良多，虽然说用“悲喜交加”有些文学了，但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词儿。姑且做作一次，酸腐一下。

说悲喜交加，但喜的不多，主要是悲。三个多小时的阅读过程中，时时掩卷沉思，“悲

从中来”——悲在哪里呢？

首先，发现自己差一点儿成了“剽窃者”。此话怎讲？我写作针砭时弊、批评社会丑恶现象文章的时间不长，加起来也就两年不到，可是写了一百多篇，数量不算少。当然内容都大同小异，看见不顺眼的，结合自己的经历，就一气呵成，一篇文章最多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总算得到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大家互相鼓励。

可是，看了龙先生的《野火集》才猛然发现，我批评的很多现象、批评的角度、分析的问题等等，人家龙先生几乎都在二十多年前写过了，而且毫无疑问，比我写得深刻，文笔也好多了。你想，如果有一位读者同时看我的文章，再翻一下这本《野火集》，即使不指责我“剽窃”，也绝对会认为我是“跟屁虫”，你说我冤也不冤？

让我“悲不自禁”的第二个原因是：龙先生批评的那些台湾弊端我怎么那么熟悉呀！当然龙先生虽然表面在批评台湾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但含沙射影的矛头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国民党不民主的体制。如果说我把自己的文章和龙老师的相比有点儿自以为是，可另外一点却说明问题，那就是我看的这本《野火集》里附录的读者来信，实在是太惊悚了，这可不是我编造的，或者自以为是。因为我的博客后面的留言和评论现在还都在网络上，如果读者对照龙先生当时收到的读者来信（这里主要指批评和威胁的那些）和我博客下的留言，你绝对会认为那些在我博客指责和批评的读者根本不是自己写评论和留言，而是原封不动从龙老师书上抄下来的！谁再敢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你们就拿何其相似的读者来信说事，保证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再如，当时有很多读者来信强烈指责龙先生的文章是帮了对岸“红色中国”，搞乱了台湾，破坏了台湾的稳定和团结；现在大陆的有些读者几乎用一模一样的语言结构，只是把当时对岸的红色中国换成了大洋对岸的美国和澳洲——哈哈，两岸中国人犯错误都是一样，只是不知道，改正错误是不是一样的——哈哈，我本该感到悲痛才是，可我怎么笑了？

那么，第三个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什么？那就是这本让我坐在公共图书馆的书虽然看上去并不破旧，却在版权页上明明白白写着出版日期：1985 年。那时我在哪里？还在上海读大学。也就在那时，龙先生不但写出了这么多我至今还在模仿的好文章，而且更主要的是，人家的文章出版成书了！

阅读龙先生的《野火集》，虽然文字优美，但杀伤力却一点儿也不低，而就在那个时候，她的文章不但在中国时报上发表，而且成册出书了。可是，我的文章不但无法出版，而且，有几个主流媒体使用？就算在互联网上，说了几句良心话，也还得躲躲闪闪，好像一个在虚拟空间里的罪犯，稍微不小心，还被人家“咔嚓”一刀删掉了——是我的文字不够优美？还是有人太丑陋？！

不过，人家龙先生身为温柔的女性，都能够如此坚挺，我一个老爷们儿，整天悲悲切切，实在让我自己不耻。于是振作一下，决定“化悲痛为力量”。

那就先找一个切入点吧。从哪里找？当然还是手头的这本《野火集》。这本集子里有一篇文章我最喜欢，就是《奥威尔的台湾》，奥威尔就是小说《1984》的作者，在这本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幻想和讽刺小说里，奥威尔向我们描述了一个集权社会的丑恶嘴脸：“思想

警察”无所不在，老大哥在处处监视你的一言一行，甚至监视你的面部表情；垄断了真理的独裁政权用改变历史的方式让你接受现实，从而也控制了你的未来……

就在这本小说写成后半个世纪的 1984 年，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台湾的思想特务》的文章，而这一年也正好是龙先生好几篇《野火集》里的文章完成的年代。龙先生带着感情却又非常理性地把当时的台湾和奥威尔书中描写的独裁专制的《1984》做了比较。虽然当时台湾的思想警察还到处都是，而且经常想方设法扑灭《野火集》点燃的那把火。可是，我们也都看到，龙先生就是在那一年出版了《野火集》——当时的台湾已经在台湾人民包括龙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触动和推动下，缓慢地前进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点让我“喜出望外”的地方，难道这还不够吗？1984 年现实的台湾我没有见过，但历史上腐败残暴的国民党独裁我却听说过，而且龙先生也告诉了我 1984 年的台湾；独裁统治下的奥威尔的“1984 年”我没有经历过？至少奥威尔的书我看过两遍。如果说这些都不能眼见为实，那么我却是实实在在地见过当今的台湾——岂止是见过？我走过，听过，看过，感受过，幻想过……当今的台湾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甚至龙先生在 1984 年批评过的丑恶现象并没有绝迹，但毫无疑问，台湾不但把奥威尔的 1984 年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且也告别自己的 1984 年，朝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了 26 年！

这不值得我惊喜吗？值得！然而，这却不是那首歌中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主要原因。让我保持乐观的心、欢天喜地的精神的，却是我自己的联想。26 年在人的一生中也许有点儿漫长，但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却显得很短。既然中国人的一个小小的台湾能够在 26 年间从奥威尔的 1984 年、从龙应台的 1984 年走向现代化，我们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人民有何不可？

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

广场政治与法庭政治

二十多年前在大学学习西方历史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美法两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进步。但法国和美国的路子很不同，法国是大革命式的，我这里简单地用广场政治来一言以蔽之。所谓广场政治，就是由革命群众或者暴民在广场上引发并完成的，一般来说，最后都是要见血的。美国虽然也有广场政治，但两百年的社会进步却基本上是在法庭上进行的。

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读法国的大革命历史，那多激动啊，长江（应该改为塞纳河吧）后浪推前浪，一会儿是卢梭，一会儿是罗伯斯皮尔，一会儿攻占巴士底狱，一会儿把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家送上处死反革命的断头台，革命河山一片红。而且，那也是思想家们的乐园，你昨天晚上一不小心发明一个革命的理论，也许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发现那个拂晓前从广场上攻进议会的新领袖就把你树成国师了，你随随便便弄出的理论竟然成了广场群众杀人放火的指导思想……

再看看美国和法国差不多的那二百年历史，自从 55 个不苟言笑的商人律师之流的制定

了那个《独立宣言》后，美国几乎没有出过一个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唯一一个靠广场起家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几乎每一次演讲都没有离开过美国梦想，还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而即便是金博士，努力争取来的任何一点儿进步，几乎都和美国其他社会和政治进步一样，都是靠冗长的官司，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来决定的。我一直认为，除非是律师和法律系的博士生，几乎没有人会有兴趣钻进美国法庭的记录里去——而那些记录其实就记下了人类最平和最快速的政治进步的历史。

你不能责怪我喜欢法国广场上的鲜血，而对美国法庭上的口水没有多少兴趣，毕竟我当时血管里流的也是年轻人的血，而且，我们那是喝什么奶长大的？不妨想一下我们当时受到的教育，老师怎么教育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推动的？是陈胜吴广在“广场上”振臂一呼搞定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可说到这里，我那写小说的脑袋就不安分了。我们这样虚构一下，陈胜吴广因为大雨误了行程，按照当时秦朝的法律，就要被处死。他们唯一的路就是造反，反正都是死，造反成功可以当皇帝啊。于是他们就在“广场”起义——当时没有广场，只是烂泥岗。如果陈胜吴广有另外一个选择，例如可以不造反，可以上诉到高级法院去，对大法官秦朝的皇帝说，皇帝大人，这个法律有点儿问题啊，我们不但爱这个国家，也爱你这个皇帝，可是，为什么因为一场大雨误期了就要处死我们呢？我们也是有人权的啊！

这秦二世一想，也对啊，这法律有点儿问题，不是以人为本啊。于是，他就说，各位，让我们展开法庭辩论，看看是不是需要修改一下这个恶法，或者还有其他的选择，至于你们，就少安毋躁，别到广场闹事了，好不好？

作为现代人，我们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可当时双方就都没有想到走进“法庭”里去解决问题，于是杀得血流成河，最后陈胜吴广没了，秦朝皇帝也被斩草除根了，何苦呢？

这就是我举极端例子来阐述“广场政治”和“法庭政治”的最大不同之处。

让“暴民”不上广场的办法倒是有一个……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为什么有的民族选择了广场（如法国），有的民族却选择了法庭（如美国）；有的后进民族选择效法美国（如日本等），有的民族却走进法国式的广场文化出不来，否则，这篇文章会长到让你想到广场上去抗议杨恒均浪费你的青春。

但我想指出的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例如有人说是文化基因决定的，有人说人种和人性决定的，有人说是民众不知道“见好就收”，不了解“博弈”，有人说统治者太强硬造成的……原因很多，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现在让我们在广场和法庭之间做一个选择，我想，没有几个人去选择广场而抛弃法庭的，这种共识应该推翻那些文化和人种决定论。

不幸的是，自从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清一色地靠广场运动在推动，以致我们在研究国民党为什么垮台的时候，可以简单地把一次又一次学生运动抽出来研究，就大体知道国民党为啥江河日下，最后落花流水地流到了最东边的台湾小岛。我们这个民族难道无法避免被历史反复证明了对进步有害无益的广场文化和政治？有人说，没

有办法避免，因为老百姓素质低，不理智，容易冲动。

我说，难道广场政治的错都在老百姓？难道有一些民族例如我们，天生就喜欢冲向广场？再继续拿陈胜吴广说事，难道陈胜吴广天生反骨？如果他们当时有选择，他们会造反吗？

其实，要想避免广场政治不是没有办法，办法一直在那里，就在我们眼前。如果用通俗易懂的形象说法来描述的话，我会这样解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让那些一到了广场就浑身激动，就刹那间变成"暴民"的人不上广场，或者愿意从广场上撤下来，那么，不上广场上哪里去？撤下来，又撤到哪里去？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你得让心怀不满的"刁民"甚至"暴民"有一个去处——一个比那个往往以他们流血告终的广场要安全的地方，一个他们不但可以发泄，更主要的是可以讲道理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法庭！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讲理的地方，你可以和我讲理，我可以和你讲理，我们一起还可以和统治者讲理的地方。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到广场上去吗？我们大家看一下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几乎任何些微的社会和政治进步都是靠一个又一个冗长琐碎的官司来推动的。美国历史上也不乏广场政治——游行示威，而且还特别多，但绝大多数都是象征性的，好聚好散，让当权者看到民意。如果当权者完全看不到民意，又有几个人愿意敞开法庭的大门呢？

这就是法庭！一个讲法律、讲道理的地方。我常常听中国人说要讲道理，什么叫讲道理？在一个核心价值观缺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鸡同鸭讲，讲各自的"道理"。其实，在现代文明社会，讲道理就是讲法律，法律就是道理。

关于法律，中国人还有一个常识错误，认为法律就是对付罪犯的，就是用来限制罪犯的自由的。其实大错特错，法律更多的时候是普通民众用来保护自己，用来对付当权者的。法律限制了你不能干坏事的自由，但同时规定你有权干很多事的自由（例如《宪法》）！

有了这种法律和拥有了这种法律意识的民众所在的法庭，就像过去两百年的美国，推动社会的前进和政治的进步，不需要都跑到街头和广场上去了。

我上面说的道理大家也许都懂，但我想，现在你们的眉头一定皱得一塌糊涂。你们会粗暴地打断我，断喝一声：杨恒均，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我们谁不知道那样的法庭比这样的广场要强啊，可是，那样的法庭在哪里？从广场通向那里的路又在何方？

互联网民意和广场政治有本质的区别！

有些利益集团和独裁者可能看到这里也要冷笑了，嘿嘿，要让他们不上广场的办法确实如你所说：法庭。不过，我们说的法庭和你说的法庭不是一回事。对于素质低下都不知道用现成法律保护自己的刁民和暴民，法庭不是他们撒野的地方，而是我们统治者用来剥夺他们自由的地方——包括剥夺他们到广场的自由！

这样使用"法庭"来代替广场和我说的南辕北辙，但我承认，这确实是历史上独裁者们

的字典里的“法庭”的含义。说到这里，我又要举例——不好意思了，我只能折腾国民党，谁让你松开了独裁的拳头呢——国民党统治时期，不管那些学生运动是不是被煽动的，如果国民党利益集团不那么独断专行，不那么贪污腐败，反而尊重法律，能够让法庭更加公平，让法庭成为大家讲理的地方，也许他们不会被打到一个小岛上。

说到这里，我就要转入我的主题：互联网。过去二十年，虽然群体和个体暴力事件不断，但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广场事件。于是有人说了，是不是广场事件不会出现了？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历史，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小孩发育到能够做爱的时间，在历史上可以短到忽略不计。

也许上天特别照顾中国，就在中国广场日益吃紧，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如何从广场走进法庭，从激情走进理性的时候，出现了互联网。互联网近十年的发展大家都看到了，从“左愤”们对我这种曾经的“左愤”口诛笔伐，到今天的杭州飙车和巴东烈女修脚刀杀人，左右中各派都在网络上挽手并进，施展拳脚。

就在我受到来自一些年轻人的攻击的时候，有朋友提醒我，互联网上的那些人越来越像当年的红卫兵，有些甚至哀叹，互联网已经沦落到“文革”时期的广场，混乱、污辱人、暴力，再加上多数人的暴政……

我听到后很震惊，我大喝一声：清醒一点儿吧，互联网和广场完全是两回事！互联网只是一个表达民意的平台，表达民意的个体网民不但没有同在一个广场上，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不同的电脑面前。这和那种集中在广场上，造成情绪不断升级的广场文化毫无共同之处。

互联网民意不但不能等同于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广场政治，而且正因为互联网出现后，大大降低了广场政治的可能性。有人说互联网的出现对草根民众是一个大大的好事，其实，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互联网对当权者甚至利益集团未尝不是一件幸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老百姓没有一个表达意见的虚拟平台，法庭又成为剥夺他们自由的地方，你想象一下，他们除了到“广场”上去，还能到哪里？

互联网民意表达和以表达民意为主的广场政治不能混为一谈。但，正如我上面所说，互联网不但分担了广场文化里的民意表达，而且，由于互联网的特性，对当权者，对现实世界没有直接又立即的威胁，这也使得广场政治中让统治者极度不安的部分不存在了，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上面讲过的从秦始皇建立的那个制度中无法逃脱的悖论。统治者终于能够听到自发的民意了，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民意决定是打开法庭的大门，还是等着民众终有一天走向“广场”——这才是关键。

举个例子，最近的邓玉娇事件，全国民众都激动了，这要是在一个广场文化盛行的时代，保不准多少民众涌上街头，高举“侠女邓玉娇”的牌子游行了。那样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甚至会引起民众再次砸烂公检法。到时邓玉娇的问题很可能“解决”了，但最终遭受损害的却是需要各种法律来保护的所有人，以及整个民族。

无论左的和右的，都把互联网当成表达民意的“广场”，畅所欲言，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不但可以说一些过激的语言，甚至要打要杀也没有人放催泪弹，更不用说用别的了。就

在大家在互联网上纵声喧哗的时候，在现实社会里，广场没有封闭，交通并不堵塞，大家上班的上班，逛街的逛街，做爱的做爱（不排除有些人因为情绪激动而影响性欲），仍然是一派“和谐”的氛围……

看到这里，我能感觉到很多网友恨不得钻进电脑，顺着我的电脑发出的信号波一路爬到我的电脑里，从电脑里伸出一只真实的手，狠狠抽我几个耳光，冲我喊道：你这个老糊涂，你这不是屁话吗！你就是怕我们上广场，你就是小骂大帮忙，你就是“潜伏”的××。按照你这个老糊涂说的，我们在互联网上表达了民意，问题就解决了？

不知道是你的暴喊抑或你那几个虚拟的耳光，让我脸红啊。请少安毋躁。就在我们知道法庭比广场是更好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却一直没有找到从广场到法庭的路，我们只能在那里怨天尤人，最后只好把祸根归结到文化上。

我认为，路也许有很多条，但就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判断，从广场通向法庭最近的路，应该是互联网，是互联网上的民意。

“法庭政治”是通向和谐与自由之路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是写小说的，我可以幻想。问题在于自秦始皇以降，他建立的那个制度，就让独裁者陷入一个悖论之中，为了让民众顺服和听话，他们使用高压的手段，不让民众说话。于是民众不说话，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于是，就形成了一次爆发后的高压，最多只能推迟另外一次爆发的周期而已，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年复一年……

你以为可以遍玩天下美女的隋炀帝想被推翻吗？你以为明朝那个妻离女散不得不上吊的皇帝愿意死去吗？你以为慈禧太后很想自己死后这么多年棺材还被挖出来供游客玩乐品评吗？你以为蒋介石很想到台湾去“蜗居”吗？最后，还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崇拜的毛泽东同志找到了走出中国历史恶性循环的办法：让人民说话，让人民监督，实行民主制度！

还是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法庭政治是缓慢却坚实推进社会进步的最好办法，从历史上看，广场政治轰轰烈烈，但只不过是用一个暴政代替另外一个暴政，为了建立新法律而去推翻所有的法律，最后弄得连旧法律都没有了。

我们最后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说服他人，也说服我们自己从“广场”走进“法庭”。表面上看好像是广场上那些草根民众，那些“暴民”的问题，而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却在于那些掌握了法庭的人——也就是历代的统治者，他们愿意让法庭变成保护老百姓的自由、变成限制权力的地方吗？

如果他们能够顺应民意，又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也对世界大趋势有一定的认识的话，他们一定会“从善如流”的。但由于前面所说的悖论，他们几乎没有地方能够了解民意，久而久之连聪明的统治者也认为自己代表了民意，直到互联网出现后，中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民意的自由表达——这就是我说的互联网的重要意义！

孙志刚的案件就是从互联网走向法庭的最好的例子。那次的互联网民意沸沸扬扬，大有广场的气势，结果某些部门认真对待，最终废除了一部不合时宜的法律。孙志刚之后的这些

年，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日新月异，让人眼花缭乱，也让我这位写幻想小说的人面对根本无法想象的现实，终于承认自己想象力枯竭。

黑窑童奴让我们重温了万恶的奴隶制；周老虎让我们知道了不受监督的官员是一定要弄虚作假；毒奶粉事件让我们知道没有法治，我们不可能靠一己之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周久耕让我们看到阳光法案的必要性；躲猫猫让我们突然想起，人类人权的进步都是从监狱开始的；河南的王帅事件，让我们觉得应该去限制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有杭州飙车案，让我们意识到，在不尊重生命的地方，你我的生命都不一定安全；而邓玉娇用修脚刀给我们的启蒙，更让我们感觉到做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重要……

然而，在这么多次互联网事件中，我失望地看到，好像有些人已经麻木了，他们能够压制就压制，不能压制就只当没有听到，沸沸扬扬的互联网民意却很少像孙志刚那次一样，能够最终走进法庭，废除一个旧法或者推动一个新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莫非有些人也感觉到互联网毕竟不是广场，闹一闹也就完事了？网民们只要猫在电脑后面，躲在虚拟的空间里，再怎么激动和狂暴，也走不多远的！

这个想法让人在 5 月的大热天感到彻骨的寒意。我想提醒漠视互联网民意的人：虽然互联网是虚拟的，但那一个又一个的网名，一篇又一篇文章和帖子后面的人，却一点儿也不虚拟。在本质上，他们和几千年那些走上街头、冲上广场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当他们发现在虚拟空间里一再被忽视的时候，当他们无法从互联网走进法庭的时候，他们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重回广场。有眼光的当权者应该把每一次澎湃的互联网民意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我只是希望，在当权者有机会可以还原法律的尊严，建立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时候，在他们还有能力阻止一些利益集团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法律当儿戏的时候，能够及时向互联网上迷茫、激怒的人群挥挥手，让他们从广场的边缘进入法庭，在那里争取更大的自由，在那里，充满激情而又理智地演说……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从互联网的民意中看到了从广场通向法庭的捷径，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只有经过法庭这条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真正在和谐中崛起。

我该如何向儿子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

澳洲复活节假期，两个儿子回到中国看望老人，顺便看看我这个越来越不称职的父亲。我到澳门去接他们，这是儿子第一次到澳门。我们住进置地广场大酒店，酒店美轮美奂，应该算是超五星级了。儿子哪里住过这种酒店？很兴奋，当然更兴奋的是夜晚走出酒店来到街道上，放眼望去，灯火辉煌，一片不夜城的景象，MGM（米高梅）、新葡京、万利等国际大酒店鳞次栉比，儿子算是长了见识。

第二天，我们来到珠海，上京珠高速前，我一直慢慢顺着海岸线的珠海情侣路驾驶，沿

岸的别墅、沙滩、海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儿子的视线，这里一点儿也不比澳门差，在澳洲也不多见。

我以前在文章中写过，大儿子有一段时间有逆反心理，凡是我喜欢的，他就唱反调。他看出我身在海外，整天惦记中国，加上他们学校说到中国的时候也多是负面的消息，所以，他就经常在我说中国好的时候，和我唱对台戏。我也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中国这些年确实繁荣了不少。我想，儿子自己也看到了。

当然中国的繁荣不光是高楼大厦，在吃和穿上也有长足的进步。儿子的姑妈请他们吃饭是少不了的，而当他们进入到餐厅的时候，这两位从比中国富裕十几倍的澳洲回来的孩子简直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珠江三角洲随便一个海鲜餐厅拿到澳洲都是上"档次"的啊。儿子在动物园能够看到的东西，甚至在动画片上看到过的传说中的动物，只要你想吃，这里都能弄到。

这两天我们为儿子安排的一个重头节目是去参观珠三角的工厂，我们去了两家生产服装的工厂，其中一间是牛仔裤厂。我知道，很多人也许认为我有病，儿子在广州才待两天，却安排他们去参观工厂。可我有我的考虑，儿子在海外生活，中文都不太会，今后可能也很少和中国这边打交道，可是，中国是我的国家，也是儿子的根，如何公正全面认识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而孩子如何认识这个国家，却和我这个做父亲的带他们看什么大有关系。正如从澳门到珠海再到广州，如果我只带孩子们出入高级宾馆和酒店，穿梭于豪华的城市之间，他们回到澳洲后很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特别是快要上大学的大儿子，如果有这种片面的认识，我心里会很不安的。

进入这间在当地还算条件不错的牛仔裤厂，我注意到儿子面色凝重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参观一个第三世界的工厂。当看到眼前的牛仔裤上都是 LV 和 D&G 的牌子（世界最昂贵的名牌），我能够感觉到儿子表情的变化。儿子一直反对我给他买盗版影碟，说那样侵犯了知识产权。（但我一直在买，只是后来告诉他我买的是原版的，老子可没有那么多钱买正版的啊！）

儿子看到这些世界顶级名牌的时候，他大概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正在参观一家做冒牌牛仔裤的工厂。后来管理人员也向我们证实，这家工厂就是为广州水货市场供货，然后卖给外国人，外国人再把这些冒牌牛仔裤运到国外。

这里我要提一下我对冒牌服装的看法，按说，我应该反对冒牌货的，可是，当我看多了，发现全中国都在冒牌，我们的品牌创新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时候，我的心就凉了，心理也同时起了微妙的变化。假冒名牌虽然不对，然而，那么多同胞要吃饭穿衣，不生产冒牌服装，他们能够干什么？当然，我心里也明白，这种冒牌只顾眼前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正是这些冒牌货扼杀了我们民族的创新精神，恶性循环似的让我们永远生产不出自己的名牌。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是鼠目寸光，因为，我眼前只有这些打工的人，他们需要有饭吃。

让我稍感安心的是，儿子并没有看到这些冒牌的牛仔裤就当场质问我，而且，在我简单两句解释后，他竟然表示理解地沉默了，儿子长大了。说实话，我最害怕和儿子争论一些在他看来是正义的东西，他无法理解，在他父亲的生活的国度，很多正义的东西被扭曲了，而

我们又必须在这扭曲的正义下寻找出路。

陪同我们的厂长热情地为儿子挑选了三条牛仔裤，儿子去试了一下，穿上后显得很酷。我告诉儿子，你在世界各地看到的牛仔裤，绝大多数是中国生产的。现在你又知道了，在中国生产这些牛仔裤的，就是像眼前这样的工厂。——我没有再说下去，儿子不会不知道，眼前这种工作环境恶劣的工厂，在澳洲和西方国家已经绝迹几十年了……

大儿子也注意到工人中有很多和他看上去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和女孩，他在仔细打量他们，当他转向我的时候，我期待他问我问题，于是他问了这天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收入是不是很低？

我早就知道儿子会问这样一句话。这里有世界名牌的牛仔裤，这里我们可以不花钱或者花一点点钱买到最便宜、最时髦的牛仔裤，但让我高兴的是：儿子终于看到了那一台台缝纫机后面的工人。

可对于期待的问题，我却一下子回答不出来。我知道海外经常说中国的血汗工厂，说中国的工人收入低，说中国的农民工没有保障，但这不是中国一个地方、一个工厂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贫穷程度决定的，不能怪工厂主或者"资本家"，中国就是这个生活条件。你如果感到惊讶，只能说你不了解中国。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如果我一直待在农村，我的儿子，也会在这些打工者之中的……

我对大儿子说，他们的收入加奖金大概在两百美金左右——这个钱大概相当于儿子每个月的零花钱。儿子没有再问什么问题，谢天谢地。

我一直希望向儿子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然而，我却时时感到彷徨和无能为力，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又怎么能够说我认识的就是真实的中国？

但我至少能够要求我自己的儿子，要认识真实的中国，一定要抱一个平和、理性和充满爱的心，既看到城市高楼大厦的繁荣，更要看到农村和工厂里那些好像被繁荣遗忘了的人……

坐在抽水马桶上就能想通的道理

（严重提醒：美女们、有胃病以及特别爱护我的读者们，一定不要读这篇文章，请立即离开……^_^）

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欧美一些国家搞了一个评比，请各国民众投票选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结果你一定想不到，既不是原子弹，也不是互联网，连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也名落孙山，排名第一的竟然是——抽水马桶。

一开始还以为外国人恶搞，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坐到抽水马桶上使劲一想，才"扑通"

一下想通了。原来，这抽水马桶带给大家方便时的方便，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我小的时候，每年都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上厕所时双腿疲软体力不支，或者一不小心，一头栽进大粪池里活活淹死——我一直认为是臭死的。真的，我不骗你，不相信，你去试一下蹲在一个大化粪池上“方便”的滋味，我向你保证，那比没有互联网和民主自由更让人难以忍受……^_^

我是大学毕业到北京参加工作后才第一次住进了有抽水马桶的房子，对这玩意儿，几乎是一见钟情，从那以后，每天都离不开了，估计如果终老前不病得卧床不起的话，一定会和她白头偕老的。当然，我情有独钟的还是自家的马桶，那份静谧那份舒坦那份惬意那份浪漫……你没有从我文章中感觉到特别的味道吗？

不过，由于满世界跑，总不能背着自家的马桶吧，所以，我和世界各地的抽水马桶也结下了一段又一段的奇缘，大多当然是“一夜情”啦。下面，本人根据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总结一下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旅行时与天下的抽水马桶们相遇的两种情形……

啊，忍不住了，请问，厕所在哪里啊？……谢谢，然后你推门进入机场、餐厅、商场或者公共场所的厕所，推开一个小门……

第一种情形：一股臭气扑鼻而来，你几乎想落荒而逃，找个荒山野岭就地解决，但情况危急，时不我待，你只好憋气吞声，左手捂住鼻子，右手去按抽水马桶的冲水钮，“哗啦”……你不敢看，但听到它们都被争先恐后地冲走了，你身体却更觉沉重，可你不敢坐下，你得先忍住。于是，你撕下一大条卫生纸或者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消毒纸巾，用两个手指夹住马桶圈，轻轻放下，然后，你开始有条不紊地工作，你先得一点一点擦洗靠背和马桶圈，那上面一定有很多水滴——谢天谢地，但愿是水滴啊。有时马桶圈上有鞋印，你就得使劲擦，擦洗过后，你再次冲水，然后用卫生纸垫在马桶圈上，然后，你小心地慢慢地坐下……注意，一定要小心点儿，你不能确定这个马桶的身体是否依然健康，如果禁不起你压，那就大事件了……然后，你总算松了一口气，随即松了更多的气……方便过后，如果你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很有德行的人，你会顺手再按一次冲水钮，然后拍屁股走人……

第二种情况是我到香港和后来出国到欧美澳等国家碰上的。刚刚出来时对比特别明显，甚至有些不习惯……推开那扇小门，那白白胖胖丰腴得有如杨贵妃似的马桶亭亭玉立地等在那里，一副哀婉可怜不见不散的样子，简直让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你“呼哧”一屁股坐下来……坐下后才大吃一惊，竟然忘记先冲水，也没有先清洗一遍啊，不过来不及了，好在朝四周一看，几乎都毫无例外的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上习惯性地冲一次水，正因为太干净了，你忘记了当一次义务厕所清洁工……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让坐下来后的你开始前思后想，这并不是宾馆的厕所啊，好像也没有清洁工啊，而且，国外的清洁工实在太贵，这些公共厕所哪里请得起那么多清洁工呢？

可是，刚进来时就发现这里这么干净，好像刚刚被清洗过似的，怎么回事？不过，蹲了几次，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问题是偷听和观察隔壁那个抽水马桶上的老外的动静得来的。看起来一进来就坐上马桶的绝不只我一个，但在他们使用完冲水后，我却发现他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听到卫生纸擦拭的声音。然后再听到一次冲水。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我推门进来看到这么干净的抽水马桶是上一个使用者擦拭过的……

好了，我的江湖传奇讲完了，如果让你感到胃部不适，我很抱歉，不过文章开头时我已

经善意提醒过你了。我能够理解，支持和反对我的读者这时一定都会说，啊，老杨头又要借题发挥，要用中西两国如何使用抽水马桶来对比民众的素质、文明与非文明以及民主国家民众的真正无私了……

扯——让我怎么说你呢？我现在讲的可是比互联网、原子弹和民主自由更重要的发明抽水马桶啊，你就不能暂时忘记一下民主自由？你扯到文明、文化和道德的差异上，我能够理解，但我切身的感受却让我觉得这次真的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智商问题。如果你不嫌弃，我多啰嗦几句。

第一，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你到公共厕所去方便，你一定会清洗抽水马桶的，特别是坐圈。请注意我上面讲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中国大陆，你坐下前一定会清洗掉排泄物，特别是马桶圈和后背的"水滴"；第二种情况下，外国人使用厕所前后，他们也得清洗一次，但不是进来的时候，而是起来后离开前。两次清洗的劳动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在中国，你为大家清洗粪便；在外国，你清洗自己留下的污迹。

第二，清洗他人的粪便，你是在做好人好事，比目前公布的雷锋同志的事迹还感人（雷锋没有帮不认识的那么多人清洗过厕所嘛），但你做好事的态度成问题，因为你得捂住鼻子带着厌恶，甚至在心里还咒骂前一个使用者：这么臭啊，你去死啊！

第二种情况下，前一位使用者已经替你清洗好他使用过的抽水马桶，你放心使用，使用后你清洗自己用过的，这时，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全身轻松了，而且，你也知道，自己的污迹总是没有别人的那么难闻……^_^

第三，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当你走进中国大陆一个臭气烘烘的马桶旁，或者坐在澳洲一个干干净净的马桶上，你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比起来，素质高的外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真是惭愧耶……如果你这样想，我就要嘲笑你的无知了。因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外国人很自私，他们"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他们蹲过马桶后之所以要清洗干净，并不完全是不想把臭味留给下一个"伦敦"者，而是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使用后不清洗，你使用后也不会清洗，大家使用后都不会清洗，那么，下一次他再进入厕所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们每次都能跑回家坐马桶吧），他需要弯下涨得满满的肚子清洗他完全不认识的某个人奇臭无比的大便……

从这方面说，中国人要无私得多，你只要蹲过公共厕所，你都能够在单位学习中自我表扬曰：我学习雷锋好榜样，曾经无数次地清洗过同胞们的大便，义务干过厕所清洁工；你还可以到没有机会出国的同胞们面前自豪地高喊：在中国，我为国人擦厕所；在国外，老外为我洗马桶，耶——

所以我说，中国人和澳洲人对待抽水马桶的不同做法，和文化、文明、人种和宗教都没什么关联，也请不要和个人品德联系起来，因为，你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难道私德不好的中国人竟然喜欢清理别人留下的大便，为此而不惜把自己的大便留给别人？这哪里说得过去啊，唯一的解释就是：只有弱智才会这样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智商的问题。经过我的分析，我想，大家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人都像一条龙、且都有点儿小聪明的中国人加在一起的时候，不但会变成一条虫，而且会是智商低得分不清谁的排泄物更难闻的那种虫……

不好意思，怎么一和抽水马桶联系起来，人就变得粗俗了？我还是文明一点儿吧。其实，文明一点的说法也有，而且是约定俗成的，那就是如今的中国人搞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大家都在做一样的工作，但却互相伤害，又并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这里只是举例抽水马桶的例子，其实，国人所做的千奇百怪的互相伤害，绝大多数当然要强烈过大便的臭味。

而澳洲等西方国家几乎每个人都做同样的工作，却形成了一个“互利的社会”，差别如此之巨，原因何在？从抽水马桶的例子，我想你怎么都说不出是文明、人种、道德和宗教的原因吧？在抽水马桶事件中，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如厕之前和之后冲洗厕所，这其实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俗成的规则，但却让你感觉到胃部不适的痛楚……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却没有看到希望。有些人要死要活，感觉到绝望，其实，这问题很容易想通，坐到抽水马桶上就能够想明白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也就是规定、游戏规则和制度的不同而已……

好了，如果你一下子没有搞懂我在说什么，去吧，到抽水马桶上去好好想一阵子……^_^?^_^

漫步两岸三地，漫谈中国文化

乡愁

我小时候都是在鄂北的乡镇度过的。1981 年考上随县一中，进城了，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同在一个县城，“家乡”和学校也就相隔几十公里吧，我竟然整整乡愁了一个多月，还偷偷流了好几次眼泪。后来到上海读书，“家乡”就成了随县；四年大学，离开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劳燕分飞的同学们哭得一塌糊涂。然后是北京，然后是海南、广州，还有香港……每走一个地方，离开“家乡”越来越远，“家乡”也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出国定居，才恍然醒悟，整个中国，原来就是我的家乡。

而当“家乡”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重的时候，除了一个地方，再也没地方可以容下——家乡，被浓缩到可以放进心里，带着到处走——我走过的地方，就是家乡，或者，在我走过的地方，总能找到家乡……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母亲的依恋反而有增无减，有段时间，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乡愁的地方。母亲离开后，最能打动我的诗只剩下台湾余光中先生的那首《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我很怀疑，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知道“乡愁”是什么滋味。邮票只是用来集邮的，按一下手机就接通了亲人，买一张票，飞机或高铁就把你带到“家乡”，你根本来不及发愁，当然，唯一值得你发愁的，就是钱。我见到一些没钱的孩子，想家都想得眼泪汪汪了，可当你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竟然告诉你，我没钱。有钱，几乎可以摆平一切。

回想我还是少年的那个时代，既没有金钱，也缺少自由，可我们不知道，我们把那叫“乡愁”。

这不是我的时代，或者说，在“乡愁”上，我依然停留在我那个时代。直到今天，我常常会到处寻找心中的“家乡”，颇有点儿“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这不，我竟然在台北的街道上，有了故乡的感觉……

文化

历史学家汤恩比说 19 世纪是英国人的，20 世纪是美国人的，21 世纪则是中国人的。21 世纪已经过了十年，我们好像还很迷茫，找不到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纪的任何感觉。国家财大气粗了是事实，宇航员要登月了，修高铁比孩子们搭积木的速度还快，建高楼和拆迁一样有效率……这一切都是崛起的必要条件啊，但，还远远不够。

19 世纪的英国除了坚船利炮与鸦片之外，还有科学精神与资本主义价值观；20 世纪的美国绝对不只是用原子弹征服日本，控制了全世界，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是它推崇的普世价值。

我们靠什么把 21 世纪变成中国人的世纪？我总觉得这事和“乡愁”有关，和我偶尔在台北街头碰上的感觉，同世界各地被我当成“家乡”的唐人街，同香港拥挤的街道有关……我把他们叫做文化，中国人的文化。

什么是文化呢？什么是中国文化？这定义实在太多了，刚刚在香港一次演讲会上，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说“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凤凰卫视刘长乐先生说文化是一种价值观……要我来定义的话，还是那一句话，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我们就是中国文化。赤条条来到世间，再赤条条离开人间，除了这身曾经鲜嫩迟早要腐朽的臭皮囊之外的一切，都是“文化”。

在一部分文化决定论者看来，我们遭受的一切苦难，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文化”惹的祸。他们对文化的定义就是我们的悠久历史与古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传统与精神财富。在另外一批人眼里，则认为我们遭受的苦难，正是因为我们背叛了中国文化所致。所以，前者要改造甚至消灭中国文化，后者则要复兴两千年前的古文化。

其实，看看“二战”前后的德国就知道，一样的德国文化，不一样的制度，竟然让同一个民族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分别扮演了最邪恶的纳粹独裁与欧洲最优秀的民主制度的双重角色。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知道德国文化依然如故。

如果看不清楚，那么抬头望着北斗星，再稍微向东偏一点儿，那里有一个朝鲜半岛，生活着同一个民族，只不过被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成了两个国家，结果，一个向我们输出韩剧等充满了韩国文化气息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却要输入别国的大米维持生存……

这一次倒和文化有关，不过，不是文化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影响了文化：同一种文化，好的制度能够让它的精华发扬光大，不好的制度却可以把它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是魔鬼还是天使，就看你信奉的是哪一套游戏规则。

城市

香港一位学者讲，他的英国朋友问他，香港曾受英国人管辖，英国把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带到了香港，可为什么香港在很多方面比英国还好？

他强调这是那位英国朋友亲口对他说的。其实，不用英国人告诉我们，经常来往英国与香港的华人也有很多人有此感觉，我又有这样的疑惑，只是，我们还不够自信，暗暗归因于我们的眼睛更喜欢黄色的皮肤，耳朵更习惯中文。这不，连英国人也这样认为。

这位香港学者的结论是，英国带进来的欧洲制度与价值观同中国文化结合，激发了中国文化里精华的部分，生出了更加漂亮的“混血儿”。其实，他本来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罗湖桥的那边，同样从欧洲（德国）引进了一套价值观与制度，结果，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唤醒了中国文化中沉睡的噩梦，给中国人造成了空前的噩梦。

香港经验证明：中国文化不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适应的自由理念不抵触，还可以相辅相成。我们的教训证明，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价值观，不但多元而且包容，是能够和我们的文化和谐相处的。它们不会对我们的文化造成威胁，更不会把我们的文化“全盘×化”，香港如此，台湾也是这样。我相信任何一位中国人，都不能否认，香港与台湾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相同规模的城市与地区都更加完善地保存与发扬了中国文化。

这也是今天在雨中的台北街头散步的时候，偶然同我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这些年，由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当我再回到自己待过的大陆城市的时候，哪怕只隔了短短几年，我总有一种被抛离了的感觉，高楼大厦让人变得越来越渺小，夸耀“人口红利”的专家不知道“人口”是每个“人”组成的，还有拓宽的街道，被金钱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流……

一种“家乡”的感觉离我愈来愈远，而今天在台北的街头，我却突然与这种感觉邂逅。

我在台北几乎没有什么知心朋友，我和这里的人都有着一种隔膜，可今天，有种感觉却让我想起了远方与心中的“家乡”，或者说，在我的心中，我记忆中的“家乡”原本是应该像台北这样的。当然，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样，正如我也没有完全搞清那是什么感觉。只模模糊糊觉得，那是一种人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和谐，而不是城市逼迫着人们惊慌失措……突然想起了今年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也许更适合中国台北……

中国

上海当然不能和台北比，中国大陆的人口有多少？只要说到人口，就有人会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得益于“人口红利”。但，在我们沾沾自喜，认为收获了“人口红利”的时候，不应该忘记，那些给中国带来“红利”的“人口”却绝大多数没有分到应得的“红利”。他们是能够把这个国家弄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口”，可离一个一个的“人”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是我今天观察台北有些陈旧与简陋的街头，看着那些在琳琅满目的小食店前优哉游哉的台北市民时的感觉。这种感觉，给了我理解和谐、认识中国的另一个角度。

我喜欢在中国，在“家乡”散步，这次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北，其实是有“秘密使命”的，几位朋友联系我，说有可能实现我的夙愿，带我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去“散步”。可是过来后才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出海容易，回来可能就会被当作“非法入境”抓起来。我倒不怕被抓起来，但如果为此而在台湾留下案底，再也不能过来，那就得不偿失了。据说，目前要找关系到那个地区去“旅游”只有从日本走，让日本人安排。如果真要那样，我宁肯不去了。

不去钓鱼岛海域“散步”，照样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广博，每一次来台北街头散步，总能碰上不同的感觉。这正如台湾人与香港人对大陆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一样。

说到台湾与香港人看大陆，也有让人兴奋的。例如，本来月底要参加港大的一个对话会，看了看其中一个议题，发现还是讲香港“高铁争议”的，我对一个朋友说，哎呀，你们知道吗？当朋友告诉我，我可以坐高铁回湖北的时候，我竟然问他，什么是高铁？中国有高铁吗？

这就是香港人眼中的神奇中国啊，中国大陆竟然不声不响地建造了好多条高铁，都修到我家门口了，我竟然不知道，而香港人折腾了整整一年，还在抗争……

台湾人也很惊讶，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国防部长”唐飞，好像因为核能的事，一言不合就下台了吗？台湾来的刘兆玄博士感叹道，据说中国大陆正在同时兴建 40 个核电厂，竟然没有听说哪个大陆人抗议……

如果说香港有自由，台湾有民主，中国大陆显然拥有了“效率”。注意，这里我没有一点儿厚此薄彼的意思，更没有嘲讽的意思，这是一个事实存在。如果我们仔细检视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都太神奇了，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国文化，同时与世界优秀的文化与价值接轨，两岸三地各取所需，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我则继续在台北的雨中散步，思考着这些问题……

复兴

上天是公平的，中国人是智慧的。中国实在太大，于是弄出了“两岸三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华人与唐人街，中国文化实在太厚重，于是各地中国人各取所需，各有偏重，而竟然都做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不应该否认，而香港的自由竟然在国际上排名一直遥遥领先，当然，还有台湾……

我总是记不住台湾人使用的那种中国传统历法，什么“民国××年”之类的，我的算术不好，记忆也经常选择性运作，你让我老是要加上个 11 的数字换算成公历（辛亥革命爆发于 1911 年，是为民国元年），总觉得别扭，可是，当今天散步台北街头的时候，我发现，今后两年里，我不用费心换算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数字：99，而明年就是一个谁都不会忘记的大庆：辛亥革命 100 周年。

一百年，我们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啊，我都不愿意多想，想起来，总会心潮起伏。不过，在台北的雨中，你倒可以边散步边思索，不会有人注意你，你也不用掩饰感情……一百后的台湾，实现了当初的梦想没有？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谁能够否认，百年前的部分梦想在这里实现了，而且，西方所有那些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在他们建立民主制度 100 周年的时候，有几个能够同今天的台湾相比？

大陆、港澳与台湾，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诠释，中国人的文化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有随时可以焕发青春的巨大潜力，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摆脱文化中腐朽的部分，又如何光大文化中的精华？

台湾的刘兆玄在香港讲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要凝聚两岸三地的力量，来一次“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他提出了“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的说法，我非常赞同，但对于他过多强调孔孟老庄，以及要发掘与发扬中国的“王道”，取代世界当今甚嚣尘上的“霸道”，为世界提出新的价值观，我则认为他太强调了过去，而忽视了现在。

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在中文中有“复兴”两个字，但与其说它是在“复兴”欧洲古代的文明，不如说是“复兴”了当时欧洲人被隐藏与压制的人性与创造力。他们复兴的是人，而不是欧洲旧有的“文艺”与“文化”，当人被解放，人的本性被“复兴”的时候，他们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力，创新了新的文化，而他们本身就是文化。

文艺复兴诞生的是一种“新的人”，以及“新的文化”。新的人是挣脱了枷锁的人，新的文化则是吸取了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精髓，在好的制度激励下焕发出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

裸捐

常常有人问我，走了那么多地方，见识了那么多事与人，怎么还会对中国充满了信心？有人甚至以此断定我是装出来的自信。其实，我是真的“自信”，这自信就是基于我是中国人，以及我身上的中国文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哪一天对中华民族、中国人和我自己失望过。

这几天，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到大陆劝中国的富人捐款向善，看到有那么多富人踊跃响应，我挺高兴。中国人做善事的历史更加悠久，方式有些不同而已，糟糕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制度一直从中作梗。大家想一想，在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下，中国的富人能够持续几代？要就是被穷人造反杀头分财产了，要就是被权贵吞并，甚至被皇帝灭门。

当今中国大陆的富人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他们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就业机会，纳税让国家强大，实在是功不可没。等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中会有更多的人响应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更何况，对于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富人们捐献甚至裸捐的时候，也应该想到自己的生意能够持续发展，造福民众，为国家纳税。当然，如果他们能够此时此刻就落实“以人为本”，在追求利润的时候，更关心自己的员工，则功绩不会小于“捐献”。

说到全民都在关注、劝导与监督富人捐献，让我想到，其实富人捐献的财富是钱财，而拥有财富的绝对不仅仅是富人，任何一个人，都拥有某些可以造福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财富，例如掌权者的权力、知识分子的知识、普通人的时间与劳动……在我们乐此不疲地劝富人“捐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我们捐献了没有？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觉得，用自己拥有的知识养家糊口是天经地义的，利人利己，但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与一个特殊的地方，有时知识不是都能够变成可以换钱的方程式与文字，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们可以不去计较利益与个人得失，“捐献”一部分自己的知识，造福民众与国家。

这类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甚至出现了很多“裸捐”的——为民为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可以去统计一下，中国历史上抗击强权坚贞不屈的知识分子，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与国家的比例低。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未来

对民族有信心，对我们自己有信心，也是对未来有信心。记得两年前我写过一句话：当我们不自暴自弃，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未来已经不同了。去年在香港大学与同学们交流时，我提出“未来不是用来推测，而是用来创造的”，这次到台北前的 29 日，在香港大学回答同学们提问，有一个问题也是谈到未来。

一位同学问的问题大致是，中国的封建（其实是专制）历史那么悠久，根深蒂固，民主自由的思想要想在中国发展，需要时间，未来可能会实现，但现在还需要一步一步来……

我同意需要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但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并不是什么特色，民主自由制度与理念，在地球上也只不过才两三百年，而中国也走过了一百年。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自信，深陷对自己文化的鄙视与害怕之中，今日复明日，那么，未来将永远是过去的重复，未来就是现在。

同学们的问题让我想起了广州亚运会的一句广告词——现在就是未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并一起努力，我们的未来不但不是梦，而且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这样说：

现在就是未来！

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那天，匆匆浏览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金鞭溪，发现离朋友约会还有三个小时，正好，这是我到周围走走的好机会。走了一圈后，决定不坐旅游车，不搭的士，按照我的老习惯，去坐当地人的公交车回城里，这样我就可以和当地居民有一个小时的近距离接触。对了，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哪怕是在游玩的时候，也总是找机会接触当地的民众，和他们聊天，交朋友。我发现，从这种聊天交朋友中得到的知识和信息是我这一辈子在任何书本上都学不到的。

当地人看到背一个大相机的我找地方上的公交车，都很好奇，因为这里是有专门的旅游巴士和很舒服也不太贵的针对游客的交通车的。但我这个游客却一定要去坐他们的公交车。

我上到一辆已经坐了七八人的公交车，车里到处是箩筐，气味中有蔬菜、辣椒的味道，我扫了一眼，全是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妇女。我坐在她们中，很自然地就聊开了。由于车一直没有开，我们聊了足足二十多分钟，很快，我已经弄清楚她们都是来旅游区兜售农家品的附近村民。最小的也有三十多岁了，最老的一位大概有七十多岁。

她们都抢着和我聊天，其中一位说，几乎没有游客坐我们这里的公车，另外一位说，你是大城市来的吧，你不一样。不是和我们不一样，是和很多游客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我不一样，这种车，即便有游客来坐，也是年轻的游客们，我这种年纪的游客如果还有钱旅游的话，是决不会有人愿意爬进这种脏、乱、差的山区公交车里，和一群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交叉的山区村民坐在一起的。

我很开心有机会和她们聊天，让我感觉到一上午的游玩得到了补偿，总算没有浪费时间。我们聊了很多，等到车坐满时，我已经知道她们今天各卖了多少蔬菜和苹果、鸡蛋和粽子，她们几乎都告诉我她们今天的收入，有两位还告诉我她们家靠卖水果和蔬菜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她们都很坦诚地向我讲。和她们在一起，我很自在。

但我注意到，只有那个最老的婆婆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我。我问她，你的东西卖完没有？她摇摇头，我看到她的提篮里有一些蔬菜和一个塑料袋，问她，那是什么？

婆婆颤巍巍地提起袋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看到一些很大的鸭蛋。她说，今天的六个鹅蛋一个也没有卖掉。我这才知道那是鹅蛋，很大、很大的鹅蛋，白白的。

婆婆说，自家腌的咸鹅蛋，本来卖给这里的小摊贩的，可是人家不要。她叹了口气说，

这是最好的鹅蛋，今年还准备好靠这几只鹅能赚点儿小钱的，想不到……

我这才知道那婆婆刚才为什么不高兴了，敢情是鹅蛋没有卖出去。看着我一直盯着她袋子里的鹅蛋，婆婆突然有些兴奋地问，你要不要买？

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我还真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鹅蛋，可是我买这些鹅蛋干啥？我说，我不买，我没有办法带。

大家先是附和老婆婆要我把鹅蛋买下来，见我不买，就去笑老婆婆说，你看人家怎么会买你的鹅蛋呢？你以为是宝贝啊。

她们笑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问，婆婆，你的鹅蛋是生的还是熟的？我想，如果是熟的，也许可以买下来，一会儿让朋友们每人吃一个。婆婆说，生的，本来卖两块钱一个，看你和我们坐一起，一定是好人，你要是买，我给你一块五一个。

大家又笑起来，我也笑了。她的逻辑有些让我吃惊，和她们坐一起，就是好人了。不过，我还是不能买，生的，我根本无法带下山呀。可是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实在有些不忍，更何况，她袋子里总共只有六个鹅蛋，也就是九块钱。我刚刚在山上一口气吃了三十块钱的冰激凌。可是，如果我买下，我得偷偷丢掉，那是浪费，如果不买而把钱给老婆婆，她一定不会接受，而且会受到周围她的老乡们的哄笑。我正在犹豫时，听到她们的对话——

你今天怎么没有卖掉呢？你不是说你家的鹅蛋比张家界的山还要吸引人？一个妇女用近似我家乡的张家界口音调侃老婆婆。另外一个说，是啊，你家的鹅蛋不是固定卖给××摊子的吗？人家不要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不收我的鹅蛋了，他们说游客少了，经济危机来了，茶叶蛋都卖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把鹅杀掉，也不行，但如果卖不出去，还要养那鹅干嘛……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说起经济不景气，各自的收入都大大减少了，我就很吃惊，那老婆婆也有七十多岁了，虽说是引用，咋就顺口说出了“经济危机”？我说（我一说话，大家就停下来），婆婆啊，你也知道经济危机？

那老婆婆看着我说，咋不知道，你城市人更知道吧，美国人都要饭

去了……

老婆婆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我更是吃惊不小，我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人家联想到美国，低头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说，啊，婆婆，你从哪里知道美国人都要饭去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我第一次听说……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申出一番解释，可看到婆婆有些迷茫的看着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几位妇女又哄笑起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婆婆）听电视上说的，她就记住了，常常说。我就没有看到电视上那样说过，我倒看到报纸上说，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

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

我又被雷倒了，我想说点儿什么，反驳一下，解释一下，但当看到她们都真正开心地笑闹着，我张开的嘴巴僵住了。我能够说什么？

有人说我写了几篇博文就是启蒙了，其实我最警惕这个说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认为这种交流看法和思想越交换越多，对各方都有好处。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犹豫起来，告诉她们真相难道对她们真有好处吗？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据说，我们富裕了，很强大了，财大气粗了，连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小学的算术我还是会的。当一个拥有十三亿国民的国家的人均 GDP 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当国家财大气粗的时候，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表明平均分摊到十三亿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身上的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正是抱着这个简单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触了当地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还很贫困，而这些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如果让我把他们和澳洲、美国的贫困地区相比，我要告诉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这是我凭良心说出的直觉。我知道数字和事实被一些人垄断了，但我的直觉还没有背叛我。

也许国家大了，人口多了，确实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办法，要你启蒙干什么？好在那个地区的电视和新闻都非常主流，几乎是二十四小时的光明和幸福的主旋律，当然只有在提到美国和台湾的时候，才会愁云惨雾，但那种愁云惨雾，只会让你更加高兴和快乐，因为你没有不幸地生活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所以，一个七十岁的老婆婆用一句简单的话——“美国人都要饭了”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从而一扫卖不出六个鹅蛋的经济危机的阴霾。信心啊，那不正是我们“国家”需要用来对付经济危机与不和谐因素的有力武器？

车厢里那种充满信心的气氛让我陷入了沉思，自然没有了心情聊天。这时，两个女警察来到车门口，其中一位喊道，你们下去，换另一班车，这车要下班的职工先走。话音刚落，那些和我同车等了近半个小时的村妇们就一下子站起来，提着箩筐包袱自觉地下车了。我最后一个下车，经过警察时问，为什么要换车？警察看到我这身打扮有些诧异，是的，这种车

里不会有我这种打扮的人。吃惊的警察大概摸不准，打量了我一会儿才说，你们坐下班车。我继续问，为什么？

刚才和我聊天的一位村妇说，他们下班了，就要我们下来，他们要先走，是这里的干部和职工。平时都是这样，他们不知道有游客（指我），要是游客多了，他们就不敢这样了。

我有些不解，就问，我们坐这长途公车的票价都一样吗？她们说，是的啊。我问，那为什么对待你们就不一样？那几位妇女都很迷惑地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天方夜谭似的问题，她们认为自己被赶下车是天经地义的，她们只是对我被赶下车有些抱歉。

我有些生气，转身对警察说，你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我们下来，你们先走。她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游客如此较真，说不出话，于是我就冲她们拍照。这时，调度过来解释说，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有车来，这样就可以一起走，但还有一部车在路上堵住了，你们等下一班，很快的。

我说，人数一样多，票价一样，我们先来的，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为什么要我们下车，为什么他们不能等？

我很生气地说，但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根本不会计较这些，何况，人家有权力这样调度，而且看到我生气，那个调度员加紧调车。那部公交车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上去后，就被司机换上了职工专车的牌子。不过，他们那部车开走后不到十分钟，一部专门调派的公车就冲进了停车场。

当地村民都让我先上，说是因为我这车才来这么快，我不肯上，让她们先上，最后我才上，可当我最后上去后，才发现，她们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上车后前边第一个单人座位）。

车开了，我还有些不开心，不怎么说话，她们竟然开始安慰我，说，因为就你一个游客，他们没有注意到才会这样，他们下班了，要回去，你就别生气。不过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啊，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调车过来，职工下班很多人。总是这样，今天幸亏有你，他们有点儿怕，你还照相……你别生气了……

我心里更难过了，天啊，我哪里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坐这种车只是体验生活而已，今天过后，我可能永远不会来这里了。

我当时生气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位没有卖出鹅蛋的老婆婆，那位被忽悠到认为美国人已经开始要饭而感到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的老婆婆，还有这一车听到警察一句话就立即提着大篮子小篮子下车，空出一部公交车让给公仆们的村民。她们每天这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农产品其实比谁都辛苦，但她们都淳朴地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不重要的人……

车开出后，我一个人郁闷，失去了和她们说话的兴趣。车在蜿蜒的山道行驶，我的思绪却比山道更加崎岖。当车子开离旅游区来到山区后，不一会儿，车上就几乎挤满当地的村民了，却显得我更加孤独。这孤独让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走进他们中，也许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自以为最了解他们的我其实最不了解他们。他们不需要启蒙，他们幸福，他们有信心，不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是我们，对他们启蒙只能把不高兴和缺乏

信心感染给他们……

走了半个小时，学校放学了，从山间的小路涌出一群群学童，他们在路上奔跑、拦车，车停了，孩子们想上去却挤不进，不一会车厢里就像沙丁鱼罐头了。我看到两个几岁的小孩子站在我旁边，本能地让位置给她们，可是，有两位妇女却立即制止了，而且，那孩子一看大人的脸色，根本不敢坐我的位置，我听那妇女对孩子叽里呱啦地说，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

车继续走，我身边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却坐在那里，像一个城市来的精英，精英啊！我不想说美国和澳洲了，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舒适的校车接送……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都没有了心情，想写点儿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天，回到家乡随州后我才能一口气写出来，写出来后，我都不愿再看一遍，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写的小事，对不对？写出后给一位网友看，她立即说，你怎么写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你越来越像一个老婆婆了，你应该写一写宏大的主题啊，你写的这些事在中国几乎不算什么事了，我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帮你纠正文章里的错别字了……

是啊，这算什么事呢？不修改拉倒，我自己修改，因为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写，应该放进博客里。这几天，我老是想车上的老婆婆会怎么处理她那六个卖不出去的鹅蛋……我又设想，如果她知道我经常来往美国，会不会要我把鹅蛋买下来带给靠借中国的钱生活的美国人民？我又会想，如果她明天还卖不掉那几个鹅蛋的话，她还要坐那趟公交车？如果她再被赶下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帮她们吼两声……

可我几乎是生平第一次相信，我的吼声，不但不能为老婆婆壮胆，很可能会让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失望；而只有那及时报道的美国经济危机笼罩下的惨况，才会让因为卖不出六个鹅蛋而陷入愁云惨雾的老婆婆充满信心——那信心，不正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人能够继续过和谐日子的必要保障吗？

纪念“9·11”，看美国怎样把灾难变成教科书

警钟长鸣“9·11”

刚到8月下旬，就开始回顾和反思“9·11”，这已经成了美国媒体的例牌。每当此时，打开美国电视，翻开美国报纸，立即可以感觉到世贸大厦轰然倒下的冲击波阵阵袭来。当然这和本?拉登仍逍遥法外、美国至今在伊拉克泥足深陷以及民众心头的巨大创伤尚未愈合有关。可是，如果深度观察，不难发现，美国人对“9·11”的反思每年都花样翻新、高潮迭起，而反思的主题也不再仅仅围绕反恐和国土安全。

记得2004年8月的一天，我刚打开电视机，就看到一位眼圈红红的女士坐在演播室里，她是“9·11”遇难者家属。她正对着电视镜头，回忆三年前自己的那段惨痛经历。“你当时

有什么感受？”老练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打断她的话头，发现她没有反应过来，又连珠炮似的追问：“你当时想到什么？你恨恐怖主义吗？你怪政府保护不力吗？你支持白宫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吗？”总之，一句话，你当时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位女士在脸上抹了一把泪水，抬起头，想了想，镇静地说：“一个肩膀……”

这就是那个女士的答案，和反恐与国土安全关系不大。可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第三天以及接下来的好几天，“一个肩膀”的话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开始发酵，先后上了好几家电视台的评论节目，报纸也刊登越来越多的专题报道和分析。“一个肩膀”成了那年反思“9·11”的众多话题中的一个。

原来那个家属的话被敏感的记者抓住了。是的，当那场空前的灾难发生，有三千多人被掩埋在废墟里，恐怖分子仍逍遥法外，有谁会去关注一个受难家属当时最想要的是“一个肩膀”？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属超过万人，在慌乱和匆忙中被安排在仓库和工棚中。他们不知道亲人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死了的亲人的尸骨是否可以找到。他们悲痛欲绝，面对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以及和他们一样悲伤的家属们——也难怪，那位遗孀当时最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听她诉说、可以分担她的悲伤、可以让她轻轻靠一下的肩膀……

“一个肩膀”的话题就这样引领了一批观众朝一个未知的领域挺进。先是有越来越多的“9·11”受难者家属也站出来诉说当时顿失亲人的孤独和痛苦的感受；随后就有民众纷纷加入讨论，表示理解和同情；接着是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出来，检讨他们缺乏安慰这么多断肠人的经历和经验；电视台还请来了重量级的心理学家，据他们分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无疑会对受难者家属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理伤害。最后自然也少不了有关政府部门，他们不得不站出来承认在“9·11”善后工作中的这一疏忽和失职，承诺要更多地依赖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志愿者团体，当类似这种大规模的灾难发生时，要确保及时地让每一个受难者家属都得到适当的照顾和心理咨询，让每一个痛不欲生的死难者的亲人都能够有“一个肩膀”依靠。

2004 年美国媒体对“9·11”的反思虽仍然集中在反恐和国土安全上，但像上面这种平民话题的热点讨论，出现了不下数十个。这些反思与“9·11”永远的主题——反恐和国土安全——相去甚远，却让人感觉离民众很近。不排除今后美国还会发生类似“9·11”的灾难，但我相信，到时一定会有“一个肩膀”在那里等着每一个受难者家属。

媒体是追问灾难的排头兵

今年（2007 年）是“9·11”六周年，从 8 月底开始，美国媒体又把焦点慢慢转移到“9·11”上来。反恐和国土安全依然是主流，只是今年和布什、本?拉登以及伊拉克一起被推到聚光灯下的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特内特。两年前业已完成的那份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报告部分内容曝光，显示中央情报局当天一早就获得本?拉登和恐怖分子将袭击美国本土的相关情报，但却迟迟没有采取措施。中央情报局是否存在忽视重要情报最终造成“9·11”等严重失职行为，已成为今年媒体追逐的新焦点。

我打开香港电视，看到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正播放“9·11”专题。一场规模巨大的葬礼正在进行，这是为在“9·11”中遇难的救火队员举行的最后一个葬礼，

场面凝重，让人仿佛回到浓烟弥漫的“9·11”现场。葬礼场面在电视上出现的时间很短，接着就换上了播音员。播音员说，有两位消防队员的家属已经对建筑商以及负责消防设备的单位提出控告，理由是，她们的丈夫是因为大楼的消防设备出现故障导致窒息而死的。

看来 CBS 对此事极为重视。播音员一副拉开架势的样子，又找专家咨询，又找律师访谈，很显然，殉职的消防队员家属控告有关单位，这事肯定也会成为今年反思“9·11”众多议题中的一个大热门。

“9·11”过去六年了，美国媒体还是不愿意放过“9·11”。各色人物和团体都要陆续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每个人都要说话。而很多议题已经离开了反恐和国土安全，从“一个肩膀”到消防器材的质量，已经深入到了方方面面。

这也难怪，“9·11”这样的灾难毕竟百年难逢一次。如果这个时候，把长期存在却难以消除的弊端或者隐患挖掘出来，呈现给国人，自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媒体对“9·11”的持续反思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这么一来，“9·11”倒好像不是巨大的灾难，反而成了金山银山，每个美国公民、每个民间机构和组织，以及各大媒体都要趁机“捞”一把，不断挖掘、开采，不把“9·11”的剩余价值榨干不肯罢休。

而在彻查灾难和事故原因方面，排头兵一直是媒体。普通民众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资讯，更不能独立完成调查和反思，但他们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可以追问“为什么”。接下来把“为什么”传下去的就是美国的媒体。有民意和舆论做后盾，反对党推波助澜，专业的民间独立机构介入调查，政府自然也坐不住。

当然，美国媒体绝大多数是私人拥有的，是商业行为，说他们只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追查真相，并不都是事实。美国媒体之所以对灾难穷追不舍，是以美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为基础的。说到底，美国媒体对“9·11”的持续反思，只不过反映了美国民众对“9·11”难以忘怀。

譬如，三年（2004 年）前美国媒体就曾一度不愿报道“9·11”周年纪念活动，理由是不揭受难者家属的伤疤，希望帮助美国人民走出悲情。实际上却另有隐情——广告商不愿意自己的广告出现在纪念活动中，媒体赚不到钱，就试图淡化“9·11”。结果观众不乐意了。要知道观众才是媒体的大爷，毕竟决定媒体是否赚钱的是收视率和发行量，广告商也是冲收视率和发行量而来的。在观众压力下，美国媒体最终只能改弦易辙。

最大的灾难是不许彻底追问灾难

民众对灾难的质疑，成为追查真相的原始动力。受民意和舆论引导的民间独立调查，虽然很多时候会偏离专家的指导，有时甚至由此及彼，四面出击，但却很少有不理智的举动，政府很少直接成为攻击的目标。

整个过程看起来，政府都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算不上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们的成功之处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善待民意和舆论。如果政府强力垄断对灾难和事故的调查权和解释权，媒体只是发布官方消息的工具，那么在灾难和事故调查中的公众监督就无从谈起，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就难以保证。而正是因为美国政府任由媒体穷追猛打，任由民间独立机构彻查到底，政府显得自信而从容，反而比较容易化解灾难和事故导致的政府公关危机。

这里不妨拿济南水灾和新奥尔良水灾做一个比较。被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差点儿毁于一旦，事件发生后，白宫和地方政府都遭到猛烈抨击，布什总统声望跌至新低。但美国政府对这场灾难的态度仍一如既往，跟随民意和舆论走，提供便利让民间独立机构接手调查。随着调查结果的深入，该开除的开除，该辞职的辞职，当地政府和警察局承担了应负的责任，公众无话可说，总统声望开始回复。在这个事件中，政府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民意和舆论的对立面，结果畅通的民意表达和不受干涉的媒体恰恰为白宫解了套。

相比较而言，济南水灾是一场规模要小得多的灾难，虽说这场灾难也有人为因素，但毕竟是由历史上罕见的大暴雨引发的。这场灾难发生后，如果济南当局善待民意和舆论，也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但济南当局恰恰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以致发生拘留网友“红钻帝国”这等极端事件，而引起公众的普遍愤怒，造成了比济南水灾本身要严重得多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一度淹没济南市区的洪水虽然早已退去，但质疑和伤痛，却仍然堵塞在民众的胸口。

当然也不是在所有灾难和事故中，美国都只有民间的独立调查，政府同样要介入调查，所不同的只是政府不能垄断调查权和灾害信息发布权。正因为政府不能垄断，灾难和事故的调查及信息发布就存在竞争，政府只是竞争中的一员，稍有闪失，很容易被揭穿。这就迫使政府对灾难和事故调查及相关的信息发布不能不特别谨慎，特别周密，力求无懈可击。

这里不妨做个对比。中国佛山九江大桥垮掉后，政府及时派出专家组，据说几个小时就把问题搞清楚了，而且发布了新闻。真是惊人的效率！有个美国朋友就这样问我：如果垮桥的原因如此简单，以至于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专家组就能立即得出结论，发布新闻，那么垮桥之前，安监部门、桥梁维修部门、交通部门和运输部门为什么都没有看出来而及时发布预警呢？

正好稍后美国也垮了桥，也立即成立了专家组，可是在说到事故原因时，专家组竟然说最快也得等好几个月才能弄清楚。科学和技术比中国领先了二十年以上的美国，桥梁事故调查的进度却比中国慢了好多倍，这简直是没有天理。调查一个垮桥事故，用得着那么久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找美国朋友聊天。一开始，他们竟听不懂我的问题，细细打听后才知道，原来他们都习惯了，政府对任何灾难和事故的调查，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序摆在那里，当事人调查，目击者调查，沙盘推演，经由科学实验提取各种关键数据，每一步都省不掉，而且每一步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想快都快不了。在美国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调查彻底而全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速战速决，那么不但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而且肯定是为了掩饰什么。民意和舆论的严密监督，最终成就了政府调查的客观和公正，从而确保了政府的公信力。

哪个民族能够独善其身？哪个国家没有天灾人祸？所不同的，只是对待灾难的态度。有些灾难可以避免，有些灾难却没有选择，然而政府如何处理灾难则是可以有选择的。我们看到，在信息公开、表达渠道畅通的美国，公众和媒体对灾难挖掘真相，榨取精华，锲而不舍，像变魔术一样，把一次次灾难变成一本本教科书，变成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这种对灾难的反思方式不但有助于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而且也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政治智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此文含敏感词，可能不适合你阅读

中国有些事就是不肯和世界接轨，我也搞不懂到底为什么。例如给音像制品、杂志书籍以及网站内容分类。有人说，那是因为我们不允许成人内容，一搞年龄级别分类，那不就等于承认了成人内容？其实，即便不允许成人内容，也是可以分类的，分类不光是成人内容和非成人内容，还有更细的。

就拿澳大利亚电影的分类制度来说，R 级类别表示成人内容，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买不到票，更不允许进入电影院。这类电影本来就很少，看的人也寥寥无几。除了 R 级外，其他的就多了。例如，M 级电影，意思是“15 岁以下人士不宜观看”，又细分为含有暴力内容和色情内容两部分。下面一个类别是 PG，意思是最好“由父母陪同观看”。再下面就是适合所有年龄观看的 G 级，大多是动画片。

有了这个分类，一目了然。儿子想去看电影了，不用担心他走进老爸老妈们的世界，如果他去看 M 级电影，就问那后面一个字母是什么，如果是 MV，表示含有一些暴力的内容，例如枪战和犯罪片，那去看看也不妨。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带色的类别 MA，就免了。这种分类简单易行，我们为啥迟迟不肯推行？

大陆的电影由于没有分类，所以出现了导演总是想加一些吸引成人和青年人的内容，而孩子们却可以大摇大摆进去。于是，相关部门就显得重要了，打着保护孩子的旗帜来搞审查，“咔嚓”剪掉不适合儿童的内容。这样做，等于是把成年人也当孩子管了起来。正如前段时间搞出了网络妈妈评审团一样，让全体国人都在“祖国妈妈”面前变成了孩子。这实在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特色，也是阻碍文化、文学与艺术创作的最大障碍之一。

由于影片没有分类，不止一次在中国电影院看到不到十岁的孩子同我们一起观看在开放的西方也会被定为 M 级的电影，有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你影片没有分类，如何让家长决定是否可以带孩子看？我建议，既然有关部门没有干自己最该干的事，有社会责任感的制片与导演推出一部电影时，比照西方的分类方法，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把自己的电影定一个“级别”，通过媒体传达给观众，方便家长和影院作出是否让孩子们观看的决定。

上面说的是影院，网络其实更应该搞分类。有人说，网络又没有人卖票、守门，你分类他不遵守，怎么办？其实，这不用担心，这种分类是用来提醒家长、约束懂规矩的好孩子的，在有过滤软件时，给那些公司提供信息。至于那些十六七岁，有强烈愿望要看 R 级内容的，你就不用管他了。一个可以偷偷摸摸不守规矩的青年人，也是早熟的，他能够看到，你就让他看吧。

为了给有关部门不停地提醒，也表示我坚决支持推行分类制度，我决定对于我的一些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的博文，在每篇前面都加上一个分类的标准，例如，此文不适合 12 岁以下孩子阅读。这其实是我早就有的想法，这想法在看到网站一位读者留言时开始变得强烈。

在我一篇博文《坐在马桶上才能够想明白的道理》的后面，有这样一段留言：“杨恒均伯伯，我妈妈是你的忠实读者，她总说这是大人的博客我看不懂，可我看懂了你这一篇文章

呀，我快九岁了，我们学校的厕所有时候也有你说的那么恶心，但我还是上前冲洗上后也冲洗，我要向我的死党们讲你说的这个笑话。——麦克”

我的读者中，像麦克这么小的当然不多，大多是跟着父母一起看，可是，未成年的，或者比上面这位读者大不了多少的却大有人在。我常常收到他们的信，以前用 MSN、QQ 等聊天时就更多了。知道了有这么一部分小小年纪的读者后，我就有些不安了，更何况经常收到来自妈妈们的抗议，说她们的孩子也在读我的文章，让我注意点儿语言。我写东西，特别是抨击时弊的文章，常常是随心所欲，什么话解气，就会脱口而出。有些身体器官常常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好像没有那些东西，光靠嘴巴说说、用手打打字，还不过瘾似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包含了这类词语的文章，以及隐含强烈性暗示的内容是不适合某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阅读的。人家的读物上都有一定的分类，而报纸无法分类，有些词语就不会上去，即便新闻中不得不引用时，也会打上××，就是西方的所谓敏感词了。

我的小说，例如《致命弱点》，应该是 R 级的，至于博文，一般都应该是 PG 的，当然，也有些是 G 的。今后，我会尽量减少使用“M 级”的词儿，让所有的博文都适合十三四岁以上的学生阅读。至于这个年纪以下的，最好由家长先阅读。

说到内容分类，我又突发奇想。你说，如果我们能够制定个人级别分类标准，甚至设置自制的过滤软件，专门过滤掉一些不适合阅读我们文章的读者，那该多好啊。写文章的人，本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但出于爱护一些特殊读者，有这想法也无可非议。例如，虽然我的文章一直很平和，以苦口婆心讲道理为主，但还是不时会刺激一些人，他们开口闭口就骂上了。听那口气，我也挺难过，不是我被骂了，而是我的文章竟然让人家如此不舒服，我心里愧疚。

还有一些读者，很不喜欢我又臭又长的篇幅，还有的不喜欢我的文风，可奇怪的是，他们却又忍不住要看。有一位读者甚至写信咒骂我，因为他前一天晚上一直等我的博文，结果博文出来后竟然有一万字，他看到最后几乎晕了过去。他老婆也很生气，估计也耽误了两人的好事。于是，两人一合计，第二天就给我写信了，迎头痛骂了我一通。你看，这是不是天大的冤枉？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给自己的文章定出另外一种“分类”，例如，此文章四毛（在网络上发一条支持某机构的言论，就能从该机构领取四毛钱的人）不宜，此文章不适合 20 岁以上人士观看，此文章不适合被洗脑过度的人士阅读，此文章含有敏感词，可能不适合心智发育不全人士阅读……

18 岁的儿子要看三级片，我咋办？

新华社消息：国家广电总局说中国目前不宜推进电影分级制。国家相关部门对国外电影分级制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得出了“在实践中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的结论。广电总局领导说，中国将会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办法。

看了这条消息，我是挺高兴的。我和一帮网友是希望相关机构尽快实行电影分级制，但相关机构始终保持沉默。这条新闻证实，相关机构其实也没闲着，做了大量工作，例如考察了实行电影分级制的国家，发现西方还存在很多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人群进入市场、影院、网络和网吧，观看并不适宜其观看级别的电影等情况。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考察报告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虽然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电影分级制，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个制度绝对称不上“非常成功”的，充其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或者说是目前最不坏的一种选择。这个制度最近就让我挺烦恼的……

再过几个月，我的大儿子就要过 18 岁生日了，这就是说，他从法律上即将成年，能够看定为 R 级（18 岁以下人士不得入场）的电影了。可是，他还在上高中，而且即将高考，再说，看他在父母面前的孩子样，我还真不想让他看那些连他老爸都顶不住的三级片……＾—＾＾—＾

这个不仅仅是我的烦恼，也不只是海外华人的烦恼，开放的西方父母们同样如此。例如，在美国，一些刚刚满 18 岁的女学生，刚过生日就向老师和家长“示威”似的走进三级片电影院，再看看那些还把她们当“小宝贝”的美国父母，满脸天就要塌下来的表情……

18 岁的孩子大摇大摆地走进限制级电影院，当然是因为有了电影分级制。电影分级不是规定，而是法律，任何电影院与音像制品提供者，向 18 岁以下的孩子提供这类产品，抓住了就会被检控，甚至要坐牢。而当这些孩子到了 18 岁，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就同时失去了禁止他们接触这种产品的权利。

中国也好，西方也罢，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想，绝大多数家长，只要能够延迟他们的“孩子”接触这类产品的时间，总是很乐意去当“独裁”的，而其中绝大多数人又忘记了自己当初是如何在 18 岁前就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并逮到机会就偷吃禁果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分级制不仅仅是保护未成年孩子的合法权益，同样也是保护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立法规定一个 18 岁的年龄门槛，绝大多数家长很可能用一切办法保持他们“孩子”的“纯洁性”到 20 岁、25 岁，或者直到结婚的那一天。当然，也有父母可能迫使孩子在未满 18 岁的情况下就结婚。

以上只是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来检视电影分级制。那么，如果提高到国家和国民的层面呢？国民中绝大部分人是成年人，他们看什么不看什么，是不是要国家这个“家长”来决定？国家是否又能以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为借口而剥夺所有成年人的天生权利？更重要的是，剥夺了成年人的权利，就真能够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吗？

电影分级制明确肯定了限制级文化音像产品的存在，而既然这些东西存在，就一定会有漏洞，流向未成年的孩子。正如只要有切菜刀，就一定会有人拿它去砍人一样。目前国际上对电影影像的管理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分级制，一种是如中国等国家一直在实行的：禁止任何限制级文化与电影影像制品。

完全禁止限制级电影，自然就不用分级了。按说，这种方式是对孩子们的最好保护，可是，如果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在西方电影院里，看到屏幕上正上映血淋淋的电影（一般定为

ＭＶ级：有暴力内容，15 岁以下儿童不宜观看），下面却坐着年龄不等的儿童，因为，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根本不知道那些电影是否适合他们观看。还因为，只要不分级，制造电影的成年人就会以跨越红线与突破禁区为神圣的使命……不分级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要就是把成年人当孩子对待，要就是把孩子当成年人对待。两种结果，都会造成社会法治沦丧、道德败坏。

然而，我还是希望，广电总局以及国家相关部们能够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别于世界各国的文化影像制品管理制度，既保护中国儿童的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也保护中国成年人的权利不被剥夺。

我们翘首以盼吧。

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做“偶像”

当“民主小贩”也有了“粉丝”的时候

今天谈谈“粉丝”和“偶像”现象。这原本只盛行于体育与娱乐等行业，可因为强大的互联网的传播平台，这种现象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连我这个写博客的，几年下来，也拥有了一小群的“粉丝”，还被少数年轻人当成了“偶像”。我这里说的粉丝与偶像，当然不是我们平时打情骂俏时使用的那个意义，也不是一些喜欢我的读者因担心我不再写文章而换了一个法儿的忽悠与鼓励，而是我从部分读者来信中真真切切感受到的。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喜欢一个人的文章，或者认为作者在文章里有意无意地炫耀出的某种生活方式很酷，从而变成他的粉丝，甚至生出“偶像”情结，无可非议，甚至可能比那些追逐电影和体育明星的“粉丝”更值得提倡一些。但具体涉及我个人的时候，我更需要的是读者，而不是“粉丝”。你追随、崇拜我文字里描述的那些吸引你的民主与自由理念，从而爱屋及乌，成了我这个人的“粉丝”，有些少不更事的还把我弄成了“偶像”。我得承认，这个现象我已经发现很久了，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讲。今天我就说出来，因为，这是我要向年轻朋友讲述的有关民主知识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看待民主与追求民主的人们。

我以前只是知道在演艺与体育领域，那些狂热的“粉丝”常常做出不理智的事。例如，2009 年我写了一篇短文批评成龙“中国人需要管起来”的错误论点。这完全是对当今年轻人负责，因为这个国家想要管起来的，肯定是这些年轻人，不是我们这些觉醒了的成年人，更不是权力、知识与财富三大精英群体。可文章出来后，竟然遭到成龙“粉丝”们的猛烈攻击。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即我发现更严重的是，在我们目前所在的圈子、所处的领域中，也出现了“粉丝”们因对“偶像”的喜欢与热爱而自愿放弃了独立思考，甚至不允许其他人批评自己“偶像”的现象。这就让我非常不安了。

对于我们来说，推销民主自由理念的最大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人能够独立思考、拥有自由精神吗？可如果你因为支持我们的民主理念而变成了“粉丝”，甚至把某些人当成了“偶像”，把演艺圈子里的现象带进来，不去独立思考，听见别人批评你的偶像就火冒三丈，我

想，那首先就证明我们没有把民主的真谛讲清楚。

下面，我先从民主自由理念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入手，谈谈为什么不能把追求民主的人当作“偶像”来盲目崇拜。民主理念最精华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可能有错。一位以推广民主自由理念为己任的民主传播者，难道不也是“可能有错”的人？可是你因为喜欢他的文字，喜欢他的某种生活方式，喜欢他推广的民主理念，渐渐喜欢甚至崇拜他本人，最终把他当成了“偶像”。久而久之，你开始把他说的一切都当成民主的真理，唯独忘记了他告诉你最有意义的话是“去怀疑、去批评”。结果，你不再怀疑，不再思考，甚至不再允许别人去质疑他——天可怜见，这难道不正是那些传播民主自由思想的人要带你走出的困境吗？

为了民主，请别把我当成你的“偶像”

在过去几年，读者给我写了上万封信件，其中不少年轻人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让我担忧的“粉丝”与“偶像”情结。成熟的读者早就注意到了，我一直在试图消除这种很能忽悠年轻人滋长崇拜心理的形象与环境。不久前还有一位老同志对我指出：“你文章中自我贬低的地方太过明显，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其实，只要用心的读者就会发现，网络上对我“光辉形象”有损的很多名词与说法，不是出于他人之口，反而是我自己提出与推广的，例如“民主小贩”就是一位网络上长期坚持辱骂我的读者用来讽刺我的，但我就把它推广开了，以至有一位青年读者见到我时脱口而出：因为人家叫你“民主小贩”，我还一直以为你很猥琐呢，原来是相貌堂堂啊^_^（允许我 YY 一次吧）……

我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很多涉世未深的读者确实把注意力从我的身上转向我的文章。可是，也有副作用。例如，有些读者千里迢迢找到我的住处附近，坚持要见到我才离开，我只好和这些同我儿子差不多年纪的孩子见面。见面的过程中，我一定会表现一些非常“世俗”甚至“庸俗”的东西出来，例如有一次我突然盯住一位女服务员问那位崇拜者：“她很漂亮吧？”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孩子对我的看法完全变化了，甚至看出他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有一次，另外一位小伙子就没有忍住，而是直接问我：“杨老师，你怎么能够这样啊？你是民主自由的导师，你是我心中的……”

这孩子哪里知道，我正是为了我追求的民主理念，才故意这样做的，民主的导师远远说不上，即便成为孩子们心里的偶像，我也极其不安。其实，在这些孩子们面前，我完全没有表现自己俗不可耐的冲动。可是，看他们对我的那份崇拜，本身就是我宣扬民主自由精神的失败啊！我不得不这样做，打消他们心中好像只有“偶像”才知道什么是民主，才懂得如何搞民主，以及搞民主的人都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非常有害的观念。对于所有追随民主自由的读者，先要分清楚一点：把民主自由与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分开来。

细心的读者，早就应该注意到我上面提到的现象。当然，与此相反的是，我文章中却同时充满了“高傲”与“高调”，一种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夸夸其谈”。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要自己打破装酷的“偶像”形象，一会儿却完全忘记了谦卑，忘记了低调。

我要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在说到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打破“偶像”，可是，当我们在宣扬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理念与普遍价值的时候，在追求我们的理想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毫不含糊，这个时候，没有“谦卑”可言的！

自相矛盾吗？不是，绝对不是。我们靠什么追求民主？是谦卑？是低调？是明哲保身？不是，绝对不是！靠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绝不低头的精神，一种高高抑起头颅的信仰！

我厌恶的是那种文风，他们在读者与普通民众面前，把自己换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冷若冰霜，可是面对某些力量的时候，他们却讲起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大多时候，“谦卑”得连个屁都不敢放！

为了民主，我一定要把自己当成“偶像”

我要求我的读者不要把我当成“偶像”，可我却曾经把一些追求民主的老师与前辈当成我的偶像，他们的言语与行动，多多少少启蒙了我，引导我走上了今天的道路。

然而，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对这些偶像的崇拜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崇敬、失望、破灭与再认识的过程。尤其是看到自己崇拜的民主偶像放弃甚至背叛了民主自由理念的时候，我一度对民主与自由都产生了怀疑。直到后来很久，当我也踩着他们的脚印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才逐渐醒悟过来，他们没有错，错的是我从喜欢他们的追求而把他们的人变成了“偶像”。他们尽力了，永远值得我尊重。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最好的办法，从一开始，我们就接受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当他们累了，退缩了，倒下去了的时候，我们新的一代又站起来，继续前辈和先烈的路，一路向前，等到我们力有不济的时候，我们会交给下一代。这里没有粉丝，没有偶像，只有手牵手一路艰难跋涉的战友……

写到这里，文章本该结束了，或者为正在探寻民主之路的年轻读者写的文章已经结束了。可下面，我却想对自己，也对许许多多和我一样，把推广与践行民主作为自己理想与追求的人说几句。

前面我对读者们说，我们不配当年轻读者的偶像，甚至不应该拥有粉丝，现在我对“我们”说：只要我还在用言论、用文章追求民主，传播普世价值，只要我还有一个读者，我一定会尽量把自己当成“偶像”——当成我自己的偶像！

我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和你一样，甚至远远不如你，我有一身毛病，有小心眼儿，常常会愤怒，经常想打架，还喜欢钱财与奢华的物品，看到漂亮女性会偷偷看几眼，还会……民主又是什么东西？民主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价值观，同时是一种制约权力、利益分配机制，更是一种目前在地球上大多地方变得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

普通的我，普通的民主，放到一起，却装起酷来，要把我当成我自己心中的偶像。为什么？因为很多年轻人通过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士接触到民主，通过阅读杨恒均，揣摩杨恒均，去认识、去体会民主。

最近温总理先后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朝野引起了震动。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社会

知名人士都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温总理主张的内容上，而是都试图从温总理的个人历史、做人记录与道德品质入手，试图去证明他将会“风雨无阻，至死不休”。

可见，哪怕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也常常把某个人的品德与他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也让我认识到，为了推广你的理念，你不能不重视自己的为人，培养好的品德。让人家先接受你这个人，你的主张才有可能被他们接受。我以前干过很多工作，也有很多同事与朋友，他们有些人还记得以前的我，因此有人发现我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这其中除了岁月留下的痕迹，很大程度上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我本人也发生了变化。

其一是信仰改变一个人，当我把民主当成追求的信仰后，我从世界观到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二是当我开始传播民主后，为了对得起我传播的民主，为了让年轻人看到一个完整的民主，我刻意去改变自己，克服掉一些恶习。我的改变当然是很不彻底的，但这改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在这里，我也要对那些同我一样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传播、推广并随时把民主付诸实施的朋友，为了你追求的民主理念，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能够做到言行如一，能够对得起你的追求、你的理念。在很多年轻人眼里，你说话像民主，你吃饭像民主，你交友像民主……你就是民主，他们从你身上要看到民主的魅力与力量。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接触的年轻人中竟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无法接受那些追求民主的英雄人物，而拒绝接受民主自由的理念。

我们都是普遍价值的“粉丝”，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偶像”。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该把任何人变成偶像，但我们却时刻用要求“偶像”一样的标准，要求我们自己。——谨以此段与读者们共勉。

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网络民意？

昨天（2010 年 9 月 25 日），我所在小区附近的地铁线路开通，我散步过去观光。在地铁站台上拍照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制止，随后我们有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他用对讲机招来了负责人。负责人向我解释了地铁规定：拍照可以，但要经过地铁公司同意。在我反复要求他给出禁止拍照的理由后，他向我透露：有些人照一些负面的照片贴上网，造成很大的麻烦，我们很被动。

地铁里禁止拍照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理由，例如太拥挤、拍照影响人流，保护工作人员的隐私，站在站台上拍照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等等。然而，担心“负面照片上网”为由的“禁止拍照”恐怕就不那么合理了，肯定是中国特色。

可这“不合理”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哪个国家网民们上传到互联网的照片，能够对公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造成如此大的“伤害”，甚至让一些官员与权贵落马、沦为阶下囚？一张照片有如此的威力，他们当然会紧张。这种“有图有真相”的网络记录，就是当今如火如荼的网络民意之一种。

“网络民意”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只要看看现在中国政府的多少决策是基于网民的意见，有多少贪官污吏落马是因为网民的揭露，就知道网络民意的威力了。

今日（26 日）推出的《2009 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说，“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 300 多万条，超过 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中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近三年来，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确实让“网络民意”如虎添翼，更有底气。可是，为什么网络民意越来越汹涌？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呢？原因很简单，作为民意一种的“网络民意”是无法靠传统的方法来疏导、控制的。就拿上面这段话来说，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坐到一起，都不可能每天处理 300 万条的意见，更何况这些意见很多是相反观点的。

试图用网络的方法疏导、控制民意的办法，无疑就给某些机构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拿拍照来说吧，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都在推广这种“禁止拍照”的规定，据说，连一些管理很不像样的长途公共车站也有保安专门制止乘客拍照，害怕“丑闻外扬”。想一下去年网络上一张东莞火车站上乘务员帮旅客爬窗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后的结果，我虽然写文章为站长说了好话，但站长还是被降职了。我想，今年春运期间，全国各大火车站，会不会也要挂出“禁止拍照”的告示？

西方也有互联网，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网民，可是，很少听到他们提到网络民意（有网络调查），更少听到政府的政策与决策是依据网络民意来制定的，更没有看到民主政府竟然从网络上收集管理国家的意见。

而且，你到民主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看看，有哪个公家的部门与单位会如此介意、忌惮网民的意见吗？你什么时候听说，美国或者欧洲的一个官员，因为网民的一张照片，就被撤职，被“双规”，被抓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到，澳大利亚的公共场合禁止拍照是工作人员担心“负面”照片上网？

换句话说，我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民主的国家里，“网络民意”能够如此搅动某些部门的神经，让他们担惊受怕，让他们哀叹“没有网络的时代真好”。

西方为什么没有这般强大的“网络民意”？他们有没有其他不借助网络的“民意”？当然有，但确实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强烈，换句话说，西方的民意被驯服了。

如何驯服的？答案很简单：迄今为止，世界诸国能够成功驯服、控制民意的方法只有一种，而且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了，那就是借助强大的“民意”，轻轻迈出一步，把“民意”变成“民主”……

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发明。这个制度把绝对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让以

任何形式出现的公权力都受到制衡与监督。民众通过选票选出管理家园、依法治国的领导人，民意的集中体现就是“选票”，选票挑选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必要去听你的意见，也没有必要听杨恒均意见，更不会在诸如“网络民意”面前战战兢兢，但他得倾听大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他就得下台。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民主。

中国需要民间智库

一位台湾知识分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在蒋经国威权时代，他一直写文章批评当局，自然是受到当局排挤，甚至被“有关部门”百般刁难的。他当然也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反要遭受这种磨难？

就在他有些心灰意懒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蒋经国的讲话，他开始只是觉得讲话内容有些熟悉，随即明白过来，原来蒋经国竟然大段大段地引用了他文章里的内容，促进行政改革……他当时就泪流满面……

时代不同了，集权和威权时代渐渐远去，互联网时代要想让网民和知识分子们“内牛满面”，还真不那么容易。否则，每天一打开新闻，就看到当局又听到网民的声音而从善如流，你就“内牛满面”，那还不把每一天都变成全国哀悼日了？

正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却也没有理由嘲笑那位台湾的知识分子迂腐，以及想为帝王师的心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即便受到打压也在坚持不懈的知识分子们，台湾的转型能那么顺利？

互联网对中国大陆的推动作用也许可以用一个假设来强调：如果没有互联网呢？可以这样说，从孙志刚之后，中国政府实施的任何一项新政与新措施，背后都有网民在推动。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倚重的“民间智库”，每一个活跃的网民，都是一位“民间智囊”，当然，最有益处的智囊，常常处境堪忧。

“民间智库”是中国的说法，因为在西方，虽然大多智库是有倾向性的，但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是“民间”的。官方办的“智库”充其量是解读政策，靠这些人给执政者出谋划策。

我在华盛顿智库工作时就注意到，每当有中国领导人要到访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总会亲自召一些智库专家进入白宫。令人惊讶的是，人才济济的美国政府，竟然在重要决策上都会听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库的意见，甚至在一些他们认为很有把握的决策上，也会花一笔钱去请独立智库弄出一个报告来，来佐证他们的计划，或者听听独立智库唱的“反调”。

有人可能说，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一定是政府的，他们也一样可以出谋划策，搞出成绩。作为智库，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当然都能够搞研究、出点子。但如果一个智库是有“上级主管单位”，经费是那个让他出点子的人给的，他能够搞出什么样子的决策呢？中国有多少所法律研究所？又有多少大学法律系？中国政府供养的法律专家何止十万？可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主动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而搞出一个禁止刑讯逼

供的建议书？他们的作用加起来，甚至比不上那个捅出“躲猫猫”事件的网民，以及那些不知名的留言者、顶帖者、发表意见者……

当然，把网络说成是“民间智库”是不恰当的，它毕竟只是大家发表意见的场所，是民意的集合地，而“智库”当然不只是简单地追随民意，而是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有深入的研究与广泛的论证，有分析有报告，有政策建议，这些就不是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散兵游勇的网民们可以做到的了。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民间智库，虽然在中国成立民间智库还有很多困难，可一些愿意与政府分忧，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不妨多多借用网络资源，凝聚网民的知识与智慧，为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出谋划策，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执政者则应该吸取中外教训，鼓励与支持民间智库，借助民间智囊的建言献策，弥补政府决策的不足与缺陷，为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与选择。

民主国家为何很少出穷人总统？

网友：你说穷人用选票，富人用钞票互相博弈，既然任何国家占多数的始终是相对贫穷的人，为什么西方选出的总统都没有穷人？更没有乞丐？是不是钞票控制了选票的原因？

杨恒均：既然是博弈，就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控制对方才叫博弈。西方没有穷人总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穷人”们一般不会选一个穷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你放心把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大家的口袋和公共事业交给一个连他的家庭都弄不富裕的人去折腾吗？还有，虽然我拿“穷人”和“富人”说事，西方大多国家里可并没有所谓“穷人”和“富人”的阶级对立。

其实，西方选举产生的总统很少有真正的富翁（美国历史上有几次大富翁参选，都惨败），大多是普通家庭出生，靠自己努力而达到中产。像克林顿等，其家庭财务并不那么好，但却在竞选时故意表现出“穷小子实现了美国梦”。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出身贵族世家，还当过部长，可他年轻时经济状况并不好，一度和老婆商量要把刚出生的孩子送给人家养。这糗事，他是不会在竞选中说出来的，否则，谁会选你？那些政客在争权夺利时以及等待接班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成穷人的样子，博得穷人的支持，上台后却大肆敛财，个个都是亿万富翁。

网友：你已经“五论民主”了，但还没有看到你说到人性与民主的关系……

杨恒均：我不准备说人性和民主的关系啊。说到人性，无非是性善性恶，或者中性。如果人性是不善不恶或者善恶参半的，就不会对民主有什么影响。如果人性是善的，那么“大家一起做主”的民主无疑是最好的形式。而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就更需要“大家一起做主”，从而限制某些人的邪恶本性无限膨胀。

网友：看了你“五论民主”，感觉你确实把民主的“画皮”剥了下来，杨先生心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只不过是富人与穷人博弈、官员“贿赂”民众以及大家像孩子一样按照“游戏规则”过家家？

杨恒均：我心中的民主非常美好，几乎完美无缺，但这个世界不完美，更没有完美的民主。所以，任何人都不要用心中理想化的标准去度量现实中的人或物，包括民主制度。我个人认为，对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的人谈论民主，最重要的是把民主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的本质一起说出来，只说优点或者夸大缺点都是忽悠人，如果忽悠成功了，那就是欺骗。如果你都说出来，周围的人还是认为可有可无，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你认为这样喋喋不休的写博文有用吗？一个维权比你一万篇博文都有用……

杨恒均：这话有些极端了。什么叫维权？维护权利，对不对？那么，中国人最需要维护的权利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民主权与自由的权利！我用博客扩大言论空间，说说民主，难道不正是在维权？维护《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也是赋予所有中国人的权利。

我尊重和大力支持各种维权事件，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千万别用一种狭隘的定义来贬低其他形式的“维权”，好像只有房子被拆、土地被占、人被欺负了，站出来才叫维权。要知道，维权事件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历史上有成千上万件这种为了生存权、土地被占、人被欺负而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先例——比现在激烈几十倍，结果如何？

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民主自由的权利为最高诉求目标，你顶多是让统治者发发善心，或者换一个皇帝……

网友：你的博文太浅显了，你能不能写深刻一点儿？别显得那么浅薄？

杨恒均：恐怕不容易。这和我水平以及我预设的读者群有关。再说，民主其实非常简单，有必要弄那么复杂那么深奥，让大伙儿都敬而远之？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天，我收到上次在广州凸凹酒吧见过的一位网友的来信，他提出我的博文能不能更深入浅出一些。他说，你能不能写一些文章给那些“卖鹅蛋的婆婆”和“洗脚的妹妹”看，你现在的文章她们看不懂……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学教员”，这不但是根据我自己有限的水平，也是因为这还是一个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希望的群体。加上，我也算是继承李慎之前辈的遗志，记得他生前说过，如果人生真有下辈子，他愿做一名中学公民教员。我这两年已经写了上百万字，民主的方方面面也大多涉及了。如果一个中学生能够抽点儿时间阅读一下，也许对他们有些作用，我的愿望也就达

到了……

网友：真啰唆，你的文章能不能写短点儿？

杨恒均：好的。

网友：请问……

杨恒均：下次吧，已经 1760 字了，不能再长了……O(∩_∩）O 哈哈~

第三辑 天下

我在“9·11”现场发现了美国政府的大阴谋！

和朋友经过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看到现场被密密地围起来了，不过，好像并没有减少络绎不绝的游客们的兴趣，其中不乏来自各州的美国人。“9·11”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似可从美国游客脸上看出挥之不去的阴影，很沉重。有一些美国人，表情更是十分肃穆，和围栏上的一个花环，或者简单的一行字合影留念。

看多了美国人平日吊儿郎当、嘻嘻哈哈的样子，对他们一本正经的德性我还真有点儿不习惯。想起前段时间有媒体发布“9·11”现场施工缓慢的深度报告，我擅长编撰悬念小说的大脑立即产生了一个“阴谋论”：美国布什当局故意拖拖拉拉，保持“9·11”现场原样，不让新楼房盖起来，为的是提醒美国人“9·11”的残酷，为伊拉克战争找动力，以及把这个地方变成美国反恐和爱国的“圣地”，供美国人朝拜。

就在我为自己编造的阴谋论自得其乐的时候，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横幅和几个示威的美国人。横幅上写的是：“9·11”是内部人干的！

在到处都是警车的美国人民爱国的圣地，竟然出现了示威的一小撮儿，我和朋友停下来观看，这时很多游客也聚拢过来。我过去问那个显然是他们中的负责人的高个子白人为什么要示威。他随手递给我一份印刷很精致的传单，说，你可以看看。小册子上的标题是：你应该怀疑！

小册子以各种他们认为是事实的证据试图证明：“9·11”是美国内部人干的，就是政府或者中央情报局或者布什家族干的。我问那个头儿，后面那些警察不干涉你们吗？我朋友也问，你们在这种地方挑战美国政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个身上挂着牌子的带头人说，警察是例行值勤，我们是和平游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说，他们每个星期六固定到这里来打横幅抗议，散发传单，揭露美国利益集团的阴谋，向人民讲真相。

“9·11”是美国政府的阴谋？显然这几个哥们儿比我更能够忽悠人，我刚刚想到的阴谋论哪里能够和他们的相比？人家的那才叫好莱坞大片，我为自己想象力的贫乏感到惭愧。不过，他们可不是在构思小说，他们是在抗议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政权，这就让我觉得既不

可思议，又佩服他们的勇气了，毕竟，那拉登自己都承认是他干的了，你们还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折腾个啥呢？

我特意观察了围观他们的游客，特别是那些持美国口音的人，他们都很好奇，但看得出来，没有一个人相信这几个哥们儿的阴谋论。可是，他们都很礼貌地听示威者解释，客气地接下他们的传单，然后继续去表情严肃地凭吊爱国“9·11”现场。显然，他们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在美国人看来，你可以怀疑任何事情，哪怕是“9·11”这种连拉登都已经承认了的事，你不但有权怀疑，而且，你还有权在任何地方把你的怀疑说出来，发送传单，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大概就是美国言论自由的极致吧，只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其实，我也注意到，在美国由于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对普通的所谓“言论自由”你也就不以为意了。也正因为如此，只有这种极端的例子，才常常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拿我来说，我记得的一些关于美国的言论自由的例子，几乎都是很不寻常的，有些另类，有些搞笑，大多都很夸张。也正因为这些例子，让人对美国的言论自由有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对于那些说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虚假的人，怎么也没有办法解释：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竟然允许在国难“圣地”——“9·11”现场固定摆摊揭露政府“阴谋”，抗议最高当局，给前来拜祭的人士发放鼓动怀疑和揭露政府的宣传传单。

这时候，我突然浑身一紧，啊哈，我擅长写阴谋论、制造悬念小说的脑袋顿时开窍了，于是这样一个更离奇、更惊悚的阴谋论诞生了：

“9·11”后美国为了反恐，在人权和言论自由上大踏步倒退，全世界人都对美国的言论自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布什的亲自领导下，决定在美国游客最多的“圣地”——“9·11”现场设立一个展示美国言论自由的窗口，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国依然是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搞，就搞苦肉计。不过，要搞苦肉计，却又不能真正伤害到美国政府和国家利益，于是，要弄一个一看就知道是虚假的东西。

于是，中央情报局从一帮流浪汉和无业游民中挑选了几个口齿清楚的，让他们每个星期六到“9·11”现场去攻击美国政府，去揭露白宫的阴谋。这阴谋一定要编造得非常离奇，离奇得让人一听就感到可以不攻自破。

于是，就在美国纽约“9·11”现场的东边街道上，出现了正好被我撞上的聚会示威活动。而我这个中国人，正好就被中央情报局给忽悠了。因为，即便你完全不相信美国政府的阴谋，当你转身离开这里的时候，脑袋里一定会想，上帝呀，美国宪法竟然允许公民在这样的地方定期集会、示威和散发传单，政府和警察完全不能干涉？真是一个言论多么自由的国度呀。你忍不住祈祷：上帝保佑美利坚！至少，我转身离开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充满了崇拜之情。

如果美国警察动了我的阳具

十几年前第一次踏上美国时，我心里就对美国警察充满了怨愤，且不说在我看到几乎所

有好莱坞大片中，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警察都是和人民为敌的，在洛杉矶暴乱中美国警察打黑人的镜头还在我脑海萦绕，当然美国华人估计也饱受这些以白人为主的警察的欺负。所以，从抵达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在默默盘算如何对付找我茬的美国警察。

我甚至都设计好了场景，预演了和警察冲突时我的言行举止，以及如何把场景记录下来（以录像为主)作为呈堂证供，想到我用自己的心计击败美国警察，扬眉吐气在美国的法庭，那个带劲呀，一言难尽。问题出在一等再等，都没有等到警察来找我的茬儿，找他们办事也是按部就班，事实上，出国十几年，除了有一两次开快车被躲在角落的警察开了罚单之外，我几乎没有和美国的警察讲过一句话。

看到那些警察老老实实工作，一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样子，我的警惕性渐渐弱了。不过后来了解西方多了些，我就生出了另外一个心眼儿，那就是他们不招惹我，我得想个办法招惹一下他们，最好能够激怒某个白人警察，又或者碰上一个喝醉酒的当班警察，然后在我隐藏的镜头下面，被这个倒霉警察痛打一顿，最好能够朝我的阳具踢两下（估计不会阳痿），但我将计就计，然后——哈，哥们儿，我不但发达了，而且终于被我逮到侮辱美国继而弘扬正义的机会！

我首先要假装阳痿，到医院开一个证明，然后，我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白人、黑人、黄人和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混种人，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美外（美国和外国）记者招待会，当然，会特别请 CCTV 驻华盛顿记者参加。会议上，如果想到美国这些年对中国的欺负的话，我还会声泪俱下，进行现场控诉和宣传。

一、白人警察在踢打我的过程中说了一些话，我想应该是“打死你这个中国佬”，但我不能确定（以防他们使用测谎仪——那玩意儿我对付不了）。我的这句话一出，全美国和西方就会轰动，我也立即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二、痛诉美国的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观，美国人自己最吃这一套。大家可以注意，美国每一个阶段都有严重的争议，但几乎都涉及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观。以我的知识和三寸不烂之舌，我绝对会让美国人为他们的警察动了我的阳具而开始怀疑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我会顺便控诉美国政府，作为公权力最有代表的警察对一个普通民众动粗——就这一点，我身后会立即聚集一大批同情我的美国人民，当然还有世界人民，以及好几亿大陆的愤青兄弟。

三、帽子戴上了，还要来点儿实际的。我以尖细的带点儿太监的腔调宣布：我被打了，而且下面翘不起来了（谢天谢地，他们总不会在法庭上当场挑逗我，让我立马擎天一柱吧），造成这一悲剧的是肩膀上挂着“金色盾牌”的美国（人民）警察，请各位美国人民（其实是那个肥胖的法官和几个傻瓜似的陪审员）为我做主。如果他们犹豫了，我会立即补充一句：你们知道不能尽人道的痛苦吧？再说，如果我有机会在你们国土上弄出一个孩子，那孩子就有权利也有可能参选美国总统。可是现在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你们的警察表面上是把我的阳具打趴下了，实际上却是打倒了一位潜在的美国总统。

四、还有，作为一名经常描写性行为的作家（也就靠这一点卖钱吧），我失去了这个东西，等于失去了致命武器，今后我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会损失很多稿费，如果大家认为我的书反正也卖不出去，那么请各位想一下这种情况：凡是卖不出去书的作家，如果一意孤行地写下去，一般都能够弄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各位美国同胞，现在你们更清楚了。

你们一个充满种族主义的警察，不但把一个潜在的美国总统消灭于精子状态，而且也让这世界上少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五、鉴于以上种种，就算我对你们的普世价值情有独钟，不计较我那硬不起来的小弟弟，但我精神蒙受的损失总得有人负责吧。否则，你们今后还有脸去亚洲推销普世价值和人权？

哈哈，说到最后大家也就明白了，以我对美国的法律和舆论的了解，我想，我开出一个亿美金的赔偿绝对不夸张，估计至少能到手五千万美金。当然，钱很重要，有了钱，就算小弟弟真受了点儿委屈，后面照样会跟一大帮如花似玉的 MM。可是，我也不完全是为了钱呀，我要用这个机会，把美国的普世价值和他们标榜的不歧视政策尽情嘲笑一番，顺便为我们大陆的愤青报仇雪恨。

各位，我是在说故事吗？完全不是，这种事情不但发生过，而且还会发生。生活在西方的人，必须明白，一个普通民众如果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权的公权力的欺负，必须奋起反抗，你会得到所有媒体和所有民众的支持的。几年前就出现过一位中国妇女在纽约被美国警察打伤的事件，后来听说赔偿了两千万美金。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国民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被打伤，就会赔偿这么高额的精神损失费？难道那些国家不是经常有人被打死打伤？

不错，经常有人被打死打伤，但如果是被国家政权特别是警察打死打伤，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要搞清楚，我说的是公权力，来自政府和政权的，包括警察等。他们打伤了人民，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这和你倒霉的在街上被小混混痛打一顿完全是两回事。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爱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国家关进笼子里，保护人民不受来自政府权力的欺负。生活在纽约的美国人可能会被打劫被强奸，他们只好认倒霉了，但受到来自政府例如警察的骚扰，那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最后都会在讨回公道的同时，搞一笔好几代都吃不完的美金。这样的官司经常有，媒体会广泛报道，成为民众对付政权的标志，也自然成为对那些当权者的警告。

真让人郁闷，估计是美国人都玩过太多次，所以，这些年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我——搞一笔钱和侮辱一下美国佬——设计来计划去，就是没有办法和警察冲突起来（当然不能去打警察），也抓不住他们欺负我的任何把柄。后来我也想过，估计那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对我了如指掌，也知道我是个刺头，所以不惹我。于是我就在和华人交往中，经常询问有没有受到严重歧视的案例，如果有证据，我们可以一起捞一笔意外之财，结果也是让我很失望的。

不过，两年前我终于逮到了机会。话说新西兰有很多小留学生，其中一些和我关系不错。大家有机会见面时，有小留学生对我说，新西兰警察非常强硬，往往欺负开车的华人小留学生，知道他们有钱，也大概不懂得法律，就乱开罚单。我一听，眼睛都亮了，立即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就飞到新西兰暗中设立摄像机，抓一个歧视留学生的案例。这些孩子不知道，但我太清楚了，如果我能够弄一个这样的案子，能够抓到白人警察放走白人而对亚洲人开罚单的证据的话，哥们儿，我发达了！

于是我详细了解情况，虽然有很多迷惑不解的地方，但基本上了解清楚了，最后我问，好，出示你们的驾驶证，让我看看你们是什么类型的驾驶执照。各位，见财化水的事我真不想提了。结果是这样的，这些小留学生十有八九竟然没有驾驶执照！——新西兰警察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只能罚款。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地人就算有天大的

胆子，也不敢在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开车上路。我可以理解一个小留学生要取得驾驶执照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国土上去无照驾驶，让我说什么？也许他们歧视了你，但你却在一开始就歧视他们整个国家和人家的价值观（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所改善没有，大家不妨调查一下）。

当然我还会关注，如果有华人华侨，认为自己有确凿的证据，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设一个圈套让白人钻进去，获得证据的话，请立即和我联系，大家共同富裕吧，还能够把西方侮辱一番，算是曲线爱国，何乐而不为？

说到这里也许该打住了，但我心里却有些许的不安。我在想，如果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不是这么“变态”的话，如果有个白人警察动了我的阳具，而我投诉无门的话，我会怎么样？这些年到底有没有华人华侨在西方受到了冤枉？被白人警察打了却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应该有一些，但那肯定是他们不知道法律，不知道在民众对付政府的案子中胜出的机会很大（和解的话，也能够得到大笔赔偿金）。具体说到我的案子，就是我的阳具最大，大过美国警察的权威。你如果不抓住机会告他们，你自己损失了金钱不说，而且大家都不会原谅你——因为你错过一次教训、教育执政者和掌握公权力的那些混蛋的机会！

如果没有公开的媒体，自由的舆论和独立的司法，那么我能够在美国获得什么？那个在纽约被打的中国女人能够得到多少赔偿？我很怀疑，毕竟几千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的阳具被美国警察弄坏了，我无法伸张，没有报纸报道我的故事，因为报纸和警察都被同一个人管着，公权力沆瀣一气对付普通小民，我能怎么样？我告诉你，没有了阳具，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一定要用自己所学的中国功夫，把那个动了我阳具的警察阉割掉，而且还……

我太冲动了！我那上海的杨姓兄弟，你怎么和我的性子一样，那么冲动？你如果在我身边，如果在美国或者澳洲就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们一定好好计划一下，请一位律师，把他们告到法庭上，然后发一笔财。鉴于你的阳具受损了，你拿大头，我只要一个零头就够了。再说，我的目的又不是钱，我主要是想借机侮辱一下西方人的人权纪录和价值观，让我们中国同胞扬眉吐气和坚挺那么一次……

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就我的一段经历和思想变化与青年网友交流

我为什么不删除愤青们的留言

今年（2007 年）3 月份在国内和讯网站开了第一个博客，9 月份又在网易开就了第二个博客。在这两个博客上，我写了一些评论、杂文和日记，我以前只写过小说。在读者和网站管理员的支持下，两个博客都还热闹。

青年网友中很多是认同我的观点的，这让我大喜过望，但也有不少网友无法接受我的观点，特别是对我文章中处处批评祖国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表示不理解甚至反感。支持

我和反对我的网友在博客留言中也就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极：支持的相见恨晚，赞扬有加——有些过誉之词让我都不好意思；反对的慷慨激昂，口诛笔伐，有些更是竭尽侮辱之能事。至于我，当然不能免俗，自然也是对赞誉的沾沾自喜，对批评的心有余悸，但我得私下承认，批评的留言往往让我过目难忘。

不少读者的批评确实值得我揣摩和深思，有些弥补了我经历和认识不足造成的缺陷，我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和攻击完全是无厘头，其中大部分是一些青年网友，一看到我批评中国的文章甚至标题就义愤填膺，激起平时深藏难露的爱国热情，对我一通攻击甚至辱骂。看过我博客留言的朋友就知道，2007 年就因为我的几篇博客文章，我不止一两次地被戴上反动势力、反华势力、汉奸、（可能的）台湾特务、美国和西方的走狗等高帽子。

显然，我遭遇了传说中横行网络和现实中国经年的“愤青”。我很想写一些回帖与这些愤怒的青年们谈一下心或者讨论一番，可是，再一细看他们的帖子，就发现根本无从回复。例如，你批评了一下社会中某种不好的现象，他们就指责你，为什么看不到我们社会的光明面？

你怎么回答呢？除非你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出现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数落一遍，否则他们不会满意的。我当然也不会把光明面都写一遍，再在末尾来几句“中肯”的自我批评，如果那样行文，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了，体制内的所有宣传和媒体都在干这活儿，轮不到我。

再如，很多青年网友质疑我，姓杨的，中国人民把你养大，你到海外住了那么久，怎么只看到你文章中批评中国，不见你批评美国？你不是美国的走狗是什么？

还有一些留言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以致在深圳和一位网友聚会时，他愤愤不平地说，看到那些愤青在你博客无理取闹，我恨不得顺着留言者的 ID 找到那些家伙，把他们一个个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开窍。

我哈哈一笑，不过心里就想，我更不能留言回复了，免得争论进一步激化。不过，我不回复，那些愤青的留言也并不见减少，有些越来越激烈，我于是也就从反华势力的代言人一步步变成了“汉奸”和“特务”。好心的网友就来信建议我删除一些过激的留言和评论，——毕竟我是博主，是有权力删除我博客上的留言和评论的。还有的网友知道我很忙，经常在外面跑，答应要为我管理博客，随时帮我删除愤青的帖子。

我都婉拒了。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删除任何一个批评和攻击我的帖子。我不删除留言和评论的理由很多，最冠冕堂皇的当然是“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曾经和这些给我留言的愤青一样，也是一名愤青，而且，我知道也理解我们都是怎样成为愤青的……

我曾经是最牛×的愤青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现在的愤青都不会用了耶），我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都是国家和人民支付的，一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大学毕业又直接分配到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工作，有吃有喝，如果说我不知道感激，听到人家批评自己的祖国不愤怒，那是很不符合

逻辑的。

中国是盛产愤青的地方，在那样的教育和那样的宣传下长大，你不是愤青倒不合常理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愤青。不过，和普通愤青不同的是，出学校后我从事的是外事工作，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给我充当愤青的对象不是中国同胞。

我很理解现在一看到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帖子就怒发冲冠的年轻人，毕竟我们都受到了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对批评中国的声音之敏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我就怒火中烧，好像人家要挖我的祖坟，又好像我生活的支柱马上就要被破坏。虽然由于外事纪律我不能火冒三丈，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为中国辩护，有道理时我得理不饶人，没有道理时我也强词夺理，总归要么把外国人弄得"理屈"，要么弄得"词穷"，我才会鸣锣收兵，心安理得地自以为爱了一次国。

当然，我当愤青最辉煌的经历不是在中国，而是到了美国后。

1997 年 8 月，香港回归一个月后，我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一个叫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来美国的路费完全是自己出，介绍我到那里从事研究工作的是我的恩师和朋友，生活费也靠自己打工，研究费用我自己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我私人朋友赞助，我不从中国或者美国政府或者依附于它们的任何机构中拿一分钱的经费——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到今天（2008 年 1 月 27 日）为止，像我这种既不从国家和政府、也不从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拿经费到华盛顿这种级别的智库从事和国家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就一个人，就是我杨恒均。

我最初自费到美国的目的也许是想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亲眼看看美国到底如何强大，为什么强大了这么多年，诀窍在哪里（见我的散文《魂断罗湖桥》）？但大家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台海危机持续发酵，中美对抗一触即发，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朱镕基推动的改革遇到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这个在国内就是愤青的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又如何能够冷静下来进行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那两年，我可以说是拼了老本儿在捍卫中国的尊严，有记载的就包括我和美国国防部将军们、中央情报局外围研究人员、台湾"国军"访问学者、来访的陈水扁（当时的台北市长）等讨论和争论的记录，我听到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人在我面前批评、攻击中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管他们的攻击和批评是否有道理，总之，中国人的事，我们会处理好，不用他们管。我用我有限的知识，与他们抗争，经常搞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是不欢而散的。

当时就有几年前来美国的华人朋友婉转地劝我：小杨（那时我还是小杨呀），你不是公派，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却在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辩护，你是何苦？你也不觉得累？你看看周围的华人，有几个像你这样？你现在是在美国，赚钱要紧。再说，你今后还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何苦和美国人作对？你不害怕吗……

华人朋友说这话，现在的愤青朋友可能不理解，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到外国，首要问题是生存，而我当时在研究机构里是根本无法赚钱的，如果没有资助（例如来自政府或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 NGO），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研究机构混。事实上，在中美关系、

台海关系最紧张的 1996、1997 两年里，整个华盛顿最有名的研究智库，像我这种大陆来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当然也有一些公派的、拿着大陆纳税人的钱过来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大多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很少有我这么积极的。

可我乐此不疲，也不害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在为祖国辩护，就像我当时在国内做的一样，浑身是劲。第二，我有愤青的激情和热情，我是愤青我怕谁？当然我得承认，在世界反华的大本营——美国为中国辩护，确实是很辛苦的，加上我的知识有限，水平不高，那场景可想而知了。可我还是像堂吉诃德一样，充满激情，于是，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一条街道的办公室里经常上演一位愤怒的中国青年舌战美帝将军和学者们的场景。

现在，我早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也不再是当年的愤青了，但我始终认为，愤青心中那股憋不住的爱国热情和对一些自认为邪恶事物的愤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们的问题是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爱国。

在美国，我找到了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

和现在的愤青一样，当时的我听到那些批评中国、说中国不好的话，总要跳起来辩护：也和现在的愤青一样，都或多或少受到知识和经历的局限，经常结结巴巴甚至理屈词穷。例如，我现在写文章针砭中国时弊，总有愤青过来叫骂，其实，我的文章当然有不足之处，由于经常是在飞机火车上一蹴而就，漏洞很多，有些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有些人如果知识积累多一点，经历再丰富一点，很可能对我言传身教一番，我也会虚心倾听。可是，所谓愤青也就是只知道愤怒而不懂得讲道理的，在他们那里，爱国、爱党和热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被烧红的烙印硬生生的烙在了当时还没有发育好的大脑里，使得他们自小就认为尿布里渗出的都是真理。

这在中国目前还行得通。例如在当今网络上，愤青们仍然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大多网站和论坛管理员一般不会删除愤青的帖子，要删，也是删除那些激起愤青愤怒的帖子。

可是现实不是网络，特别是在美国，当一名愤青可不那么容易。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发现不分青红皂白地为中国辩护不但让我感到力不从心，而且美国人也对此失去了兴趣。不过，美国人可没有失去批评和攻击中国的兴趣。所以，作为愤青，我还得愤怒，还得战斗。

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再干巴巴地为中国辩护，而是以毒攻毒，转守为攻，主动批评和攻击美国！

一旦找到了突破口，简直是如虎添翼。说实话，为中国辩护我力不从心，但批评和攻击美国我则是得天独厚，很快我所受的教育就派上了用场。从此以后，当美国人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我立即攻击美国的人权——呵呵，想起来，我比咱们的外交部长更早地使用“美国的人权也不咋样……”这样经典的句子。

当然比起国内的愤青，我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我在国内外的经验都丰富，体制内、体制外都混过，对美国的社会也有不浅的认识，加上我拿得起，放得下，心无成见。静心比较一下，我确实可以找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的弊端和弱点。例如，虽然我承认美国人

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完美的一种价值观，但对于他们向世界各国推行这种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以及那种让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派我很不以为然。记得当时我曾经指责美国人在处理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上过于简单，有时又偏激，并直言这样会引起极端主义的报复。美国人都是一笑置之。可是，我就感到很紧张。于是，找个机会把儿子从华盛顿送到澳大利亚。结果，在送走后的第二年，在我华盛顿住处窗口外边，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在五角大楼上。

后来我继续告诉华盛顿的美国朋友，如果你们不改变一下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建议你们自己也赶快搬离华盛顿。我说，在全世界都在学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美国人最好能够学会如何与全世界人相处。否则，等到核武器很容易制造的时候，我担心华盛顿迟早会被袭击。

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我的很多对美国的批评甚至攻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让我感觉到自己有道理的正是美国人。我以前就说过，我并不是学者，也不知道如何搞研究，我一下子到了那样的顶级智库有点儿手忙脚乱，加上我见人批评中国就跳起来反击，结果，一开始并不顺利，也不受美国人重视。可是，恰恰在我开始把心思放在如何找到美国的弊端和弱点并揭露、批评后，美国人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了。

就在我要离开理事会时，竟然有好几个研究机构包括海军的研究机构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项目，这可是大出我的意料。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自知之明，我一看研究报告就头大，哪里能够参与一些重要的研究项目？可是人家美国人就偏偏要请我——才三十出头，要学历没有学历，要知识没有知识，也就一喜欢观察的愤青，人家美国人看重了我什么？

原来他们看中的竟然是我那逢美必反的愤青性格，以及批判美国政治和政策的独特角度。他们竟然要出钱让我骂他们，愤青当到这个分上，夫复何求？！

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

美国人对我另眼相看的原因，那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美国社会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当时中美关系很紧张，虽然中美之间有学术交流，也有高层和民间往来，但像我这种总是把眼睛盯住美国的各种缺点的愤青并不多，至少到美国这种高级智库的就没有几个。而美国人也发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注重高层和学术界、军界的反映，也需要听一下来自民间的声音，包括来自愤青的叫嚣。

那一段经历是很牛的，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即美国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然后来一通冷嘲热讽。想一想不可思议，前段时间，我自己出钱为中国辩护，现在美国人出钱请我来批评和攻击他们。

当然我也不是一般的愤青，要批评美国，而且要批评得与众不同，可不那么容易，毕竟美国人好像从上到下都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和美国人比起来，我显然有他们无法企及的经历和知识，这种经历和知识上的欠缺在很多场合显露出来。

记得 1998 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游戏中，我的意见让美国军事专家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模拟朝鲜突然出兵韩

国，中美介入朝鲜半岛的模拟战争。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韩国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游戏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很无知，以致在他们玩得正开心时，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这两个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们整个游戏的错误发展方向，最终使得这场严肃的模拟战争推演搞得真如一般的游戏了。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

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嫉妒它比中国强大，比中国富有，更不用说西方人那种根深蒂固的看不起中国人的德行，所以我才是一个愤青。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的办法。可是，我不是刚刚到美国，我现在心里已经慢慢明白了，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人民效劳呀……

那时我在美国也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为了学好口语，每天晚上趴在电视机前从一个时事节目换到另一个时事节目，没有时事节目了连脱口秀也不放过，看了这么久的美国电视节目，再顽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媒体上几乎所有的时事节目都是批评美国的，不是批评美国政府，就是批评美国社会，或者其他什么的，歌功颂德的只有政党花钱买的竞选广告，没有人看。

再追溯远一点儿，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以致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历史，不是一直在这种批评中发展和前进？美国的制度有什么了不起？从设立之初看，几乎千疮百孔，连奴隶制都无法废除，可是，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允许来自民众的批评和监督，这个制度本身也在批评和攻击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顾准不是在多少年前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而我却要等到多少年后飞到美国，住在那里，到白宫附近的研究所上班，每晚坐在电视机前，才逐渐体悟到这个道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国富民强、社会和谐、政局稳定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有飞机大炮和核武器，不是他们的政府控制媒体搞强力宣传，也不是他们可以印刷美元，而是他们把批评这个武器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媒体，用批评来监督政府、当权者和各种利益集团，从而使美国的制度可以不断完善，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无法与时俱进。

现在来促使美国更加强大和完善的人中又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愤青——杨恒均，呵呵，青年朋友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在西方国家赚钱有很多方法，搞研究是赚得最少的，我之所以不选择更赚钱的职业而在这里批评和揭露美国，总以为是在维护中国，觉得很有意义，可哪里想到，我这个愤青一直在为美国服务？

为美国人民服务，未尝不可，可在骨子里，我就一愤青，如果批评一个国家能够让它不断改进，能够让它越来越强大，我没有理由去批评美国，对不对？如果批评这个武器能够让一个国家强大，那我也应该批评中国而不是美国，对不对？

批评中国而让她不断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听起来是不是特幼稚？哈——没办法，当时就这样想的。现在写下来，却觉得逻辑简单

得有些可笑，其实人生并不复杂，支撑我们一生的道理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再说，这也是我如假包换的心路历程，没必要掩饰，也没有必要添油加醋。

一旦意识到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为美国人民做贡献的时候，我也就失去了任何批评美国的兴趣，毕竟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祖国。再批评下去，不停地帮他们找弱点，找缺点，敦促他们改正，那中国不是要和美国差得越来越远？在愤青眼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帮助他们建设和谐社会，才是汉奸行为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曾经独自思索，我一听到人家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就暴跳如雷，真是在维护祖国吗？当时我心里是不是真认为中国什么都好，没有必要改进了？或者是因为后来我出国了，看到了一些在国内看不到的，开阔了眼界，作了对比，才发现中国其实有很多值得批评、需要改进的地方。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第一是我以前在国内被洗脑了，对西方很仇视，这次在国外看到了一些好东西，想带回国内；第二就是我在国外时被洗脑了，或者说精神被污染了，被弄得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事实是，到此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知道读我这篇文章的不仅仅是青年网友，也有一些老师、学者以及我的同辈人，他们中一定有一些人会冷笑着说，杨恒均，你丫也太幼稚了，你竟然直到 1997 年后思想才发生变化？

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是的，比起很多靠读了启蒙的书就能够从善如流的老师们，我真是惭愧得很，我有点儿愚笨，而且有中国农民的顽固，要接受新事物总需要眼见为实，可谓不见棺材不掉泪。虽然在大陆时，我也对丑恶现象发几句牢骚，但在骨子里，我不但不知道如何避免这些丑恶现象，而且我自己也和这些丑恶现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让我靠他人的几本启蒙读物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到了国外，到处流浪，再次回到大陆，加上读了几本书，我的思想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变化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变化就是对批评在政治和社会进步中作用的看法和认识。我认为西方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批判的精神。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限制对它自己的批判，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是批判的历史，越批判越改进，也越进步。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权威是所有批判对象中最大的目标，其他的重要目标还包括所有的既得利益者。

当我在自己切身观察中发现这种充斥在美国政界和社会各层的批判正是帮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后发国家无法逾越的困难时，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且不说太远的历史，就拿 1949 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和年轻的网友说，我想就算我们抛开制度问题不提，仅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看，大家不会不注意到，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声音，跟随这种声音被打压的过程，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有人说，现在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其实，历史都是很相似的，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同了，但在大多方面还是一样的。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改善得很快，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没有值得批评和改进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国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改进，

而且有些大的弊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中国迟早会重返历史的怪圈，重蹈历史的覆辙。什么覆辙？我说不好，但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儿作为参考，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很多时候都走在世界前列，也比世界其他地方富裕和繁荣，但一次又一次被打回到原点，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动荡、分裂和残杀。

中国在进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外国到中国，我想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感觉到这种进步的存在——我自己包括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这种进步的受益人，我为此无数次在内心欢呼。可是这种进步是不是和历史上屡次出现的那种短暂进步一样，随时会因为根子上的东西和积重难返的积弊而土崩瓦解，回到原形？

爱国有很多方法，工人在捣腾中国制造，科学家在搞科研，士兵在准备打仗，情报人员在四处搜集科学技术和政经情报，学生们在认真读书，海归们一边赚钱一边把海外学到的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

至于我，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发挥我之所长，批评她各种不足之处，揭露有待改善的地方……

我害怕吗？

常常有人问我，在网络上写文章，最让你难过的是什么？最让你快乐的又是什么？我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而最让我高兴的则是我得到了更多的朋友。

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体制内，在共和国各个要害部门工作的至今已经都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朋友。我失去他们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太敏感、太危险。这让我感到不爽，也感到很遗憾。

当然，这些不爽和遗憾与写文章得到的“好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好处是让我最快乐的。自从写文章后，我认识了更多的人，除了一些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但一直被我忽视的“小人物”外，还有大量的网络朋友从虚拟的世界来到我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愤怒着我的愤怒，希望着我的希望，也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顺便说一下 2007 年初的一件事，当时在广州和沙叶新老师聚会，我说，好久没有看见沙老师的著作了。我还根据沙老师的丰富经历、敏锐的观察力和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断定，他如果写长篇小说，一定很棒。沙老师透露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又叹息道，时间太少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我很不以为然，我知道要想创作长篇小说，必须停下手头其他的创作，完全沉入其中，不可能兼而得之（所以就连鲁迅也无法写出真正的长篇小说，因为他要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的杂文）。我当时就对沙老师说，你少写点儿其他的，特别是博客文章，集中精力写小说。我这样说，是很希望像沙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写几部反映当今现实的传世之作。

我话音刚落，沙老师叹道，那些小文章我确实没有时间写，可是……看看博客上网友的支持，总感到不能不写……

沙老师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我不但自己没有亲自开博客，而且也很少看其他人的博客。一个星期后，我上沙叶新老师的博客，看到的是每一篇文章都有那么多读者在支持，每一篇都有那么多网友热情的留言——我理解了沙叶新老师的话。

当然我真正理解沙老师的心情却是要等到后来我在“和讯”和“网易”的博客逐渐凝聚了一批读者之后。看到那么多的读者给我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我竟然有了几个月前沙叶新老师讲过的那些处境和心情：我的长篇小说《情报局长》已经拖延很久了，但我不会停止博文写作，因为我有那么多读者在等着我的博文……

2007 年要结束时，我想用一句最恰当的话总结我的博客，虽然博客是一个人在网络上的精神家园，但我想到的总结的话却是：我的博客是为你而写。这个“你”就是我的网络朋友们，我的信箱和手机里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条网友发来的信件和短信，更不用说博客上成千上万的留言了。虽然我没有时间一一回复他们的信件、短信和留言，但每次阅读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我都很开心，也很感动。

只是在阅读一类信件和信息时，我心中会黯然神伤。那就是读者也许不止一次在我博客上看到过的诸如：“杨老师，你还好吧？”“杨老师，你的博客没有更新，担心你出事。”“请注意安全哦!”“你没有事吧？”……而那些从信箱和电话上传来的担忧就更直白了。好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发现我几天没有露面，就来信询问我是否安全，是否出事，希望我保护好自己。

为了安慰这些读者，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两句，其实心情却很沉重。有好几个读者还好奇地问：“你怎么还没有出事？”

也许就因为我还没有“出事”，又有一些网友就来信问了：“你整天写这些文章，你难道不害怕吗？”

我害怕吗？如果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批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曾一度（“文革”期间）把批评者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甚至枪毙，或者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消失，我能不害怕吗？

然而，我能克服这种害怕，那是因为在我内心一直坚信自己这样畅所欲言不但不是在干坏事，反而是在为中国、为社会、为人民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一眼看出来的弊端，而且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弊端，我都闭口不说，我还是“愤青”吗？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祖国吗？

一个社会出现愤青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一批批麻木不仁，不但不敢愤怒，而且连同情、爱和恨都不再能够自由表达的大众。

我仍然是一名愤青，只是我已经知道该对什么样的事情表达愤怒；我仍然把爱国常常挂在口头，而且也时时放在心里，只是我认为自己更清楚什么叫爱国，以及如何去爱国；我当然也知道害怕，只是，还有更让我害怕的——

我当然知道害怕，而且，我也感到最近一些地方的腐败分子和某种“黑恶”势力正渐渐

逼近我。在这种“黑恶”势力嚣张的地方，一个普通小民如我是会几分钟之内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的。更何况，我杨恒均一向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被我触怒的“黑恶”势力真要下手，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也就只能束手就擒了。所以，说自己不害怕是假的。

可是，在心底里，我相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理解我的、支持我的占大多数。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这思想解放中最需要解放的就是当权者摆脱对于民众的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成见和束缚。而且，我坚信，随着民主与法治的推进，高层一定会以更加宽容与和谐的态度来对待民众的批评和监督，把政权和利益集团置放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之下。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中国才能走出几千年都无法走出的死胡同和可怕的怪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但，我却有了另外一种害怕——那就是那么多体制内的朋友因为我写文章而离开我，让我感到害怕！

还有，我对那么多网友为我的安全感到害怕而害怕！这些网友中有些竟然是年岁非常小的，这让我愈益感到害怕，为我们的社会和青年而感到害怕！

我很想知道：是谁，又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害怕注入你们的血液？烙进了你们的大脑？我只希望，以我的不怕，能够帮我众多的亲爱的网友消除他们心中的害怕。

对悉尼华人保卫圣火的几点看法

刚到澳大利亚就收到几封电子邮件和几通电话，原来是华人社区有组织号召悉尼华人于这个月（2008 年 4 月）24 日前往首都堪培拉保护圣火的活动。朋友在电话里说，圣火把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激发了出来，报名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我虽然刚刚从大陆过来，但这里很多华人华侨知道我，所以希望我也加入，开车带上几个没有报上名的华人一起过去。报上名的有专车接送，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号召人在信中说，这个月 24 日，一些反华组织、藏独和疆独的人将会组织阻挠火炬的抗议人群前往堪培拉。由于堪培拉华人较少，他们号召悉尼的华人华侨组织起来，前往支援。

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作为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我却感到深深的忧虑。虽然知道在这个大家群情激奋的时候若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会招致攻击甚至辱骂，但如果不写出来，我会良心不安的。

首先谈一下我对于阻挠奥运圣火传递的看法。利用奥运圣火显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诉求，不管作为中国人的我是否能够接受，在西方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如果使用暴力等方式，例如冲击运动员、抢夺火炬，也许就触犯了当地的法律，那样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对于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传递时受到的阻拦情况，我也都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了。作为一个现在身处自由国度的中国人，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有权利在奥运圣火下表达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渴望与追求。

然而，我也看到了一些让我不安的画面：

第一，一些藏独和疆独打出了诸如“ChinaFreeTibet”的标语，要知道这句话里的 China（中国）看在华人华侨眼里是有不同的意义的。也许那些打标语的藏人是有所针对的，但你既然使用了“中国”这个词，也就让所有的华人华侨对号入座到他们心中的那个中国。

而在这些华人华侨的心目中，“中国”往往不仅仅指某个政权，而具有模糊的象征意义，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华人华侨心中都有一个“中国”——过去的中国、当今的中国，甚至是心中想象出的未来的中国。在他们心中的那个中国是不可能侵略西藏的，那个中国是不能在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面前丢人现眼的。

第二，既然藏独分子连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的话（不追求独立，只要求自治）也可以不听，公然要求西藏独立，那么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对于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华人华侨，保护北京的奥运火炬不受侵犯与侮辱，好像也是天经地义和义正词严的。

上面两个分析可以说明为什么对奥运圣火的阻拦激起了绝大部分海外华人华侨心中的不满，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我也把上面的分析送给这几次阻挠奥运火炬的团体和个人。

下面我想对组织起来、即将在本月 24 日进军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悉尼华人华侨说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无论在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人权的故乡法国，抑或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又或是全世界移民的天堂澳大利亚，每一年都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这是常态——想必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华人华侨都看到了，也能够理解。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

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反战和反对反战的游行，但对于一个要表达意见的游行示威，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们都知道：没有必要用煽情的语言去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和示威来对抗！

举个例子，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民主国家里，每一年都有好多起反政府或反对最高领导人（总统或者总理）的游行抗议活动。但大家也知道，这些国家领导人毕竟是多数人选举产生的，按说，任何时候都能够聚起更多的人群把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压下去。但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却绝少出现过这种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2000 年奥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时，得到了绝大多数澳洲人包括当地华人华侨的支持。然而，在整个奥运会举办期间和前后，澳洲各地不断发生一小部分人组织起来针对奥运会的抗议示威活动，当时的情形华人华侨应该都看到了，那就是：支持奥运会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既没有组织对抗性质的游行，也没有使用过激的言辞，他们都以宽容和大度静静地看着这些反对奥运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成熟的民主，每一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绝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第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北京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递的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种情况在中国人群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心和高昂的民族情绪，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任由某种被激发起来的民族情绪持续膨胀的话，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中国大陆网友一边倒地谴责西方国家保护圣火不力以及把破坏奥运圣火的行为上纲上线已经引起我的忧虑，作为国际问题和国际情势分析学者，我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一小部分阻挠圣火的藏独和疆独的行为激起广大华人华侨的愤怒，引起无论从人数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藏独和疆独的华人华侨走上街头保卫圣火。但如果我们这些华人华侨的反抗议游行中出现了违背西方民主游戏规则的行为，则会起适得其反的效果。大家必须记住，华人华侨在西方只不过是非常小部分的族群，西方绝大多数人的反弹随时会发生，那将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们大家都清楚：参加游行示威的华人华侨绝大部分已经拥有当地国家的国籍和永久居民身份或绿卡，他们能够一呼百应，自由地结社、聚会，到这些所在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包括 24 日到澳大利亚最神圣的国会山门前，挥舞五星红旗，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落后之列的所谓崛起的大国的侨民，而是因为你是所居国家的居民，在这里，任何人都充分享受自由和人权。

这种针对一小部分游行示威人群而组织的大规模族群游行不可能不引起更大族群的关注，所以再次强调，请在任何游行中，保持和平姿态，绝对避免肢体冲突。藏独和疆独如果抢夺火炬，那是他们违犯当地法律，应该由警察处理。如果前往支援的华人华侨看不过去，以人多势众为支持，出现过激行为，一旦电视上出现以强凌弱的画面，那将有可能使得西方主流舆论以及主流民意急速转向，甚至不排除影响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这样就真正亲痛仇快了，请大家三思。

第三，2008 年，奥运圣火虽然将在 8 月 8 日点燃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但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认识到，奥运圣火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代表的是全世界的热爱和平的精神和为每一个民族都能够接受的一些普遍价值，奥运圣火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更不会被打上某个国家的特色，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宣示实力的工具！在圣火抵达北京前，已经在世界各地燃烧了一百多年，中国人不必过于紧张这团早就照亮了世界大多数角落的火炬。当然，中国既然已经接下举办奥运会的火炬，就应该以敞亮的胸怀接受它，办好奥运，把圣火传递下去。

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北京以及北京驻澳大利亚使领馆提个醒，按照国际法，海外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得以任何方式卷入当地侨民针对所在国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目前以保卫圣火名义发起的活动不可能不引起所在国情报机关的监控，希望那些免费提供的车辆、早餐和午餐都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否则，不但损害当地华人华侨的利益，也必将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不偿失。

第四，特别提醒怀揣澳洲护照和拥有永久居留身份的澳洲华人华侨，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在澳洲政权的中心广场飘扬，当我们看到人山人海的华人华侨欢聚在圣火周围，当我们在那里高呼热爱中国的口号的时候，请你用那么一小会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现在站在哪一片国土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不错，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让这些成为现实的，这是一块被圣火照亮过的土地。在这块

土地上，不分族群，不分资产、地位，你可以去游行示威，可以自由表达反对或者支持奥运火炬，你甚至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巨大红旗插在他们国会山的门前，这一切在你看来，是不是比奥运火炬——要珍贵得多？！

奥运火炬在传递中熄灭没有关系，可以重新点燃，但火炬代表的圣火精神则绝对不能被遗忘，在圣火照亮的土地上，公平、平等、自由和民主开花结果。在十三亿炎黄子孙中，上千万的华人华侨（包括澳洲悉尼的华人华侨）能够很幸运地率先生活在奥运圣火照耀过的大地上……

我们享受到了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也会以宽容的心让其他族群与个体与我们一样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不但是奥运圣火精神的一部分，也是大多华人华侨所在国家的立国之本和核心价值。

请你们继续爱国——致留学生

有网友说，感谢藏独者的表演，感谢 CNN 的种族主义污蔑，更要感谢那些破坏奥运火炬的人，正是被他们弄熄的奥运火炬点燃了全球华人心中爱国的圣火，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是多么的团结，多么的强大，也让我看到海外的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是多么的爱国。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的爱国留学生前赴后继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思想、科技、知识、历史——容闳、詹天佑、严复、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鲁迅、周恩来、邓小平、陈独秀、钱学森等，如果继续罗列，那些曾经留学西方和日本的有识之士的名字会长得让你惊叹。而且，那些名字会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中国（包括今天的中国台湾岛），在任何一个进步的领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中国历史上的留学生以各种方式、方法爱国：容闳带回冲击清廷的新思想；詹天佑用从美国学习的知识建造了中国第一条铁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和困境回到祖国，成为两弹一星的功臣；而孙中山则以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展示了他才是最伟大的爱国者……

现在散布在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更多了，这次他们显示了澎湃的爱国激情，让人激动。但是，一直希望他们爱国的我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于是写成文章。让人想不到的是，我的一些对海外学生举行自发游行提出了一些异议的文章给我招来了“汉奸”的称号。其实，国内朋友早就对我说，爱国主义好像炸弹一样，不要去碰。海外的华侨老朋友也再三告诫：千万小心，如果把握不住，最好不要写。

可是我一定要写，因为和留学生朋友认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是爱国一样，我认为自己发现了问题而及时写出来也是一种爱国。只是，谁都知道，我这种爱国既不同于大陆愤青的网上爱国，也不同于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留学生们轻松走上街头的那种爱国，我的这种爱国是需要勇气的。这不，说了几个不同看法，就差一点儿成了过街老鼠。

好在北京城里清醒的头脑还是多过糊涂的，大陆的网络媒体和纸媒从 4 月 19 日开始，

笔锋急转，号召爱国也要理性，把自己工作做好就是爱国，最好的爱国就是办好奥运。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日子里，愤青们激动的时光渐渐远去，对愤青口诛笔伐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最终会让愤青们体会到，把他们弄得像过街老鼠一样，就是最好的爱国。

这恰恰是我担心的那种暴风骤雨般的爱国，愤青们被激动起来，要死要活，恨不得一夜之间打过太平洋，解放全世界。不过，这种忽然爱国的激情起得快，压下去得更快，给人感觉这是一种收放自如的爱国，很难和自发两个字联系起来。

这个时候我能写点儿什么？批评愤青的话我已经在没有人说的时候说过了，指责留学生的文章我也在他们最兴奋的时候贴了出去，而且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背负了汉奸的骂名。现在当全部媒体转向，当到处找目标辱骂的愤青转眼之间成为被鄙视的对象时，我却突然想呼吁，对这些愤青和海外留学生笔下留情。

历史上这种收放自如的爱国青年从来没有得到过好下场，最极端的当然是义和团。当时，那些要扶清灭洋的爱国人士很多不是被洋枪洋炮报销掉，而是被李鸿章“咔嚓咔嚓”像割韭菜一样给灭了。

我想，在爱国激情最高涨的时候，我的话被当成汉奸言论，没有人愿意听进去，现在也许我应该平和一下自己的心态，好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请海外的中国青年学生批评指正。

这种激情澎湃的爱国大运动让中国人更加团结？

奥运火炬在英法等地受到藏独拦截，屡次改道，放进大巴士车里，以及多次熄灭等事实，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出国后第一个了解的就是这个问题：英法等国为什么不好好保护火炬？我在法国政府工作的朋友给我说了实话，他说据他了解，这次法国已经破了历史纪录，派遣那么多警察保护一个火炬。他们真不知道还可以如何保护。在他们的脑袋瓜里，奥运火炬毕竟是一个火炬，并不像来访的国家元首一样需要武装警察的特级保护。当那些有备而来的藏独分子不惜一切抢夺火炬时，训练有素的法国警察一下子傻眼了。他们都有对付暴徒的严格规定，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武力对付破坏分子。例如对于袭击国家元首的格杀勿论，对于恐怖分子也是武器相向，毫不留情，但对付抢火炬的呢？按说，只能算是对付一般的示威群众，自然不能过度使用武力。藏独分子就正好利用这一点，使用极端手法，屡次得手。

大陆有些网友就建议，应该派我们的人过去保护，但你要知道，中国有主权，法国也有。当然，不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忽视了一点，英文中的“奥运火炬”（OlympicTorch），在中文里被翻译成了“圣火”，而且在很多大陆民众心目中，这圣火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那些火炬受辱的画面一再刺激着中国民众，随后又被法国总统抵制奥运的发言以及 CNN 的种族主义言论火上浇油。于是爱国激情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从大陆网络上一路蔓延，延烧到世界各地。有网友说，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

果真如此吗？大家不妨上网络上去看一下，中国的愤青们都写了些什么，看一下中国是不是空前的团结。如果你只浏览几个网站就会发现，这场所谓中国人空前团结一致对外的爱

国大行动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中国人在互相辱骂。就目前所知，网络上几乎没有出现一个外国人公开出来和中国的爱国热情对峙。在这种情况下，爱国愤青们还是紧握爱国这个武器，横扫互联网。遇到稍微有些不同意见的中国人，就破口大骂。

我算是小人物，所以，一个帖子在一天时间里被跟帖辱骂一千五百次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怎么连金晶也成了汉奸？连李连杰也有叛国嫌疑？还有无数个想反思或者深思一下愤青们爱国热情的作者和读者，都成了爱国者的敌人。

在愤怒的青年们激情燃烧的日子里，中国人被分成爱国者和汉奸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界限则是看你是否够激进，看你是否还拥有一点点理性。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无论是在愤青阵营还是汉奸阵营里，你看不到始作俑者的藏独分子和国际上传说中的那一小撮反华势力，他们在哪里？——他们躲起来了，在偷偷地笑。

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一场据说让中国人空前大团结的爱国运动却被愤青们的狂热弄成了撕裂中华民族的利器，而且，那裂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消除的。

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

作为一名爱国者，我想下面的问题很容易回答，那就是我们游行示威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在充分允许游行的土地上一吐为快，大大发泄一番？还是要让世人都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负的，要通过游行来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当然是后者，爱国者的目标应该是提高自己国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通过目前这种方式，我们达到目标了，还是我们离目标更远？

只要对西方有些了解的，或者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的，从直觉上都能够很清楚地判断，这种游行示威不但无法提高中国在他们眼中的地位，而且，还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很不幸的是，最近先后出笼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西方敌视中国的比例在悄悄攀升。在西方人的记忆中，这种一个国家的学生和国民在多个国家同时举行爱国大游行的事情只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出现过。

这就是爱国需要理性的最好例子。在澳洲等国家，游行示威是完全合法的，没有任何风险，你想表达对任何国家的爱都可以，你甚至可以去游行示威支持朝鲜和希特勒，不需要勇气。然而，不需要勇气的爱国，却绝对需要智慧。也就是说，理性爱国的人必须思前想后，我们的游行示威在那些看到的人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到澳洲后，一个澳洲朋友找到我，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澳洲不是 CNN 的故乡，总理也从来没有想抵制奥运会，甚至连这里的媒体也没有出现过学生们所指责的歪曲报道中国西藏事件，可是现在一些持中国护照的学生却要上街游行显示爱国激情。他担心这样的游行会不会给澳洲主流社会投下阴影，毕竟澳洲也是不久前才从种族主义的魔爪中彻底解脱出来的。

我这样告诉他，我不会参加学生的游行，也并不支持学生游行。但如果他们的游行真的让澳洲白人种族主义沉渣泛滥、死灰复燃的话，那就是该我走上街头去维护我同胞权益的时

候。

大家常常说，中国强大了，海外的华人华侨也抬起了头。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海外华人华侨挺胸抬头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所在国接受了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这些普遍价值，和中国的强大没有必然的联系。

大家大概都记得，历史上最近的排华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强大的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而是发生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就在不久前，华人华侨还在印尼遭到抢劫、强暴和杀害。远一点儿，还有越南当局把华人赶进大海里，以及柬埔寨独裁大量杀害华人华侨。相对于这些国家，当时的中国无疑都是强大的，但华人华侨并没有抬起头。

可以这样说，能够更好保护华人华侨人权的，是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接受的普遍价值，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飞机大炮。华人华侨在澳大利亚游行示威是合法的，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也是应该的。但在走上街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华人能够走上街头的国家都是一些拥抱了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国家。难道亚洲其他国家的华人和留学生们就不爱中国？我们看不到他们走上街头。大陆的愤青无法体会到这一点，但海外的留学生不但感觉到了，也享受到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留学生的这种所谓爱国游行，既没有提高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对澳洲的民族和谐没有多大帮助。但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当我们的留学生在据说是反华势力大本营的西方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何其畅快，何其淋漓，可是就算不为国家地位着想，不为华人华侨考虑，也该为北京分点儿忧吧。

据我得到的消息，一些西方的活动分子正在策划，要以相同的方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申请，要在适当的时候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举行游行，表达热爱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民主和自由的激情。请问各位留学生朋友，今年是奥运年，你们说北京批准还是不批准，如果不批准，这不又成了一个鲜活的反华借口？从这个方面说，你们简直是在给中国政府添乱，明白没有？

西藏、CNN 和抵制家乐福

关于西藏问题，我想说一点儿自己的看法。西藏现在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今没有被分裂的危险。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领导人物没有一个支持西藏独立。但我们现在无所不在的爱国热情却是因西藏引起的。西藏还好好的，如果要举行爱国大游行，也应该在西藏举行？为什么要在全世界举行？为什么硬是要把中国的西藏问题国际化？

西藏引起的爱国热情燃烧到现在，连我都有些迷糊了。大陆媒体报道西藏打砸抢发生时，我写了一篇《我对儿子讲西藏》。这文章通篇没有提到西藏两字，但大家都知道我是在讲西藏。

现在我听到和看到每一个留学生都在那里大谈特谈西藏，可是，我听来听去，却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在说西藏。西藏在哪里？你们去过？你们讲的真相就一定是真相？当你们站在西方的第一线要向世界讲西藏的真相的时候，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甚至连中国都不了解，又是如何了解西藏的？你们大多数人不是在高中毕业或者没有毕业就前往国外学习？如果你们真了解中国，就应该知道，中国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现在像你们这

样的世界范围的游行示威，势必引起国际上大小国家的广泛关注，从而在未来暗中制订遏制中国发展的计划。如果你们了解中国，也应该知道，像你们这种狂热的爱国，每一次都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往后拉，而不是向前推。

我这封信是写给海外青年学子的，我坚信他们能够理解我所说的。就拿抗议 CNN 和谴责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报道这件事来说，CNN 只不过是一个私人媒体，它的一个播音员是个种族主义分子，我们可以告它，抵制它（不看他的电视，不给他广告，事实上，现在 CNN 有很多广告来自中国），甚至可以组织大规模中国人到 CNN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分部机构前举行游行抗议，递交请愿书，但我们有必要弄一个席卷世界各地的爱国学生大游行吗？

而且就算有类似的游行，难道不应该首先出现在中国的西藏？幸福的藏民和汉民欢欣鼓舞走上街头，喜气洋洋庆祝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以及和谐社会，同时让能够自由采访的西方记者眼见为实？现在我们堂堂的 13 亿人口的大国竟然要把解释西藏的重任放在你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肩膀上。

西方媒体存在严重偏见，特别是对像中国等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偏见，这是事实。但这种偏见不只是因为他们小看中国，事实上，世界上的媒体至今没有一个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也没有媒体号召要抵制奥运会的。这种在我们眼中的偏见，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那种新闻观，抓住坏的方面死死不放，找机会就放大报道，好事基本上不提。这和 1949 年后的中国新闻观几乎水火不相容。这一点，国内的十三亿同胞是无法感受到的，因为他们很少直接观看外面的新闻，但海外的留学生难道也没有看到这种区别？你们也是从国内出来的，难道中国的报纸媒体对西方没有偏见？这种偏见有时不是互相的吗？

我们举办奥运会，允许各大媒体进入中国，我们希望它们能够更公正，或者更多地报道我们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但那些西方媒体是做不到的，他们仍然会不停地找毛病，会在鸡蛋里挑骨头。怎么办？我们难道要与全世界的媒体为敌？要向全世界的媒体宣战？难道全世界的媒体都没有我们中央电视台更加公正和不偏不倚？！

亲爱的留学生朋友，这个问题恐怕国内的十三亿民众都没有你们有发言权，因为迄今为止中国民众几乎很少直接看到世界各个国家的媒体，而你们则可以看到所有的，你们应该最有发言权。

和你们在自由自在的天地里挥舞着巨大的五星红旗以及高唱着国歌相比，国内的愤青表达爱国的途径有限，游行受限，抗议不让，也就难怪动不动就搞起了毫无成本、也不需要勇气，更用不上智慧的爱国方式——抵制。一副活脱脱我不买你的东西，让你损失的无知傻样。他们哪里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的十年，早就把抵制整个西方世界玩得炉火纯青了。结果呢？结果是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们却被孤立起来，被抛弃了几十年，远远落在了后面。你们这些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生应该很清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相比较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需要，现在的中国更加需要西方。

你们为什么要出国留学？

在大陆朋友看来，能够到澳洲留学是幸运的，事实也是如此。四年的留学费用已经涨到一百万元以上，就算是借钱来留学，也不是普通的中国家庭能够做得到的。这就是说，留学

生的父母不是国内的精英，也是在各行各业小有所成就的。在国内生活过得不差，可是到了澳洲却遇到了很多问题。就像一位墨尔本的留学生给我的信中所言，他们（指澳洲政府）赚了我们那么多留学费用，可还看不起我们。

其实，我何尝没有感觉到？西方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在对待自己的公民上是充分民主自由的，但在国际上就不那么民主了。虽然他们受到普世价值的影响，逐渐消灭了种族主义，可是在骨子里，他们还是看不起亚洲人、中国人的。

问题在于，我们使用何种方法让他们看得起？我们使用这样一种在西方早就被视为要不得的民族主义方式表达我们的反歧视，效果会如何？对于非澳洲公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一个网友在我博客里的留言说得不无道理：你们在一个被西方人施舍了游行示威权利的地方举行游行示威——不错，西方的游行示威权利不是这些刚刚从高中出来的中国留学生们争取来的，但只要你一踏上这块土地，你就享受到这个普世价值里所说的天赋人权。

而据我所知，家长送自己的独生子来到异国他乡留学，虽然有少数贪官污吏是为了今后转移贪污腐败的不义之财而把孩子送出来作为后路（过去五年我一直在组织人——谢谢一些留学生提供的资料——找出这些贪官污吏的名单，并和国家安全部多次联系，希望把这些转移国家资产的人一网打尽，把他们老鼠搬家弄到国外银行的钱全部弄回大陆，还之于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孩子今后能够在这个有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生活和工作。在澳洲那些自费留学生大学毕业后继续留下来工作并申请永久居民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多以上，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最后请留学生思考一个问题：西方不好，又歧视你们，又把你们大把的钱都赚走了，但你们为什么还要来留学，而且毕业后还不回去？——这个问题也许很幼稚，却能说明一切，那就是你们的父母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送你们出去，是爱你们的。如果你们细细品味这种爱的话，你们就能够更好地爱国家，而不是一味地发泄和愤怒。

我坚信在未来的中国发展过程中，我们今天这些年轻的留学生必将担当重要的角色。不错，詹天佑修建了铁路，但直到今天，我们的铁路还会因为一场大风雪而陷入瘫痪；容闳带进了新思想，但直到今天，中国民众的素质还不能适合观看某些带新思想的新闻；民族资本家一百多年前就自己开矿了，但至今我们的矿工死亡率还是全球最高的；我们虽然已经快要跑到月球上去了，但山西的童工却走不出黑窑洞；孙中山早就结束了君主时代，但封建余毒至今还没有肃清……

这一切都需要爱国者来完成，需要理性的爱国者扎扎实实地工作，扎扎实实地爱国。在鄙视那种忽然爱国，以及那种有人操控的收放自如的爱国之际，我也要对愤青和海外留学生说：请你们继续理性地爱国——当然，最好先搞清楚什么叫爱国，以及如何去爱国。

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来信照登：

恒均：含泪看完了不知道谁群发来的图片，现在农村真的还这样穷困吗？！本来帮不认中国字的儿子念图解，念着念着就哽咽地念不下去了，眼泪差点儿忍不住流下来，所以转发给你。我想这些图片，也许能启发你写出一篇图文并茂的好文章来。你博客看的人多，会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那些最底层挣扎的孩子们也是中国的明天，他们比农民工更可怜，因为他们连为自己呼喊的能力都没有。而你能！你能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让方方面面以至于全世界听到！先替他们谢谢你！

晓燕

晓燕（张晓燕，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你好，谢谢来信。我看了你发来的名为“小村庄”幻灯系列，心情也很沉重，但我却无法完成你的嘱托，更不敢接受你“替他们谢谢”我——这可比那些图片让我心情更加沉重。一个国家有这样破败的教室和衣不蔽体的孩子，本来就是我们的痛和耻辱，写一篇文章表示同情、关心，力所能及地呼吁一下，只不过举手之劳，怎么会让你这位海外华侨“替他们谢谢”我？

其实我经常收到类似你写给我的这种信件，大多来自不认识的网友，也有少部分来自熟人甚至前辈老师的。他们会在信里对某些事件表达强烈的关注，希望我用自己的“笔”（电脑）写一篇博客文章。在信的结尾他们会给我一个我无法拒绝的鼓励和压力：你一定要写，就算这篇文章是为我而写的；你一定要写，否则我们都对不起他们；你一定要写……

你可以想象，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写出那么多文章，更何况，那些让你差一点儿流泪的图片，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普通的，对着它们，我已经写不出什么让“全世界听到”的文章。可是，我还是决定写一篇文章，就是这封写给你、也写给很多和你一样看了这些照片就眼睛湿润的海外华侨的一封信。

国富民强的标准是什么？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另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民众的生活至今还是比较穷困的，在世界上排名遥遥落后。这两个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后面的一个事实却被一些人想方设法地掩盖住。不知道是利益集团有意如此，还是一些穷人自己太糊涂而被忽悠了。中国现在不但给华人华侨，也给整个世界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国富民强”了。我们国家特别富有，经济总量不断上升，连美国人现在都不得不“借中国政府的钱，买中国人制造的廉价货”。这样的国家还不算“富”吗？

再看看“民”——也特别“强”了，且不说天不怕地不怕，一会儿要解放台湾，一会儿要把五星红旗插到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的总理府、总统府，就拿最近在美国和澳洲最富裕地区的移民统计，也可以看出来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人物。还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有钱，一波又一波花费上百万送孩子到西方留学，花费巨资到西方去接受西方人的“洗脑”。这样的“民”还不“强”，那什么叫“强”？

所以，晓燕，当你看到我常常看到的景象而眼睛湿润的时候，也就不足为奇了。你当然看到，我们强大的国家已经把好几所孔子学院开到澳洲的国土上去了，也难怪，你突然看到

我们祖国大陆的小学还那么破败时忍不住问我“农村还真的这样穷困吗”。而且你也看到，强大的国家也渐渐控制了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孔子学院加上媒体，很快就会把我们祖国的核心价值观传到澳洲。但你别担心，我们不会把这里农村的贫穷带过去的，你的孩子是安全的。说实话，不要说海外华人华侨，就是在中国大陆内，很多精英和城市人，也没有搞懂中国到底多“富有”。

这不是我眼中的国富民强。那么，我眼中的国富民强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用最近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来解释一下。

三年前，租住在你家附近的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也就是用有效证件和签证进入澳洲，逾期不归，“黑”了下来）在到玻璃厂做工中被玻璃扎伤而死亡。事件发生后，你所在华人社区组织起来，帮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打官司。那家玻璃厂的老板是两位来自上海的中国移民，他们上面还有一位白人老板。他们辩称，这位中国黑民是到厂里来看看的，不是来工作的，结果发生了意外。既然他不是来做工的，又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当然就不赔偿。死者方的代表律师讨不到任何便宜，结果一分钱赔偿都没有得到。而且，这位黑民也没有买保险，连安葬费都有困难。

晓燕，是你们所在社区的华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靠华人的捐款葬了这位同胞，据说还剩下一千多澳元（6000 元人民币），你们把钱寄给了那位死者在上海的妻子以及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普通的中国非法移民客死异乡的悲惨故事。

但故事却并没有结束，三年后的今天你兴奋地给我写信，信中说：澳大利亚政府出手了，推翻了原判，政府直接介入，宣布将从一个政府基金中拨款，对当时死在澳洲的中国非法移民的远在上海的妻子一次性补偿 30 多万澳元（接近 200 万元人民币）；同时决定对那位死者一直在上海的未成年的孩子行使抚养权：按照抚养澳洲孩子的标准，每两个星期给一次钱，一直给到这位孩子年满 18 周岁！

我看了你的信，真不敢相信。因为这完全违反了我所了解的有关法律，澳洲有什么理由拿澳洲纳税人的钱补助一位非法居留的中国人？而且还要把他的孩子抚养成人？所以我立即写信给你，请你务必了解清楚。你了解了两个星期后告诉我，澳洲政府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据是这位中国黑民只有 37 岁，没有保险（如果有保险，死后会得到 25 万澳币左右的补偿，反而比政府出手给的钱要少），死在澳洲，而雇主又“无良”，不肯支付赔偿，于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他们肩负起了国家的责任——一个对外国公民的责任！

我当时看到你的信，心情异常激动，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国内涉及几起死亡赔偿事件的案子，都让人深感人命在这里一钱不值的无奈。知道这件事的第二天早上，我和连岳一起吃早餐，我讲了发生在澳洲的事。他也立即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说中国民工在以色列遭到炸弹爆炸死亡后，以色列政府负责抚养这些中国遇难民工在中国的孤儿寡母直到孩子成年。

如果一定要我给“国富”下一个定义，那么我会告诉你，在这件事中，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就是富裕国家的象征。这样的国家不但对自己的国民不弃不离，甚至对前来自己国家的民工和非法移民都实行了最人道的关怀和照顾。

我的例子是不是太极端了？那我就用这次我到澳洲看望儿子时感受到的一件小事再解

释一下。这件小事其实就是一张照片，一张我所住的公寓楼下面游泳池的入口处的照片。你知道，我在澳洲住在一个中等地区，我住的公寓也是中等价位的。这公寓是标准设备，几十户人家，楼下有一个温水游泳池。我每次到澳洲看儿子，都会带他去游泳。

游泳池在一间独立的房子里，这间房子比地面低一点儿，所以，有五级台阶。这天我去游泳，发现有人在台阶旁边工作，停下来看，才发现这里原来有一个供残疾人上下的电动装置。我很好奇，就打听这个东西的作用以及使用方法。那个维修人员稍微介绍后，就说，他负责每两个星期来维修一次，已经来了六年了（这个楼房房龄是八年）。我有些不解，据我所知，我们这两栋公寓里从来没有住过坐轮椅的不方便人士。我问他这一情况，他说，是的，据他观察，这个机器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但他还是要每两个星期来一次测试是否正常运转，并作必要的维修。

我知道在澳洲负责维修这些设备的工人的工资是相当高的（工作一小时大概超过 150 元人民币），这里毕竟没有坐轮椅的人，而且，就算有，面前只有五级台阶，也用不上装一个设备，再说，坐轮椅的一定要到游泳池干啥？那位维修人员听后先是开玩笑说，那不行，按照你说的，那我不就失业了。但看到我认真的样子，他就说，这是规定，任何一个公共场所，哪怕只要有一级台阶，就必须安装无障碍通道或者设备。他说我住的这栋楼还好一些，有些公寓的公用场所更多，安装的无障碍设备有好多个，仅仅是维修费一年就是一间公寓的钱。最后他说，我的工作是维护好它们，说不定某一天，从某地来一个坐轮椅的，想参观一下你们的游泳池呢。

那个坐轮椅想看一下我们游泳池的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但这个很现代化的、用手一按就可以载着轮椅上下的设备会一直在这里默默地等着他。那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游了几圈，脑子里一直很乱。

晓燕，你生活在澳洲，应该注意到，很多时候，商场和游乐场、公园里都有不少坐轮椅的人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在那里消磨时间。可是你到中国来看一下，你看到几个坐轮椅的？难道中国坐轮椅的比澳洲少（按照比例）？当然不是（中国有大约八千万残疾人，坐轮椅的应该也不少）。就在奥运会前夕，北京才自豪地宣布完成了主要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建设，而在北京这样宣布之前很久很久，从北京散逸到世界各地携带不义之财的人已经把美国和澳洲最好的别墅都买下了不少。全世界都从财大气粗的中国富人和官员那里看到了中国的"富裕"，只是这些大陆来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从随处可见的楼梯旁边的小设备上看到他们自己的贫困。

现在我也许可以告诉你，我眼中的富裕国家的标准了，衡量国家富裕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感受和直接享受到了这种"富裕"。富裕的国家应该让任何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国民（甚至非国民）都感受到他们是最重要的，感受到国家是为他们而生，为他们而存在，为他们服务的。

用花费巨资的火箭把三个军人宇航员送到太空中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有多富有，但让每一个台阶旁都有一个这样可以垂直升降的小小设备在那里默默等待有需要的国民出现，那才叫牛！

上面我用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标准基本上脱离不了一个"钱"字，就算你要以人为本，要对国民进行人道关怀，要养起孤儿寡母，也得有钱吧。虽然我们国家用上亿元纳税

人的钱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让全国人民都感到特强大、特牛气、特扬眉吐气，但以我们目前的人均 GDP，绝对做不到在每一个楼梯旁都安上升降机。那样的话，造价可能要远远高于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宇宙飞船。所以，难怪要想让国民感受到国家的强大，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搞这种太空项目之类的，或者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就不评价了，但我想推出第二个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人民是否“强大”的标准。这个标准好像和“钱”、“富裕”没有多大联系，但却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国富民强”的最重要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标准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前途”!

从哪里开始？请允许我还是从你——晓燕开始。据我所了解的，你在澳洲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就算和你在国内工作的原来的朋友相比，你也不算富裕。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出奇，我自己也碰上了。和我同时代的哥们儿姐们儿，没有出国的，现在都过得挺滋润，因为绝大多数也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了。他们的富裕和国家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有关，虽然他们属于少数，但毕竟也说明了“国富民强”的道理：民众要想强，国家必须富。

可是，这些年随着我这批朋友和我一起人到中年，我渐渐发现了问题。越是那些高级的精英，越渐渐显出了对前途的迷茫。这首先是反映在他们对自己子女前途的担忧上（大多是独生子女）。结果，我每次回国都受到很多的“骚扰”：都是哥们儿姐们儿找我打听如何把自己的独生子弄到外国读书。我说，读书可以，几年下来的各种费用可能要一百多万呢。他们说，一辈子就这个儿子（或者女儿），一百万就一百万吧，借也要把孩子送出去。

这让我微微有些震动，暗中高兴自己“先下手为强”。但真正让我震惊的却是毒奶粉出现后发生的一些事。

毒奶粉后我回到国内，第一个星期里竟然接到了八位老朋友的电话，都是要求我“无论如何”帮他们把孩子弄到国外留学或者定居的“命令”。他们在国内的条件都很好，属于精英之类的。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大了，不会喝毒奶粉的。但他们好像对前途失去了方向，感觉到不确定性，有一种躁动和极度的不安。一位朋友说，我能保证我的儿子不喝毒奶粉，但我用什么保证我的孙子和子孙后代不喝毒奶粉，甚至比毒奶粉更毒的东西？

当然和我更铁的哥们儿就更进一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我能够爬到今天的地位，我儿子能够吗？我愿意让他用我那种方式向上爬吗？再说，我能保证这个社会不变吗？社会一变，那么用这种方法爬得越高，摔下来就越惨。

我想，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我也听出来了，我们都心照不宣而已。是的，你能够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取得目前的利益，你能保证自己的子女也可以？你很幸运可以欺负普通百姓，但你能保证你的儿子和孙子就不被别人欺负？你能保证那些受欺负的民众不会在你这一代找你们算账,但你能保证你的子孙后代不被清算？

说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绝对不能是一个让民众看不清前途的国家。我这样给你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澳洲突然被某国独裁领导占领和统治了，你会怎么办？还是同一个“富裕”的澳洲，但我想，两千万澳洲人要么就全部移民离开澳洲，要么就是起来推翻独裁统治。

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项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国富民强”的标准：国家必须能够取得民众的信任，国家一定是朝人类历史正确的方向发展和前进，民众才会看清楚前途，看到希望。否则，国家再有钱，民众也不会强到哪里去，充其量在移民和加入外国国籍上争先恐后、争强好胜而已。

贫穷不是一个问题！

晓燕，上面说到我眼中的“国富民强”，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中国大陆显然还有距离。但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有那么一伙人先富起来了，而且有些人为了私利压制舆论、铲除异己，用各种宣传手段等忽悠民众，可是，毕竟中国整体国力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用美国和澳洲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显然不实际，也不那么地道。

有人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还不那么富裕，如果我们的经济继续发展下去，等到我们和美国、澳洲一样有钱了，到时民众不就能够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到时所有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说得好，我何尝不是这样希望的？于是，出现黑窑洞奴隶孩子时，我们说，欧洲以前也出现过；说到毒牛奶时，我们也自我安慰道，美国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不是也有食品安全问题？说到此起彼伏的官民对立，我们也能在东南亚和非洲找一两个遮羞布糊弄人家和我们自己……这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确实能够安慰我们一阵。然而，果真如此吗？

不错，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群魔乱舞的现象，但人家最终解决了，或者说大部分被解决了。怎么解决的？从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的！靠法制，靠对权力的监督，靠新闻媒体和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靠逐渐完善的民主制度。请问，你能够找一个中国人，悄悄问他们，你相信利益集团会改邪归正从善如流吗？你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

那些贪污腐败真能够靠他们开会自觉纠正？这不过是痴人说梦……好了，我想说到你给我发来的那组让很多海外华人们流泪和眼睛湿润的照片，我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再对着照片激动万分，立即写一篇煽情的文章。我不写，是因为我认为贫穷不是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太残忍了？看到衣不蔽体的孩子和破败的教室竟然喊出“贫穷不是一个问题”？你慢慢看完。中国社会一直有贫穷，我们国家一直有贫穷，世界范围里也一直有贫穷，贫穷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长期战斗的敌人。老百姓对贫穷的忍耐力是你我无法想象的。他们不但对贫穷，而且对天灾都有超乎我们想象的忍耐力。

四川地震灾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来自城市的救援队要把已经变成废墟的村庄中的农民转移走，可他们不肯走，他们要继续在这块废墟上生活。有的死去亲人的尸体还没有挖出来，他们就开始含泪默默地在旁边的空地上挖地种菜了。救援人员感到很惊讶和不解，就问，你们干啥？农民说，我们不种菜，吃什么！总是要生活的……

你看，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他们其实都是靠自己在生存。他们早就练就了忍耐贫穷和苦难的超能力。

另外，我提醒你注意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起义和改朝换代，但几乎没有一

次农民起义是真正因为农民太穷而引起的。是的，他们不怕穷，不怕天灾。中国人怕的是不公正，怕的是不合理。他们讨厌的也是不公正、不合理。

如果你不相信我，请你去查一下过去几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群体事件，有哪起是因为孩子没有奶喝、老百姓揭不开锅、残疾人没有饭吃造成的？没有，绝对没有。你到中国街头可以看到残疾人在地上爬来爬去讨饭，但他们不会不满，更不会对自己的处境怨天尤人。几千年来，他们都没有指望过政府能够照顾他们，现在也不指望。多好的民众，多善良的老百姓！

我想告诉你，靠写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去“救救孩子”，是很不实际的。我们现在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麻木不仁，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和良知……

我对美国官员说，我是来搜集中情局丑闻的

我是 12 月 20 日从北京飞抵旧金山的，由于要在机场转机（还得从国际厅到国内厅），中间相隔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一下飞机我就一路小跑到美国移民局，还好，早想到了，所以没有托运行李。可一到移民局前就傻眼了，长长的队，黑压压的人，按照 911 后的效率，一个小时也轮不到我。好在我有经验，选择了最旁边的一队，果然，不一会，最旁边的一队就不是“最”旁边了，又连续开了几个新柜台，我立即跳过去，站到了前几位。

轮到我时，那个美国移民官装腔作势，慢吞吞的。看了护照，又看我人，看了我人，又去看护照，弄得我渐渐不耐烦起来，要知道我可是从北京坐了不 9 个小时飞机过来的。打完手指膜后，我以为结束了，可他突然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大吃一惊，心想，我不是写了吗？我一般都是顺手在职业栏目里写上“工人”或者“农民”，一般国家的移民局从来不问我，我怀疑他们根本都不看。估计这哥们怀疑了。于是，怕他进一步追问，我就干脆告诉他，我是 writer（写作者，作家）。

他紧问一句，可你填的是工人。我说，对不起，在我来的国家（中国），作家是工人的一部分。不知道他听出我调侃没有，他笑了笑，准备在护照上盖章，手却停在半空。他显然又犹豫了，抬起头问，你来干什么？

考，着次问得就有点过了，我不是写了我是来旅游的。我说，旅游。他“哦”了一声，却还没有盖下去的意思，果然，又问，你是写什么的作家？(what you write about?)

也许美国人比较随便，也许是我的英语理解有问题，或者当时我烦躁的缘故，因为这句问题听在我耳朵里有些轻蔑的味道（后来一位朋友解释说，没有那个意思）。我突然想调戏他一下，我说，我是专门写美国中央情报局丑闻的中文作家，我是中文作家里唯一一个直接以收集中情局负面消息然后披露出来的作家。

那个移民官抬起头，显然感到很意外，我能够想象，以前没有一个中国来的敢这样对美国移民局官员说话。我心里很得意，脸上是皮笑肉不笑的，看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又加上一句，

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我这次来也主要是旅游，但不排除从朋友那里记录一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丑闻，把他们写给我的读者看。

说到最后，我一本正经，那个移民官员这次听懂了，却一下子笑了起来，随即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章子，递给我护照时竟然说：好运。我也谢谢了他。

现在想一下，我有些过激，很想让他继续问我问题，然后我找机会把美国人在反恐中的过激行为（例如移民检查）一股脑说出来。不过，这个官员没有兴趣，让我走了。我失去了发泄的机会。

当然这不是第一次，由于对西方的法律了解，我常常利用他们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刺激一下他们。大陆的读者可能以为我在大陆是刺头，其实你们大错特错了，我在大陆，知道自己是屁民一个，很少去和官员对着干。上次从台湾回珠海，进海关时，被一名海关女官员要求"送"一本我的小说给她，这要是在西方，我非玩残她不可。在中国，我就很"乐意"送了，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对付外面的移民局和官员，我的经验很丰富。最早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大学刚刚毕业不久。当时香港（港英当局）对中国护照也比较严格，而我的名字由于比较普遍（原来的名字），大概有同名的人上黑名单，结果，我的护照一递过去，就要等至少 15 分钟，有时他们还让我进去坐一会，等他们在电脑上弄 20 分钟左右，最后才放行。我一开始也不介意，认为大概都是这样吧。可后来看到人家那么顺利，特别是西方人，以及听到很多中国人的护照在世界各地受到歧视的事，心里渐渐有些不平衡了。

但等到我开始反击的时候已经是我到香港工作一年后（大概是 1993 年），那时我对香港的法律也了解了不少。有一次，当他们再一次让我进去坐等他们查资料时，我就忍不住爆发了，我要求见罗湖移民局最高首长，我说我要投诉，我要强烈抗议。我说，你们每一次都这样折腾我，你们到中国大陆，我们的移民局这样对待你们了吗？把你们香港同胞当爷一样看，说到后来，我说得非常过分，我说他们歧视我的大陆身份，我说他们故意折腾我，我要求立即叫记者来，我要当场抗议，否则，我不要护照，就在这里不走了。当然，我知道，是我有道理，因为他们电脑里的黑名单（一般是偷渡者或者滞留不归的），即使和我有相同名字，也不应该每一次浪费我时间。

我叫骂过之后，他们很快还回我的护照，我以为这事就完了。但三个星期后，我所在中资公司收到香港移民局一封公函，这封信是给我的，竟然是一封非常正规的道歉信，下面是移民局当时高官的签名。信件中说由于电脑系统数据庞大，出现了一些问题，每一次官员都以为我只是临时经过香港，所以就没有永久性处理这个问题，原来我每个星期都到香港，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我不少的时间，他们保证今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了。

果然，到现在为止，我进出香港移民局都非常方便。我也把那封信在中资公司来自大陆的员工中传阅了，他们有些觉得不可思议，说他们经常被港英移民局刁难，想不到我竟然为这个事去闹场。我鼓励他们说，香港这地方不一样，有法律有人权，但你不争取，什么也没有。

大家只知道我满世界飞，却不知道有时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大家也知道，中国护照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简直象世界孤儿和弃儿，所以，如果真要工作方便，要满世界飞，弄几本外国护

照（或者花点钱买一本）（象 007 一样）也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你不是寸步难行，就是插翅难飞。

以我的性子（欺软怕硬？），一旦掌握了西方的一些价值观，我是不会受他们欺负的。于是，过去多少年，我在世界各地和移民局、海关、警察没少折腾。好在几乎都是我赢，或者我能够出一口气。其中有一次是在澳大利亚海关。

去过澳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个海关之严格简直象鬼门关，严格得连个屁都不能带进去。而且，对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旅客检查尤其严格。一旦你被抽出来检查，动不动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也有（如果你行李很多）。我自然知道澳洲严格，也就不带任何食物和农牧产品进入（包括带木头的玩艺）。可是，大概我是中国人，最初过去还是有好几次被抽查，看着他们一点点翻我的行李，我郁闷死了。

可是，他们完全是依法办事，我没有任何理由爆发，而且，说个心里话，我也知道，经常违反澳洲海关法律的确实以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多。中国人大概饿怕了，加上喜欢带自己的事物到处走，包里总少不了这些在澳洲被视为违禁的物品。

然而，我心里还是不平衡，却完全无处发泄。只到有一次，在他们检查我行李时，我拿出照相机，问，这里可以拍照吗？那官员立即说，不能。还以嘲笑的口气加了一句，你没有看到牌子吗？

我当然看到了，我也知道全世界的移民局和海关都不能拍照，我是明知故问。因为我想引起话题说下面的一句话：真可惜，不能拍照，否则，我抢到新闻了，也许能拍一张卖不少钱的照片。

那个正在检查我行李夹层（其实根本没有夹层）的官员停下手里的活，疑惑地问，什么新闻？什么照片？

我抬起手，在周围划了一圈，提高中国特色的大嗓门说，你看看，到悉尼机场的旅客来自世界各地，海关排队的更多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白人，可看看被这些海关（我故意回避他，因为选择哪些人需要详细检查并不是他的工作）抽出来详细检查行李的，几乎都是说中国话的人，还有少数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你觉得如果我把这幅图片发到报纸上，配上“澳洲悉尼机场的白澳政策”这样一行话，你认为澳洲人会怎么想？

我的声音很大，当时至少有四五排的海关官员和排队的旅客都听到了，那个官员立即不说话了，周围所有的眼睛都盯住我，我想，我至少让那些白人难堪一阵，也让他们思考一下，下次，至少得多找几个白人来检查一下吧。

后来抽查我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我不知道是他们把我加进“刺头不好惹”的黑名单，还是其他原因。实际上，以我对澳洲的了解，如果真拍摄那样的照片，会引起不少议论的，可惜，禁止拍照。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到一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如东南亚、俄国以及我的祖国，我特别小心和收敛之外，我在一些西方国家真的象一头牛一样牛，随时想找点人理论一番，随时准备教育

他们不要歧视，教育他们什么叫人权等。当然，大家也看出来了，你要想牛，最主要的一条是，你必须不能知法犯法。例如，我之所以在澳洲海关借机讽刺他们，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行李中没有带违禁的物品。否则，难堪的不是他们，而是我。

同样的道理，美国移民局有权对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详细盘查，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那就理直气壮，而且不要以为美国人（官员和警察）就都知道什么叫人权和自由，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很难让人家尊重你的人权和自由的，你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权利，随时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是当今唯一一名公开说自己研究中央情报局的华人作家，而我此时此刻就住在离开中央情报局总部不远的地方。按照一些中国人的思维，简直天要踏下来了，又或者我杨恒均一定有什么背景。

其实，如果我有背景的话，那么那个背景就是美国标榜的言论自由！我正是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在不违犯美国法律的情况下，收集我的素材，写我的书，发我的言，这就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说话的权利，它往往能够保护你不受侵害，让你活得有尊严。记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保护你的不是所谓素质高的美国人，而是这个国家的法治和其核心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

《杨恒均 2009 年言论自由系列》之一

杨恒均 2009-01-03 华盛顿

你可以不选麦凯恩或奥巴马，但一定要投自己一票

华人为什么不投票？

按照以往的调查，海外华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在大选时的投票率是偏低的。当然这些统计不一定准确，但之所以给人这个印象，主要是有两点，一是不管是各党派还是独立调查机构，都会在投票时候做抽样调查，统计投票族群比例，他们的统计这样显示。另外就是华人华侨在大选中缺乏“激情”，很少有上规模具有影响力的造势活动，给人 感觉就是比较冷淡。前一个是数字，后一个是印象。

华人不投票，简单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忙”，或者用另外一个词汇表达，中国人比较“勤劳”。别说投票日要加班加点工作，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哪里闲着？中国移民基本上都是靠勤劳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澳洲梦”等出国梦的。而且中国人的“美国梦”和真正的美国梦不完全相同，中国人的美国梦经常是和发财同义词。

当然隐藏在这种“忙”背后的，还有两个深层的原因，则是造成华人华侨投票冷淡的重要因素。一是对西方的制度有一定的了解，认为自己投不投票，关系不大？难道我不投票，他们

就搞法西斯，杀中国人吗？当然不会，那么，我投不投票有啥关系？有这个时间就算不加班，也可以在家和儿子女儿聊天喝咖啡呀。

还有一种心态和此类似，但理由相反，那就是看穿了西方民主的虚伪，认为投不投票就是那么回事？不就是"两个魔鬼中选一个"吗？干吗要去投票。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很多，特别是新移民，他们在踏上美国之前，就已经是世界上据说最了解民主制度弊端的人类。过去后，自然靠"自己的"努力发财实现"美国梦"，能多开一个洗衣铺，或者多开两家餐馆，比什么都实际。只要人家不欺负到自己头上，管他们干啥？就算欺负到自己头上，也有白人和黑人到街上去抗议示威，至于我，还要赚钱呢。

没有投票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

当然更多的华人华侨越来越觉醒，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积极投入大选，是普通民众最好的参政议政方式。

最近听说有大陆的知识人在研究不用"投票"的民主模式，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可以这样说，只要是地球上，没有公民的投票决定权——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就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当然，如果有人想争夺话语权，说民主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的民主就是不投票的民主。他们质疑道，为啥"民主"一词，一定要由你决定呢？

那我就实在没有办法和你争辩了，持这种逻辑的人完全可以拿一块石头，然后告诉我，这就是电视机。为什么电视机一定要是你说的那种西方发明又传到中国来到东西呢？我能说什么。这些人甚至可以告诉我，民主就是不民主，不民主就是民主，这就是辩证法。你说我说啥好呢？你不如去死，因为死就是不是死嘛。

世界上所有的民主都千差万别，但有一点绝对共通：公民的投票权。

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常常莫测高深一副高级学者看破红尘的样子感叹，什么投票权，还不是利益集团控制呀，还不是——这话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可是，你难道不明白，就算是利益集团，要控制这个国家，也必须通过每一个公民手里的选票？除非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投票的时候造假，否则，任何一个公民手里的选票实际上就是最终的决定权。利益集团要影响选举，好的，就算最糟糕的一种——拿金钱出来买，你能有多少钱买呀？如果你能够倾家荡产买票，那你就是为民为国家的英雄，而不是"利益集团"了。

那些认为有投票的民主没有用，很虚伪的人，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如果你有投票权，你不妨问一下你自己：我的选票是利益集团控制的吗？如果你自己不认为你会被控制，你又凭什么认为别人的选票是被控制的？所以，精英们在本质上不喜欢投票，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人家的选票都会浪费，只有我的最宝贵，一张比一万张。

这就是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选举很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台，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争取选民手里的选票。

那么对于普通的个人，你手里的选票有什么用呢？你的选票是决定这个国家前途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那样认为手里的选票没有用，那么才是民主失败，才是利益集团笑逐颜开的时

候。

上面谈的大方向，现在具体谈一下选票的作用。选票最大的作用是：你用选票制定国家政策！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选票怎么能够制定国家政策？我手里的选票竟然有这种功能，那我不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决策人？

有点夸张，但事实如此，你有选票，你就参与了指定国家政策。我曾经和共和民主两党的幕后人员都聊过，他们也告诉了我一些内幕和花絮。大家知道，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很牛，一下子就推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而且竭力推广。作为一个个体选民，我们就研究他们的施政纲领，看一下对我和我的家庭好不好，是不是“有利可图”，选他上去好，还是选他的对手更好，然后决定把票投给谁。

可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就在我们研究他们的施政纲领的时候，他们也在偷偷研究“选民”：研究选民的表情，反映和意见。等到他们收集到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悄悄更改自己的施政纲领，以赢取“选民”的更多支持。大家不是没有注意到，从二十个月以前开始，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就在不停变化，做了很多微调，其实很简单，不是他们想变化，而是你的那一张选票让他们改变的，他们是为你而改变，而你其实是最终制定那个政策的幕后“投手”。

现在你明白美国大选为什么从开始到结束竟然要持续整整二十个月吧，千万不要认为那是劳命伤财，那其实是你手里的那张选票的运作模式：你在制定这个国家的政策，在决定这个国家的前进方向！

你可以不选麦凯恩或者奥巴马，但一定要投自己一票！

我们如果单单看小小一张选票，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但大家不要忘记，世界上最强大领导人都是靠选民手里这一张又一张选票决定的。我在两党候选班子里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总统候选人其实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他们为了拉选票，整整二十个月不能松懈，竭尽所能的表演，让民众满意，投他们一票。

这都是你手里那张选票的威力。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一定不能抱着“忙”，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这张选票。很多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个人自由，只是我一个人嘛，说那么严重干什么？我不投票，别人会去投票的嘛！

事实却是有这种想法的华人华侨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有不少的人，多过百种人，多过南美人，多过黑人……那么，这样对华人有什么影响呢？

前面讲到了美国对什么人投票有统计，这些资料并不一定公开，但共和和民主两党却也有自己的“秘密情报队伍”，专门负责收集哪些人投票、哪些族群和团体不喜欢投票等等。他们统计这些的一个理由就是在下一次好做工作，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他们制定的一些政策无疑会更加向那些积极投票的族群倾斜！

说到这里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吧？是的，你投票也许不能决定选举结果，但你不投票，或者越

来越多的华人不去投票，则绝对什么也不能改变。你想一下，作为一名政治家，看到你这个“选民”终日忙着开洗衣店，忙着开中餐馆，连投票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倒想问你一句，凭什么在我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你？！

这就是我为什么号召已经入籍的美国华人华侨，在大选中一定要积极投票，至于投谁的票，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麦凯恩，奥巴马？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一个，别太看重他们的政策分歧，美国的政策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政党来独立制定和完成的，再说，选票又不是投进去就没有了，作为美国公民，你手里有无数的选票，有无数次的机会，未来始终掌握在握有选票并积极使用他们的人手里。

去投票吧，你可以选麦凯恩，可以选奥巴马，你甚至可以谁都不选，故意去划一张废票，或者和你的老婆商量好，他选奥巴马，你挑选麦凯恩，让他们两人的票数抵消。但你一定要去投票，让整个美国都看到，华人投票很踊跃，让政治家们都知道，现在没有涉及到我们华人的具体利益（例如移民，种族歧视等），我们都会踊跃投票，可想而知，一旦涉及到，那么我们这些少数族裔的票数往往会影响大选的结果。

去投票吧，这一票其实是投给你自己，投给你的子女，投给所有旅居异乡的华人华侨的神圣的一票！

杨恒均 2008-10-31

《2008 美国大选：一场游戏一场梦》系列之二

好莱坞成就了奥巴马

对国家的期望、个人信仰和道德观继续决定着美国人如何选定总统，但大众文化和好莱坞电影的作用也无法忽视。在这次奥巴马 VS 麦凯恩的选战中，有两个影响“剧情发展”的因素尤其值得一提：一是流行音乐，一是好莱坞大片。这是美国大众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记得十年前到美国时，在地铁和公车看到上下班的美国人几乎人手一册，不是阅读厚厚的小说就是五花八门的杂志，好生羡慕人家的国民喜欢阅读的品性。但随着 MP3 的流行，现在看到的景象已经有所改观：绝大多数年轻人手里的书本已经被 MP3 耳机代替了，而且喜欢听流行音乐的年龄正在上升。我很好奇，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如果说年纪偏大的麦凯恩没有注意到，那么他的竞选团队怎么会没有人提醒他？

迄今为止，在竞选中花样翻新的麦凯恩没有向耳机的一代展示自己任何一点音乐才能，或者对音乐的兴趣，更糟糕的是，他竟然嘲笑奥巴马是流行明星，把他和小甜甜布兰妮相提并论。麦凯恩的嘲讽到底是给自己加分还是给奥巴马加分不得而知，但显然奥巴马不以为意，而且他早就展开了音乐攻略。

奥巴马的音乐攻略首先包括宣布喜欢听某某明星的歌曲，不经意间已经把这些大牌音乐明星的粉丝都收归自己了。其次奥巴马也通过音乐直接为自己造势。当奥巴马站在这些摇滚

明星们一边一起摇头晃脑的时候，他确实正如麦凯恩讽刺的一样，但他却在不知不觉间收复了很多乐迷们的心。就这一项，就可以断定，18 至 30 岁之间那些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将更喜欢奥巴马。这些年轻人喜欢奥巴马不关政治，但他们手里的选票却决定美国政治的未来。

当奥巴马参选民主党候选人时，美国的好莱坞迷和电视剧迷都呆住了，因为当他们看到奥巴马时，他们首先的感觉是，此人是不是从好莱坞大片或者某一部红遍美国的电视连续剧（例如《24》）里走出来的？

因为只要你喜欢看好莱坞电影或者美国的电视连续剧（谁不喜欢呢？），那么你脑海里总会留有几个美国黑人总统的形象：年轻英俊，身体挺拔，聪明睿智—既然设计一个黑人当总统，你敢政治不正确地让他是个坏蛋？总之，那个黑人总统在任何好莱坞大片或者电视连续剧中都不是主角，但却是让你过目不忘的正派角色。

现在，一个仿佛从荧屏和银幕里走出来的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出现在你面前，这不仅仅是奥巴马的梦想成真，也是你的梦想实现了。你会支持他当选总统吗，第一次看到奥巴马在竞选中手舞足蹈的画面的时候，我在想，是美国导演们成了政治预言家，还是美国民主党按照美国电视剧里塑造的美国人心目中的"黑人总统"形象推选出了这个奥巴马？奥巴马的形象至少满足了受好莱坞影响的一代美国人，他们早就接受了电影和连续剧中的黑人总统形象，现在他们要导演出一个现实中的黑人总统，而奥巴马的形象和演技又让他们如痴如醉。

在越战中被捕关押受到拷打，最终活着回到美国的麦凯恩几十年来留给美国人的形象不可谓不高大，然而，他再怎么高大，也不及好莱坞设计出的那么多位黑人总统深入人心。从这一点来说，麦凯恩输了，虽然输得冤枉，但不能不服气。

麦凯恩要服气的事情还有很多，奥巴马在流行音乐和好莱坞大片都占尽便宜之后，又向年轻人更加集中的网络游戏挺进。中国网 10 月 14 日报道，奥巴马的巨型竞选广告出现在一款流行的赛车游戏《火爆狂飙：天堂》中。该广告是奥巴马竞选团队付制作费的，这件事引起了很多沉湎于游戏的网络玩家暂时停下来瞥一眼未来的总统奥巴马。

一个演员要想得到观众的青睐，必须知道如何依靠自己的言行和演技博得观众欢心。麦凯恩竞选团队最激情的口号是"国家，国家！"而奥巴马的最激情的口号是"我们能够做到！"曾经为国家流过血的麦凯恩喊出"国家"的口号不足为奇，而受奥巴马吸引的年轻人则正好认为，当今所有的灾难都和国家的无能有关，他们期盼的是自己，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民众需要改变，而奥巴马就代表了改变。

如果说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候选人的演技，我们还忽视了更重要的，美国大选这出大戏和电影电视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总导演不是两党候选人和他们的竞选班底，而是广大的观众——美国的公民。

这种区别使得美国总统候选这出大戏　更精彩和更加扑朔迷离。具体到目前奥巴马ＶＳ麦凯恩，虽然两人民调最高相差超过 8 个百分点，按说数天后的选举结果已经无法逆转，但并不是不存在变数。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投票日的临近，这出大戏中的真正的主角——美国选民——将登上舞台。和好莱坞大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总统大选这出大戏里，观众不是被演员和曲折的剧情牵引着走，而是演员被观众（也是主角）牵制，演员们不得不随时修改剧情以迎合观众——选民。

杨恒均 原载《南都周刊》[美国大戏・戏评]

《2008 美国大选：一场游戏一场梦》系列之三

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

22 个月：从不相信会有黑人总统到希望奥巴马当选

让我把时间推回到 22 个月前，当时我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收音机里播放一个小时的（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面面俱到"节目（NPR "everything considered"）。这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台节目。当天的话题是：美国人准备接受一位女性总统吗？美国人准备接受一位黑人总统吗？一个小时后，收音机里几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总统还马马虎虎，但黑人总统，可能还言之过早。

他们的结论和我的不谋而合。所以，当奥巴马和希拉里竞选时，我认为他会败下阵来。而当他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我又和共和党想到一起去了：民主党这次输定了。后来奥巴马和麦凯恩一路拼下来，我都很少去关心，说实话，由于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我并不关心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这一点我已经反复说过。

也许奥巴马和麦凯恩在经济政策上会有所同，然而，那是住在美国的人应该关心的，和我无关。而至于在一些我们中国人更关心的领域，例如国际关系、外交等方面，两个人谁上台其实都差不多。难道你真以为奥巴马上台就会立即把美军从伊拉克撤出来？难道你认为麦凯恩上台就会更关心中国？

一位美国朋友还告诉我，在美国普通选民看来，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减税等经济政策上，可是实际上，美国专家和政府高层有些人都清楚，两人现在的所谓减税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是画饼充饥，用来忽悠选民投自己一票。任何一个候选人上去后，他们都会在第一年里迅速改变自己的那些"承诺"。

再说，以我的观察，美国媒体和专家对谁当选的分析早就入木三分，远非中国的一些媒体上的学者和时评家"隔岸观火"所能及。所以，我就不班门弄斧了。然而，在离选举还有 72 小时、48 小时、24 小时的关头，我却忽然紧张起来，我终于认识到，我其实是很介意谁当选的。

是的，我很紧张这次选举的结果，以致在选举 48 倒数小时时，我想写一篇文章呼吁我的美国朋友们都去投票——把票投给奥巴马！

奥巴马改变不了世界，但世界会因为他的当选而改变！

奥巴马是谁？我知道多少？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他。22 个月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从电视

或者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他的名字，电脑上不停地跳出他的名字，但我甚至没有去阅读他的简历。在我眼里，他谁都不是（nobody），他能够脱颖而出，把一个代表国家的老兵打下去，完全是天时地利。麦凯恩形象死板，打出的竞选招牌竟然是“County First”（国家第一），他正好碰上布什总统用“国家”把美国人折腾了七八年，碰上“国家”深陷伊拉克，碰上“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从而影响了民众生活，碰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踽踽独行……。还是奥巴马新鲜，以前没有任何政绩，没有固定的形象，想怎么装扮就怎么装扮。于是他打出的是：Change, We need（我们需要改变），We Can (我们能够做到)。

奥巴马到底能够做到什么？他能改变什么？我想不但台下那帮年轻人糊里糊涂，恐怕奥巴马也搞不清楚吧。愣头青奥巴马在选举只有 48 小时时走到哪里都是那么几句激动人心的话：这次选举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你们的。我们一起，先改变 XX 州，然后我们就可以改变国家！改变世界！！

奥巴马真能改变美国？真能改变世界吗？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了，只想说，如果麦凯恩改变不了世界，奥巴马照样改变不了。奥巴马上去后，以他的执政经验，他将会大量使用前期民主党政府（例如克林顿政府）的老臣，还会在华盛顿“旋转门”里挑选一些新面孔。在目前国际环境下和内政外交之下（尤其是经济危机），奥巴马上台后，能够改变华盛顿和美国几个州的经济情况，已经算是不错了——更不用说改变世界。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不会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身上，包括对待中国问题上，我也同样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位美国总统身上，因为美国从上到下，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基本上已经有了共识，左右摇摆不会太大。

可是，为什么在美国选举日近的时刻，我突然紧张起来？突然担心奥巴马选不上？甚至想以一个非美国公民的身份去为他拉票，“干涉美国内政”呢？

让我再把镜头转到过去的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我有很多时间是在电视机前看大选节目的。我想，即便不在美国生活的人，也能够从众多的频道上看到我所看到的那些内容。你看到和听到了什么？经济政策、减税、水管工 Joe、伊拉克政策、反恐、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贸易、两位候选人的家庭、工作背景，以及他们的每一句讲话，他们的幽默搞笑，他们的孩子、妻子或者丈夫的衣着打扮等等……

CNN，BBC， FOX News，CBS……，我有时一小时内换十几个台，内容也都大同小异。不过，美国媒体实在厉害，他们可以把奥巴马和麦凯恩的一切——从个人打扮到施政细节两相对比，事无巨细地一一展现给观众——可是，你觉得少了点什么没有？

如果你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看这些新闻电视和深度分析，你定会像我一样发现少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一样东西是如此的明显，可以说一目了然吧，可是，所有的新闻媒体，所有的节目，所有的评论员和专家却都视而不见，或者说，回避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在说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皮肤——我在说“种族”。

虽然所有的电视台都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政治正确），然而，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都

承认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将是历史性的（historic）！

虽然美国人最关心的依然是经济，想着伊拉克和反恐，可是他们心里明镜似的，美国如果出现第一个黑人总统的话，不但对于美国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世界也将悄然不同。

种族歧视：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奥巴马当选总统怎么就改变世界了？我们看不出来？你不是说他什么也不能改变吗？是的，你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这个改变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的，而世界的改变往往是由人类内心的改变引发。

作为一名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的中国人，如果你问我，对这个世界最期盼的是什么，我会顺口答道“没有战争和种族歧视”。而且，相比较战争而言，种族歧视给人类造成的伤害反而更大，也是引起很多历史上最邪恶战争的根源。

40 年前，奥巴马的先辈马丁-路德-金博士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讲，那篇演讲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之一，可是，那只不过是一个想要自己的孩子能够和邻居（白人）孩子一起上学、玩耍和就业的人类最低等的梦想而已。

然而，如果不是马丁-路德-金那个最低要求的梦想，40 年后的今天，我和我的孩子，又会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呢？还有大概两千多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这个数字还会急速增加），又会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下？

马丁-路德-金是最伟大的，他的伟大除了他本人的远见卓识和勇气，还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最伟大的国家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在美国的所有节假日里，只有马丁-金博士的生日是这个白人国家里唯一的一个以个人生日作为国家假日的。

然而，种族歧视真正消除了吗？或者说彻底消除了？我想不但我的回答支支吾吾，很多人都不敢说他们的答案是正确的。作为一名整天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的大地旅人，我对此的认识也许比其他朋友人更多一些。

这个世界最深的忧虑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贫富差距，独裁和民主、意识形态，南北关系、东西关系……我不否认这些都存在，然而，在我的观念里，我始终认为种族，才是最大的问题。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和屠杀几乎都是因为种族引起的，例如二战时候德国屠杀犹太人和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都和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分不开。种族也是贫富差距、意思形态和文明冲突的重要根源。

现在，在美国和澳洲这些发达国家里，种族歧视不但从法律上完全消除，而且甚至有些政策更倾向于照顾弱势的种族（例如美国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并且白人们再也不会对着你说：黄种人、黑人、棕色人……可是，在内心深处，那种种族的壁垒和歧视，是否还存在？也许，那是一个秘密，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秘密。

正因为有这种秘密存在，所以我和那些白人专家们在 22 个月前对出现一位黑人总统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态度在奥巴马这匹“黑马”出来后变得犹豫不决。我不能肯定，美国人真的准

备好选择一位黑人总统？

难道美国人要再一次展示自己的伟大，就像当初他们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一样，他们又要创造历史，选举一位黑人总统来展示这个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炫耀这种民主制度甚至可以消除种族隔膜？美国人要用一位黑人总统给族歧视划上一个句号？也消除我们所有人心中心照不宣的种族歧视的魔障？他们能够像终结独裁的历史一样消除人类心灵深处最深的痛吗？

人类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种族和政治制度——美国将要在 2008 年大选中毕其功于一役？

白人、黑人和我的“种族歧视”

美国、澳洲等国家的种族歧视无疑是白人造成的，然而，发展到今天，种族歧视却存在于每一个种族之中。相比较而言，我发现问题最严重的部分反而不是在白人之间。作为白人一直控制的立法和国家机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宪法和法律上彻底消除歧视的历史变革。至于一些白人心底残存的歧视，却不一定能够在现实中造成既成事实和伤害。反而是另外一种残存在心底的东西，造成了彻底消除种族歧视。那就是我要说的，残留在被歧视者心底的阴影，更大的阻碍着社会的和谐和进步。

美国黑人一直是受教育最低和收入最低的族群，这些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如果说在美国黑人受到歧视的话，那么相比较白人而言，中国人可能是更歧视黑人的。和白人眼中渐渐淡化的颜色（黑色）相比（只是淡化，远远没有消除，过去 12 小时的民调让人感到惊恐：美国一些州特别是佛吉利亚等，超三分之二的白人把票投给麦凯恩），你看看这次出现在美国投票站的黑人排队长龙，发现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投票给自己的“同类”——黑人奥巴马，你会长叹，这些美国黑人眼中才更有颜色和种族。

和黑人族群正相反，中国人重视教育，勤劳。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人目前的处境不能全归罪于历史因素（种族歧视）。虽然很多黑人靠勤奋和教育在美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鲍威尔将军。但在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眼中，他们仍然是白人政府的点缀。直到 2008 年突然出现了奥巴马，以短短 22 个月的旋风般的速度，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这一切对于美国黑人、华人和整个世界的族群的冲击，又岂是什么经济和政治政策可以比拟的？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关心美国的政治，但却不能忽视人类的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却可能在紧要关头逆转，这也就是我心中的魔障，种族歧视的魔障。到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这感觉竟然如此强烈。22 个月，奥巴马一直一路领先。如果说，从一开始他就输给麦凯恩，最后也没有选上总统的话，美国会无所谓，世界也能够承受得起。可是，如果他一路领先，只到最后投票的时候，才突然落选的话，那么他就不是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而是败在一些人心中深处的种族歧视的魔障，那么整个美国甚至世界又会如何面对？

美国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被称呼为“布莱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1982 年，洛杉矶黑人市长布莱德利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加州州长，投票前民调显示他大幅领先，投票结果却

是他以微弱劣势输给白人竞选对手。这种现象就是心照不宣的种族歧视在作怪，很多白人选民在民调时宣称支持黑人，但在投票时（匿名投票）却把票投给了和自己肤色相同的"同类"。

也许，选一个州长发生这种情况，大家也就一笑置之，最多社会学家研究几年。可是如果在2008 年总统大选中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的担心是，美国渐渐愈合的种族歧视的伤口会被大大的撕裂，从而波及到世界的种族和谐。而两千多万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深深惊恐美国大选的结果会出现逆转的原因。美国可以承受一个根本没有出现黑人总统候选人的结果，也可以承受黑人候选人民调一直落后于白人而最终没有选上的结果，但却无法承受民调一路领先最后却因为一些人心中的魔障而落选这个结果！

奥巴马当选的意义——我有一个梦！

奥巴马的当选本身改变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最惨痛的种族歧视的国家，出现了一位黑人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四十年前"我有一个梦"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如果还有人认为没有实现的话，那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的阴影如此厚重，挡住了他的眼睛。

奥巴马当选首先是给美国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族群带来新的希望。长期以来，黑人问题一直是美国的老大难，甚至贯穿在美国的很多问题之中。其中除了有历史因素作怪（当然主要是白人的问题）以外，也有很多黑人自身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内心挥之不去的"屈辱"和"自卑"感，一直严重地阻碍他们自身的发展。这一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侨有很深的感触。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于生活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华侨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要知道，很多黑人的祖先都是奴隶和偷渡客的后代，而中国人现在虽然背井离乡，却很少是被当奴隶卖出去的。和中国人注重经济利益有所不同，这些"奴隶"的后代更加注重自己的权益和政治利益。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这个国家是人家的，我们是旅居在此，这里永远不会是我们的。这种思想一直钳制着华人华侨在当地向政治领域进军，反过来又常常损害了华人华侨的长远利益。奥巴马的当选——登上美国最高权力宝座——给所有居住在民主国家的华人华侨带来新的启示和巨大的希望。

法律还是那个法律，宪法也还是那个宪法，然而，我们心中的魔障应该消除了，如果我们被自己心中的魔障羁绊，怨天尤人，那能够怪谁呢？当我们再一次想老调重弹对美国等国家的种族歧视做一番评头论足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先检视我们的内心，想一想，我们首先在内心消除了对自己的歧视了没有？我们为了自己和人家的权利奋力发声了没有？我们努力了没有？我们心中是否曾经有那么一个梦并一直追求这个梦想？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就在这里了，这比所谓美国未来四年的经济如何，是否还继续泥足深陷伊拉克意义要大得多。在美国竞选 24 小时倒数的时候，我很紧张，我眼中看不到经济和伊拉克战争，我看到的是一场心灵之间的南北战争。我忍不住给我的一位有投票权的美国朋友打电话。我在电话里说，你应该把票投给奥巴马，不是因为他的税收政策，不是因为他要从伊拉克撤军，不是因为他承诺要对华人怎么好……你投给他的那一票，是投给一种理念和信念，投给一种希望和理想！美国已经有几十个清一色的白人男性总统了，但没有

一个总统被选上后，可以像奥巴马被选上时那样，全世界都可以自豪的说，世界已经被改变，新的历史被创造了！

行文至此也应该打住了，可是，有人问，你的题目里说“我有一个梦”那到底是什么梦呢？其实是什么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梦，那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你的梦是进城的农民工的孩子能够和城市孩子一起进同一所学校读书和玩耍；也许他的梦是不要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就能够投票选择自己的“总统”；或者你的梦是中国不但国家强大，而且人民也富裕，走到世界各地都不再受到歧视；也许，我的梦是中国每一个少数民族都认为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又或者，海峡两岸都梦想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能够和睦相处，永不战争……当然，还有很多梦，例如当我们看到美国黑人奴隶的后代当选总统的时候，我们忍不住梦想，山西黑窑洞的小奴隶们都能够在母亲的身边喝上没有夺走他们小生命的牛奶；我们还梦想，十一岁的小女孩在遭到惊吓后，不再被有权有钱有级别的主人威胁；我们也许都做过或者继续在做那样一个梦，在梦中，我们不是二等公民，我们活得有尊严……

你看，有什么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我、他都有一个梦。奥巴马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都是沿着 40 年前马丁-金博士的那个梦在前行，没有那个梦，他什么地方也去不了，更不用说进白宫了。

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当我们都有了一个梦，当我们都有相同的梦想的时候，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

杨恒均 2008-11-4 （美国总统大选日）

《2008 美国大选：一场游戏一场梦》系列之四

奥巴马提前进入华府的原因

圣诞节的装扮和新年的灯饰还没有拆除，华盛顿的街道又开始忙活起来，好几条主要街道旁边开始搭架子，白宫周围更是高台林立，这一切都是为 1 月 20 日奥巴马就职典礼准备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给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美国带来了不少期望，可有专家正为奥巴马捏一把冷汗，担心美国人对他的期望越高，到头来的失望也越大。

但不管怎么样，1 月 20 日显然将会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位年轻的黑人总统将入主白宫。我在美国工作时，美国朋友曾经告诉我，由于有钱人一般不住在华盛市区里，每天下班后，白人们纷纷驱车回到临州的别墅，华盛顿市区里剩下的都是比较穷困的黑人。当时的华盛顿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首都。有一句话这样说，每到夜晚，全华盛顿只有两个白人住在里面，一个是总统，另外一个是第一夫人。看起来，1 月 20 日后，夜深人静的华盛顿，一个白人都没有了。

1 月 20 日就职典礼那一天，据说有 4 百万人涌进华盛顿这座小城市，可能会创历史记录，这两天已经陆续公布了封路计划，我原本想在这里看典礼的，但看到这阵势，已经改变主意

了。奥巴马来了，我还是赶快逃掉吧。

我虽然逃出华盛顿，但还是有些为奥巴马担心，这位年轻的黑人总统被寄托了太高的希望，也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他能否不负众望，实在还言之过早。不过，今天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个消息让我稍微感到一些安慰。

在费城看望朋友开车回华盛顿的路上听到收音机里说奥巴马已经提前进入华盛顿。我一听这消息就有些吃惊，这个时候提前进入华盛顿，好象不太符合历次就任总统的低调作风，也不符合奥巴马的草根形象，可能会给现任总统布什一定压力。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提前进入华盛顿，原定计划不是这样的。

不过收音机里接着说出了奥巴马提前进入华盛顿的原因：明天是美国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奥巴马因为"工作变动"，女儿也要转到华盛顿读书。为了女儿能够赶上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奥巴马夫妇决定改变进华盛顿的原计划，提前搬过来，将就女儿上学，这样两个女儿就能够赶上开学的第一天了。

听到这个新闻，我愣了一会。虽然我无法和人家总统比，但收音机里说的事却是我经历过好多次的。由于经常换地方，每次都害得读小学的儿子也跟着我们换学校。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是早搬家两天，让孩子能够赶上新学校的第一天呢，还是按照大人的计划？这真是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的大人的做事方式，小孩子特别是小学生早上晚上几天学，好象关系不大，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可我们谁又知道小孩子怎么想呢？他们的心理又如何呢？

有一次我听一位心理医生讲，对于一个小孩子，这可不是小事。新学期，每个孩子都是新人，对孩子的心理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一个孩子如果半途插班进入一个新学校，哪怕只比开学晚了几天，对孩子的心理都会有一定影响的，对于内向的孩子，影响就更大了，而且多以负面影响为主。所以，在后来搬家的时候，我就尽量让孩子不要半途插班。有时搬家了，宁肯开很久的车，也要孩子继续在原来的学校呆到新学期开始才换新学校。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突然听到一位美国总统也为自己的两位女儿入学而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实在让我有些吃惊。不过吃惊是吃惊，很快就想通了。是的，就算你是美国总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在孩子面前，你仍然是一位父亲，一位时刻为他们着想的父亲。奥巴马提前进入华盛顿不是普通的一件事，但他提前进入华盛顿的理由却是如此之普通。普通得让你觉得美国总统也只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位普通人。你甚至会想，这位美国总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悄悄进入女儿的寝室，细心检查女儿的作业本，想着女儿开学后第一天上学的情景——

不过，我心里还是有点疙瘩。毕竟他是美国总统，他才上小学的女儿真需要那么准时入学吗？他的女儿什么时候到学校，对于那个学校难道不比开学的日期更重要？要知道，从他被选为下任总统时开始，他上小学的女儿就将由白宫特勤局的特工负责接送上学放学。虽然，总统的女儿也是上普通学校，但她们的生活起居已经不再是普通人的了。连总统孩子上课的时候，教室外也将会有荷枪实弹的特工把守。

稍后的时候，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说，奥巴马夫妇此举不但是要让孩子正常入学，而且也是以此给女儿传递一个信息，即使是总统，今后一切还将和普通人一样。当然，这是主持人的

解读，我认为，奥巴马可能不只是象这为电台主持人解读的，草根的奥巴马更是借此机会向美国人表明：奥巴马到华盛顿接掌世界最大的权力了，但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是一位为女儿精心算计，连一堂课都不愿意让女儿拉下的父亲，一位和绝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一样的循规蹈矩的人。

奥巴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关注，他什么时候进入华盛顿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他突然来到了华盛顿，而那理由竟然如此之简单：为了上小学的女儿能够赶上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我不知道奥巴马此举是他的智囊们的精心策划，还是他草根平民本性使然，他此举带给我们的信息，或者说是新年的愿景却是如此的鲜明：爱我们的孩子，遵守规矩，放下权力的傲慢。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对 2009 年的祝愿，爱我们的孩子，遵守规矩，别让傲慢的权力再折腾人。

杨恒均 2008/1/5 华盛顿

奥巴马能否全身而退

20 日，奥巴马的就职典礼有 200 万美国人参加，创下了历史纪录。在这之前，总统就职典礼参加人数的纪录保持者是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他在 1965 年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涌进华盛顿的人数多达 120 万人，那时像奥巴马这样的黑人大多还没有选举美国总统的投票权，更不用说去竞选美国总统。44 年后的今天，黑人当总统了，200 万美国人涌进华盛顿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此时，我很煞风景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四年后——或者如果他够幸运的话，八年后，奥巴马能否全身而退？

这里的全身而退的“身”，不是指他的“身体”，虽然大家都预感到，奥巴马将会成为极端种族分子明杀和暗杀的目标，但这不是我讨论的主题。我说的“身”更多地从奥巴马的“名声”和“精神”出发。奥巴马可以风光就职，但他能够同样风光地离开白宫和华盛顿吗？我很怀疑，不是怀疑他的能力和人品，而是历史和现实一再展示一个浅显的道理：总统是不好当的！

奥巴马就职演讲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不但实现了他自己的梦，也实现了美国创建者奠定的美国梦，而且更主要的是，他这一折腾，让全世界早就失去希望的人、民族和国家也都开始重温旧梦或者编织新梦。可是，那些梦想很难实现的民族可以继续在梦想里生活，意淫奥巴马，而美国人则绝不会在一个梦想前止步不前的。他们会有新的梦想，他们会有新的期望，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把这些梦想和期望寄托在奥巴马的身上。奥巴马是否还能够再创辉煌？他能够不仅仅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带领美国人追求所有人的理想吗？他有这个能力吗？

听演讲的一位安全人员情不自禁地向奥巴马致敬

现场美国人的表情各异，但心情是一样的；唯独我，脸上毫无表情，心情和他们也完全不一样。

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但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包括一些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经历，我们就有理由为奥巴马捏一把冷汗。让我们不要忘记就在奥巴马就职那天离开白宫的小布什总统。可能很少有人记得，八年前布什总统当选的时候，美国人的激情一点儿也不比现在低，我当时遇到的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美国人都会长长松一口气地说，终于可以让白宫干净一点儿了。不错，整整八年，白宫被克林顿搞得乌烟瘴气，雪茄和实习女生的气味，让美国人觉得八年已经足够了，应该改变一下了。于是他们挑选了不但办事效率高、低调，而且每天晚上九点就准时爬上床的富家公子小布什，这对逐渐要求回归家庭的美国人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华盛顿早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共和党总统实在太保守，保守得都不喜欢做爱了；而民主党总统倒很开明，也很喜欢做爱，可是他们从来不和自己的妻子做。——现在好了，谢天谢地，白宫里终于住进了一位不但喜欢做爱，而且还九点钟就上床和自己妻子做爱的总统，上帝保佑美利坚！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八年前小布什就职时，他的民意支持度只比当今的奥巴马略低一点点，而在小布什上台后不久就发生了“9·11”事件，上帝没有保佑美利坚但照顾了小布什，结果，小布什的民意支持度飙升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才享受过的高度。

我倒想知道，如果说奥巴马现在的民意支持度比小布什上台时稍微高一点儿，那他干什么事能够让他在未来四年里达到小布什曾经有过的高度？如果没有，那么他未来四年准备靠什么继续凝聚民意，以便四年后连任成功？（大家知道，在美国当总统如果不连任的话，几乎是“奇耻大辱”，老布什只干了四年就下台了，一直耿耿于怀，而小布什最大的成绩就是帮老爸报仇了，多谢恐怖分子，他一干就干了八年，虽然最后有些灰溜溜。）

说实话，就从我这一个月窜访华盛顿打探到的消息，迄今为止，奥巴马显然还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内阁班底基本组成了，大都是老面孔，他们如果真能带来改变，那么华盛顿早就改变几十次了。看起来，今后还得看奥巴马自己那张诱人的黑面孔是否能够搞出点儿新意。对于伊拉克战争和恐怖分子的军事措施上，奥巴马显然已经从竞选的慷慨激昂中退缩了，他留任了小布什的国防部长，让很多支持他的人目瞪口呆。竞选的时候，部分选民曾经希望奥巴马修正小布什步步紧逼俄罗斯（使用北约扩张的方法）的政策，但现在看来，奥巴马突然没有动静了。还有中东政策，特别是以色列，奥巴马能够挥洒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如果他想连任的话，光靠年轻人激动的时候捐出的一些零花钱显然不够，犹太大佬们还是不能忽视太久的。

那么关于经济又如何？对于美国这些已经充分享受了自由和人权的人民，没有什么比“温饱”更重要的了——所以如何度过经济危机，并让美国人不为房贷和昂贵的假期发愁，至少保证他们口袋里的钱不继续流失，不但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也是他第一个任期内最大的挑战。目前看来，最核心的问题是他如何支配和使用那笔接近天文数字的财政支出。

即便奥巴马渡过了所有这些难关，那么他的人品如何？一个黑人穷孩子出身，能够顶得住华盛顿白宫里的巨大诱惑？请大家再想一下另外一位总统，克林顿——算了，换一个吧，老拿

他开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再说，人家已经是美国国务卿的老公，我换一个说吧：陈水扁。

大家回想一下，当初陈水扁当选的时候，整个世界是不是都激动不已？如果说奥巴马当选实现了美国建国230年以来的梦想，那么陈水扁当选据说是中国人五千年没有碰上的。那时的陈水扁一点儿也不比奥巴马逊色，那个风光可以说不可一世。后来情况还用我说吗？当然奥巴马和陈水扁所在环境毕竟有区别，美国是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总统和常人一样清楚，要想利用总统宝座捞点儿经济利益，或者搞点儿徇私舞弊，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而亚洲一些新兴政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几乎都要牺牲掉它的前几位民选"总统"，这些"总统"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也做出了贡献，然而，当他们当上"总统"后却没有分清"总统"和国王的区别，结果身败名裂，甚至锒铛入狱。

正如我不会否认台湾政治的成绩一样，我始终认为奥巴马当选本身已经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奥巴马的当选改变了世界，然而，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人的总统，他还得在自己的任期内改变美国，否则，过去的辉煌也只能是过去的。而且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过去多年的历史教训向我们显示，在民主国家当总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荣耀地登上总统宝座有如登天一样难，但能够光荣地离开总统宝座则比登天还要难。

写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质疑我，按照你说的，那当总统干啥？不错，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或者政体里，去竞选总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总统这个职业并不是那么激动人心的，对于独善其身的人，总统职位甚至是"高危"的。

首先说说经济利益。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一般认为民主国家的总统一定可以赚钱吧。可是，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美国的绝大多数总统在卸任时比上任时要穷，至少有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总统在离开白宫时或者之后都有些穷困潦倒，欠债的有，晚年生活穷困的更多，这个名单里就包括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克林顿。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很风光，但如果不出意外，他移到华盛顿后，他们全家的收入将会减少而不是增多。

再说说总统的"人权"，在有些国家，民众想当然地认为当了总统，自然可以要风是风，要雨是雨，即便不像中国的皇帝那样搞个三宫六院，包几个二奶总算没有问题吧。大家看看克林顿就知道了。其实，总统的不自由还有很多。就拿奥巴马来说，他的当选是依靠了熟练地拨弄手机的年青一代的，可是，就在他当选总统的那一天起，他自己心爱的手机被总统卫队"没收"了，从此以后，他所有的电话都是国家事务，他没有随便使用手机的自由了。当然，总统还受到很多限制，这里只是举个好玩的例子。

总统在很多事情上的道德水平要求是很高的，稍微有所差池，你会后悔自己当了总统的。大家不妨想一下尼克松。

也许有人会追问一句：既然没有经济利益，又没有个人特权，为什么要当总统？为什么美国还有那么多人想当总统？我的回答是，自古以来，世界上没有人不想当总统（或者国王、皇帝、首相的），他们为什么想当？因为有利可图，因为有特权呀。但是，民主制度的好处就是这个制度本身不但是让人民做主的，而且也是由人民来修改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的。他们修改来修改去，就把这个制度中权力最大的人——总统——关进笼子里了。而且对其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弄到最后，一个民主制度成熟国家的总统如果说是一种职位，倒不如说是一种理想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为了理想而只是争权夺利的结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特权的话，最好离这个职位远一点儿。

如果从这种角度来说，那么很容易理解布什的失误和奥巴马的优势。布什总统出生富贵，做事按部就班，一板一眼，人也很平和，没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完全一个小官僚的作风。可惜他选择了白宫这个最高职位，这个职位是一个关于理想的职位。我注意到，过去八年，哪怕是在反恐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布什总统的演讲也都非常平和，很少有煽情的激情和机智的东西在里面。这也许是他的优点，但在美国人遭受多重打击的时候（例如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他就显得太平庸了。

奥巴马则完全不同，他更像共和党的里根，那个夸夸其谈的好莱坞演员，在后来总统任内，几乎把当时在好莱坞当演员背诵的台词都重复了一遍，弄得美国人像看好莱坞大片一样舒坦。奥巴马的演讲不乏机智，但更多的是激情。他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希望和改变。1 月 20 日，他的就职演讲无疑是另外一次精彩的表演。然而，演讲本身绝对不能满足美国选民，你得把激情的理想变成现实中可以触摸的东西，让民众信服你。那样你不但可以从白宫全身而退，而且还能够光荣而退。

过了 1 月 20 日奥巴马进入白宫后，轮到他倾听自己的演讲了：他能够实现自己演讲中的承诺吗？用中国一句俗话说：过了今天，你奥巴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知道。

倒霉的克林顿

“旋转门”与国家安全

我到美国工作后不久就发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漏洞，当时我还以为是一个巨大的发现，直到好几年后，才和美国人朋友讨论起这个问题，结果才知道，人家早就知道这个漏洞，而且这漏洞也一直是 FBI（联邦调查局）和 CIA（中央情报局）竭力在堵塞的。

我说的是美国政界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旋转门”。美国也是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当选一个总统，政府各部门的第一把手和重要职位（以及他们的重要智囊）几乎都要换一遍，例如这次奥巴马当选，华盛顿一下子就要换掉了几百位最高级别的官员，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按说各国都有这种情况，可是美国的更换频率之高却是少有的，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更换都是很平和进行的，波浪不惊，没有人哭哭啼啼，没有人要找政府给补助，更没有人认为自己不得志。今天你还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存在大选还没有结束，你就有可能被白宫挖去当教育部长。而今天的商业部长，明天就失去了工作，成为一名普通公民，你得去一个公司当顾问赚钱养家活口。这就是旋转门。这个不停转动的旋转门，使得每一个想从政的年轻人都有机会一试身手，也使得玩过一阵政治的人可以全身而退，再去赚钱过另外一种生活。

然而，正因为这种旋转门现象，却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例如，昨天还是美国国防部的高级智囊，今天就失业了，就要去找工作，谁能保证这家伙不会被全世界的间谍机构盯上？我有工作给你，干不干？只要透露点情报，或者给我的“公司”参谋参谋，就给

你丰厚的待遇。

当然，相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这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的安全保密工作更加难做，因为你甚至无法“防患于未然”。那就是一些在“旋转门”另外一边等着随时转进去从政的那部分人，例如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们。相比较前一种受到过保密教育的刚刚从政府机构转出来的人，他们更容易成为海外间谍机构拉拢的对象。有眼光的间谍机构不会傻到打美国政府高官的主意，他们只要很有耐心的在华盛顿转悠，找到一些研究学者“授之以惠、动之以情”就可以了，或者请他到某国去好吃好喝一个星期。据我的经验和并不科学的统计，在华盛顿那里从事所谓学术研究的美国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机会进入政府重要部门，甚至成为白宫依赖的高级智囊。

就是美国的“旋转门”现象，也是美国 FBI 和 CIA 投入很大精力应付的重大事件——FBI 负责国内监控，CIA 则在世界范围内对他们进行跟踪。

可是，对于美国的普通民众，他们并不那么关心“旋转门”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他们更关注的是“旋转门”现象下的经济腐败和利益集团问题。

奥巴马与 K 街

如果你问我美国华盛顿最神秘最有权势的街道是哪一条，我不会告诉你是联邦银行所在地，也不是中央情报局驻地，甚至都不是白宫和国会山，我会告诉你是 K 街。这是一条很普通的街道，然而，却是美国智库和院外集团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上班的没有多少人，一栋栋大楼也不是很热闹，但你应该知道，盘踞在这里的智库、公关公司和院外劝说集团几乎雇佣了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都是经过“旋转门”退出政府和国会的重量级人物。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雇佣他们的利益集团服务。如果你也也雇佣得起，哪怕你是外国人，他们甚至都愿意为你服务。

美国院外集团的坐大，甚至改变了华盛顿情报战的玩法。上次去美国和一位情报专家聊天，他感叹，现在不用搞什么秘密间谍战了，你只要有钱，到华盛顿开个公关公司，找一些常常穿越“旋转门”的美国人做顾问，你甚至不必去知道白宫制定了什么计划，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关系去影响白宫制定什么计划。

又扯到国家安全了，毕竟对于美国普通人，国家安全太遥远，普通的美国民众对于利益集团和院外集团影响美国政府决策早就怨声载道。这一现象无法改变，和 K 街的存在很有关系。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都和 K 街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本家有钱，雇佣重量级的“旋转门”过来的政府官员当说客，最终导致了贪婪不受限制。

而携带巨大人气的奥巴马当选后不久，就释出了一条命令，要求延长从旋转门出来的政府官员受雇于院外集团的期限，以前很多政府官员出来后，很快就受雇于公关公司，奥巴马宣布，必须等待一个相对较长的期限。这件事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一些在 K 街工作的朋友摇头晃脑，感觉到今后的生意可能要困难一些了。

倒霉的克林顿

美国旋转门中转来转去最耀眼的人物自然是美国总统，他们在几年前还是普通公民，几个激情的演讲后就成了美国总统，然后干几年后，又回归带保镖的平民生活。不当总统了，自然也是要去打工赚钱的。可是，美国总统却不会在一下台就受雇于 K 街的顾问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可谓生财有道。

克林顿在位八年，美国的经济直线上升，美国人的口袋都满了，然而，克林顿却在当了八年总统后发现自己破产了，他是又一位在卸任总统职位时比上任时个人经济情况要差的美国总统。由于那场“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做爱”的官司，克林顿在离开白宫时据说是欠账的。正如当时的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中的一句流行语：“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想想人家克林顿。”

卸任的克林顿又不能被 K 街雇佣，又不能去华尔街直接找工作，可他又欠钱，怎么办呢？他自然有办法，一下台就开始写书，在白宫干了八年，总知道一些别人不清楚的“内幕”吧？再不成，稍微点几句发生在椭圆办公室桌上的事儿，也能够吸引人吧？于是书商一拥而上而上，虽然最后签了他自传的公司拒绝披露他们出了多少钱买版权，但数字应该在 2 千多万美金以上。这一下子，克林顿就还清了欠账。

但自传只能写一本，接下来，还要赚钱。美国百万富翁很多，亿万富翁也不少，以克林顿的聪明和努力，如果不当总统，当一个亿万富翁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于是，卸任的克林顿开始走上致富之道。他采用的方法不是新的，以前的美国总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开始到处演讲收钱，先是在美国国内，等到美国国内有点腻味他了，他就跑到国外去，跑到中国，跑到欧洲和科威特去演讲，克林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秘书数钱手都数软了。

这些年他到底赚了多少钱？据不完全统计，估计 8500 万到 9000 万美元之间（克林顿毕竟不是总统了，有个人隐私了，收入不能完全曝光的），八年了，克林顿的影响力在走下坡路，所以赚到后来有些吃力了，再说，他好像也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更糟糕的是，虽然一度传出希拉里不与他同房，但克林顿一旦被蛇咬，竟然不再传出绯闻，这无疑就失去了很多卖点，甚至让这位不再年轻、头发花白的花花公子总统失去了不少魅力。难怪乎，克林顿赚钱就越来越辛苦。不过，辛苦是辛苦，毕竟还在赚。值得欣慰的是，他的继任者小布什不争气，灰溜溜下台了，弄得克林顿更加牛（各位，据说小布什下台后赚钱很成问题，他的自传远远卖不到克林顿的那么多），据估计，再过两年，克林顿这辈子赚的钱就有可能超过一亿美金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克林顿赚钱赚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那不安分的老婆希拉里跳出来要竞选总统，决心要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坐到被自己老公弄脏过的办公桌前。就在她宣布竞选的同一天，最紧张的一定就是她自己的老公了。他很清楚，今后可能不能到处卖演讲了，他更清楚，当总统赚不了多少钱，当然他也清楚，当总统的老公，就更受限制了。要知道，当总统时传出绯闻，最多是一风流总统，而当总统的老公传出绯闻，嘿嘿，就可能是对“国家”不忠了——可怜的克林顿！

希拉里没有当选总统，克林顿应该松一口气，然而，这一口气还没有松完，他的心就又提起来了。希拉里接受奥巴马的国务卿职位，成为美国政府最高的外交事务掌门人。前总统克林顿一家，也是现任国务卿一家子立马又被置放于国家监督机构、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

由于希拉里出任国务卿，主管美国外交政策，克林顿下台后曾经到多个国家举行演讲，其中

大多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关。作为卸任的美国总统，他的演讲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民众是接受这一现象的。然而，作为一名国务卿的丈夫，你到国外发表有关外交方面的演讲，而且这演讲是收高额费用的，你就会被立即调查。目前克林顿夫妇已经认同美国政府职业道德办公室对克林顿演讲内容进行审查，因为希拉里已经上岗，所以按照美国法律还挺急切的。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搞清楚克林顿的账目和演讲内容——

倒霉的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他被人家逼到电视上，要他承认是不是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以及他是否在撒谎，现在不当总统了，只不过是国务卿的老公，结果，又不能到处演讲了，还要交代清楚以前都讲了些什么以及赚了多少外快！这不，倒霉的克林顿又被“双规”了！

比克林顿更倒霉的是生活在不受限制的权力之下的民众

在中美对抗最严厉的 1997 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一名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中国愤青的时候，我在华盛顿一度指着美国军人的鼻子怒吼，记得我当时引用了一位中国将军的话：别以为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核武器也可以打到洛杉矶……

当时那位美国军人只是暧昧地笑着说，杨，你们大概确实有几枚导弹能够到达美国西海岸，但谁会下令发射这些导弹呢？你不是不知道，你们中国很多有权发射和操作这些导弹的军人的子女正生活在洛杉矶和旧金山，而且还有很豪华的别墅！（就此打住这个令我一直不愉快的话题，后来大家也知道了，连当时军队中负责情报的最高首长的老婆孩子也在中美对抗最严厉的时候住在美国的豪华别墅里享受资本主义）

啰嗦这几句后想说什么呢？我想告诉大家，从我上面说的美国旋转门和院外集团的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很多方面（例如人性方面），中国和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我走过那么多地方后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对中国前途充满希望的重要原因——既然没有区别，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到？

如果美国人有机会，如果美国政府的高官能够钻制度的漏洞，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美国人的贪污腐败一点也不会比中国差。没有文化的差异，更没有人性的不同，那些都是胡扯。问问几千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问问生活在美国并且从政的华人华侨，他们为什么在中国人开办的公司和机构里（哪怕这些机构在美国）就想方设法贪污，而到了美国政府部门（很多华人已经当了高级官员和市长）就老老实实了？

只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权力被制衡的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把总统关进笼子里显然不够，还要把国务卿的老公也关进笼子里，把所有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人都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的手里的权力受到限制，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美国人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美国人只不过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却远远没有达到目标，我们只不过起步晚一点，离目标更远一点而已，但没有必要灰心丧气，我们的文化没有问题，我们的人性更没有问题，中国的崛起要靠制度的更新和完善，大家一起努力。

杨恒均 2009-2-2 广州

经过 2008 年，美国人对中国刮目相看

你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好像地球一样终日转过不停。这源于我小时的梦，我想把世界都走遍，触摸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亲近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现在如果你问我，这样折腾，你到底认清这个世界没有？我会说，差不多了。如果你再问，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哪块地，你觉得认识还不够深入，还想继续了解下去呢？我会不假思索地说：中国。

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怎么会不了解她呢？也许正因为生活了这么多年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我觉得，我对中国认识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发生在我远离中国的时候。而且，最近几年，每当我置身中国却感到看不清她的时候，我都会找机会悄悄到外面去转转，思考几天再回来。

到处走，就会见到很多人，按说见到这些外国人，最想了解的是他们国家的事，可我就不同，我最想从他们眼中看中国和认识中国。让我每每惊讶的是，好像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个不同的中国。

夜深人静时，我不禁问自己，那么多中国，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中国？我又怎么知道我眼中的中国是真实的？

我们心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

经过 2008 年紧张的一年，我自认为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因为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就更加有信心。可周围看看，我的好多朋友却更加泄气了。这真让人郁闷。我也没有理由责怪人家外国人眼中有太多不同的中国了，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的人，眼中看到的倒是同一个东西，可心中装着的还是不一样的中国。

于是，在 2008 年底，我飞赴美国一个月，中国的朋友和美国的朋友都兴奋地问道：啊，来观摩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我说不是的，他们又问，来看看美国？我说，不是的。怕他们继续问下去，我就干脆告诉他们：我是来看中国的。

在这次一个多月的旅行中，从东到西，我接触了华人精英，更多地接触了美国多位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虽然大家免不了要谈谈大热人物奥巴马，但我总会及时把话题转向这样的问题：啊，告诉我，你知道多少关于中国的事？你怎么看中国？你认为中国将来会……

虽然我心中早就揣着一个中国，但我还是想通过各种不同人的眼睛看清楚一点中国。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中国？

下面简单列几条这次见到的美国朋友给我最深的几点印象：

一，2008 年的中国发生了那么多事，特别是外国媒体歪曲中国的报道以及愤怒的留学生把五星红旗插到了旧金山、巴黎和悉尼等地，我这次出来特意留意了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让我既喜且忧的是：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事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了。外国媒体不会报道好的事，这是他们的新闻观，不会为我们改变，但他们好像也开始了自律了，或者说不愿意惹麻烦，所以也减少了对中国负面的报道，结果给我的感觉是整个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所减少（或者时间有所减少）。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但外国人很单纯，新闻不报道，他们也就不关心。不过，不关心也好，反正，国内的媒体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西方人整天都在关注我们，虎视眈眈，其实，稍微会几句外语的人就知道那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和对任何一个中等国家的报道差不多。这可和我们神州大地的媒体完全不同，有时在中国打开一份报纸，你好象立即就置身于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列强的包围之中，报纸还没有看完，冷汗就流出来了，甚至想立马抓起一杆钢枪，保家卫国。

二，美国的很多官员学者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了，趋向比较平和与不置可否，甚至连学术研究都有些收缩。我想，这应该不是天朝打压了他们，而是他们确实看不清中国了。好几个美国人看到我们留学生在他们的街头挥舞五星红旗就被真正雷到了。有一个妇女对我说，你们那里一定比我们国家自由和美好多了，可怜的美国人，我们还一直以为这些可怜的中国孩子是来投奔自由呢。她的言下之意，我们中国发展太快，他们落后了。这也是实情，这些年来，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如此牛气冲天，一边偷偷申请绿卡，一边可以同时在巴黎、悉尼和旧金山游行示威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中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里自然也是自由表达，既然是自由表达，也就是说反映了留学生的真实的想法。美国人说，这可是他们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的真实想法，正如他们从美国人游行示威看民意一样，他们从留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民意。美国人很尊重民意滴，所以，他们蔫了，牛不起来了！

三，这次还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其实很少有人要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制度，甚至没有一个人和我交谈中要把美国的普世价值推广到中国。这给我很大的冲击，因为在中国，那些左派们一口一个美国和西方价值观，美国和西方要找代言人，把我杨恒均也说成美国的代言人了。而一些右派，往往在文章中也是一口一个普世价值和美国的民主。有时弄得中国的互联网好像是美国的代言人和中国的捍卫者在对仗。结果，这次我才惊悚地发现，人家美国人（注意，我可是见到从政府官员、军人到记者、学者等很多人的）根本不知道你在玩啥，人家早就放弃了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你的做法，也绝对没有要让你照搬他们的制度的想法，这一切搞不好都是我们自己在意淫。至于说有时在人权上做文章，他们就这德性，对全世界都要搞，他们其实也不一定真想认真，只是碍于人家的价值观而已。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你们其实不必介意，只当我们放屁就可以了，至于你们该怎么折腾，还怎么折腾吧，只要不侵害美国人的人权，基本上没有什么事。还有一位更露骨，对我说，你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就是要复辟帝制，其实又关美国人什么事？另外一位国防专家给我说了实话：杨，其实你难道没有发现，我们在亚洲最头疼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如果有选择，我们更愿意和一两个说话算数的君王打交道（例如沙特就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当然，这位美国人说的话不一定算数，但我知道，从骨子里，美国人不是那么傻的，中国这种古老的民族一旦真正掌握了好的制度而变得强大，美国人绝对受不了。而像中国现在这样，傻瓜也知道，都玩了五千年了，你真以为能够强大崛起而不会再一次陷入我们折腾了几千年的恶性循环？

四，好了，这就是我这次到美国通过美国人眼睛看到的中国。可以明显感觉到，经过 2008 风霜雪雨的一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有了改变。

同志们，无论你是寄希望于美国，还是担心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现在好了，现在，该死心的死心，该放心的放心吧。只要你不把大批偷渡客和办签证时都保证一定会回来可一到美国就想着办绿卡的中国人都放过去，美国人不会介意我们如何生活的。介意我们如何生活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这次美国行给我很大的冲击，这世界上，什么事都能够发生的。我通过很多美国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中国，和我眼中和心中的中国都那么的不一样。

杨恒均 2009/2/11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我们“自己”干涉吧！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相当谦卑，相当友好，只谈经贸，不谈人权，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其实早在年前我到美国折腾了一圈后就知道这个结果了，也写了文章。很多读者忧心忡忡，写信问我怎么看美国人不再那么关心中国人权这回事。

我的回答很简单，美国人不关心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关心不就得了？美国人不干涉中国人权，我们自己干涉我们的“人权”嘛。再说，我们的人权为什么要美国人来干涉？

美国人为啥不干涉中国的人权了？

上次从美国回来，我已经就自己的观察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结论很明确：美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干涉中国内政，也不会动不动就关心中国人权了。我提到了一些理由，这里再简单的补充一些：

第一，美国干涉中国人权是出于利益还是价值观？这一直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人紧追不放也始终不能也不应该一锤定音的争论。每个国家都希望或者坚持说自己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秉持的价值观的，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但在实际操作中，要达到两者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且不说美国人在中东支持君主国家这件事，就说他们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也不是完全受价值观支配的。

例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的中国人权怎么说也不比现在好吧？我就记得（1982 年）因为在高中讲了我那地主爷爷解放前如何赌博和打土匪的祖传故事，而被随州市第一中学的团支部书记关在宿舍里不准上课达一个星期之久，理由是我宣传地主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可是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打得火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进出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在我们的边境安装好几个监听站，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过问过中国人的人权。甚至对中国在建国后三十年里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人的事，你也从来没有听到美国“干涉”过。

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中美两国实在太互相需要了，发展紧密的合作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特别是奥巴马，高谈阔论的演讲一篇接一篇，本身的当选又划了时代。不过，他比谁都清楚，

美国人四年后如果还没有从危机中走出来，那么他奥巴马就得走人，刚刚创造了历史的奥巴马自己就立马成为历史了。

第二，美国人也是清楚的，从长远来讲，只有不违背价值观的“利益”才是可以持久而不会带来恶果的。从这一点说，美国人只是改变了打交道的策略。实际上，美国人是务实的，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着如何同中国打交道的争论，例如美国学者经常说的“面子”问题，我想不到的是美国政界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他们认为，同中国人打交道，你一味强硬，高高在上，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很多时候适得其反。这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想干涉邻居家一件不好的事，我们可以板着面孔去教训他们，也可以满面带笑去说服他们。要是你碰上一个来干涉你家庭事的邻居，你如何反应？你肯定会对板着面孔的人关上大门，而不得不听完笑脸邻居的解释。

可是，正因为关注中国的人权符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政治正确的，所以，无论是总统奥巴马还是国务卿克林顿，他们今后还得在国会和选民的督促下，偶尔板着脸干涉一下中国的内政，但主要是做给美国人看，对中国改善人权的实际作用微乎其微。

第三，２００８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美国人和西方社会深深上了一课。一开始中国搞奥运会和火炬传递，美国、法国等西方社会以为我们接轨了，竟然误把奥运会当一国际盛事，于是就对我们指手画脚，妄图施加一点影响，哪料到我们的小愤青们一拥而上，把法国人搞得措手不及，把美国人惊出一身冷汗。

最近，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小官员还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米斯特杨（后来我纠正他应该叫我达克特杨——杨博士，嘿嘿），我相信你们对法国人的做法只是杀鸡儆猴而已，你们不敢对美国人大动干戈，但你们又想警告我们，于是，你们成功地用倒霉的法国的下场警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要折腾中国，中国很愤怒。

不管这哥们是在猜测还是在试探我的意思，经过奥运会与境外火炬传递一役，我们中国人虽然国际形象下降了，但却在精神上大获全胜，也让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终于承认：那奥运会既然轮到北京办，就是咱中国特色的奥运会，也就是中国的奥运会。

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就是奥运会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的“民意”。既然中国老百姓民意已经觉醒了，既然在美国和法国的这种自由之地的中国留学生都自动支持中国政府，反对西方的霸权，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前一直自诩为为了中国人民而干涉中国内政的信念一下子无影无踪了。

果然，我们看到，经过奥运会和境外火炬传递，美国和西方主流几乎都改弦易辙、不折腾了。无论后来的地震和毒奶粉事件，美国人和整个西方都保持了相当绅士风度的低调，是啊，美国人的孩子既不到四川读书，也不喝中国制造的毒奶粉，为什么要对中国的事指手画脚呢？更何况，虽然你们的牛奶质量低劣，你们学校宿舍不怎么牢固，但你们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玩艺可是真金白银啊。

美国不干涉我们的人权，咋办？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好多朋友好像很失望的样子，首先当然是一些右派和思想比较开放

的读者。我想，这可能和一些左派愤青们长期在网络上使用的攻击语言有关，例如右派们一提到普世价值、人权等，左派们就跳起来，在愤青们的呐喊助威下，攻击右派们是汉奸、卖国贼，是美国特务，或者至少也拿了 CIA（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好处费。这样攻击久了，连支持右派的一些读者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影响，以为美国不关心中国人权了，右派们就失去了一些依靠。

特别是在奥运会火炬传递时，网络上对于我们这些出来提出批评意见的作者的攻击一律以攻击美国和西方为背景，弄得一时之间连我自己也糊涂了，莫非我真成了美国的代言人？不过又一想，不对啊，这些左派坐在美国人发明的汽车里，噼哩啪啦打着美国人发明的电脑，用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咋就没有想到他们早就是美国人的走狗呢？

不过，这招对聪明的中国人不灵，但对脑子不怎么会转弯的美国人就很灵。别说还真有效果，从此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退缩了，对中国问题退避三舍。

可是，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意却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上一层楼。网络上对于层出不穷的侵害人权的批评日益热烈，如火如荼，所不同的是，这次的网络民意没有了西方的影子，多了草根的声音，以及不久前才对美国和法国愤怒不已的年轻人。

现在该轮到左派们垂头丧气了。当我们的批评再次受到所谓左派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他们语气里失去了一些底气，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不再是西方人的指手画脚，而是清一色的中国人，美国人不关心地震，不知道周老虎是什么，也不关心毒奶粉，对官员花费纳税人的钱到美国花天酒地基本上持欢迎态度，甚至不拒绝贪官污吏把人民的血汗钱全部转移到美国存进美利坚合众国的银行，或者购买旧金山的豪华别墅。

到这次希拉里访华，闭口不提人权，如果说让右派们失望，还不如说让左派们失落，你去查看一下他们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今后再也无法写出攻击普世价值是美国人和平演变中国、以及美国的代理人向中国推销的玩艺了。现在对他们谈普世价值和人权的是连美国在哪里都搞不清的农民工和受害孩子的母亲，当然还有那些逐渐被互联网启蒙的年轻网友们，包括几个月前被他们忽悠的愤青。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２００８年的网络民意其实有一个大大的转向，在愤怒的青年们搞定了国际社会之后，他们在短暂的失去了目标后迅速找到了方向，让事故的负责官员们乖乖下台，把制造假奶粉的人绳之以法，人肉搜索贪腐官员，监督各级政府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利益攸关的事儿显然比到家乐福抵制自己本来也买不起的法国货，以及连飞美国的机票都买不起却整天幻想要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更加吸引了他们。

于是，我们看到，当西方人不再干涉我们内政的２００８年下半年，我们中国人开始热衷干涉自己的“内政”，当西方人闭口不谈中国人权的时候，我们网民的嘴边却再也少不了人的权利。

这就是网络的好处，当很多愤青们高声叫骂我的时候，很多朋友为我抱不平，但大家也看到，我从来没有回骂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当言论放开的时候，言论自由并不只是你和我的言论自由，所有的人都有言论自由，右派有，左派也一样应该有，不左不右的人同样也有。正因为如此，当言论自由在不太成熟的民族中生成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还相

当严重，然而，当言论自由不断普及开来而且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只要是人类，在信息公开和意志自由的时候最终总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你必须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中国人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但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优秀的一部分。

我们的人权，只有靠我们自己来“干涉”!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整个 2008 年，中国官方除了外交部对 CNN 提出一些质疑和警告之外，对于网络上所有批评政府的一些做法、揭露腐败现象、关心人权等等的自由的言论，一次都没有提出过像对 CNN 那样的严厉批评。

上海的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灾民不要被海外反华势力利用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在为政府说话，我觉得大家真是冤枉我们政府了，我们政府至少比余先生有良心一些，知道做错了，不会往人家美国人身上赖。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迄今为止，政府高层发言人在任何公开的报告中说我们这些批评政府的网民是被反华势力利用的吗？当然我们的一些言论经常被删除，但也要看到还有一部分言论经常被“利用”也是事实，只不过是被中国政府“利用”来改善工、增进人权，例如在地震救灾中，在对毒牛奶的处理方法上，以及对一些腐败官员的人肉搜索、曝光公费出国旅游、网友对一些政策的建议、建言等等上，政府在很多时候几乎达到了我杨恒均的格言“从善如流”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承认落后，那么我们会越来越落后，但如果不认识到进步，那么我们就很难再进一步。中国政府在网络上的一些做法值得肯定，中国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之进步（特别是相比于传统媒体和现实社会），也是不容否定的，这当然和网络的特性有关（例如高科技的难以管理），然而，不能排除政府对网络管理的新思路。

美国人在干涉中国人权的时候，很多时候说不到点子上，而且人权本应该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经济、社会和政治），而美国往往只注重在政治权力方面。说实话，在美国的经历，特别是和美国一些特别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人士的接触，有时让我感觉到他们只盯着最终的目标，却往往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位置。他们站在终点线上，灰心丧气地抱怨我们还离他们那么遥远，却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起点线很远了，正在艰难地踽踽独行。

2008 年虽然是灾难年，也是近些年中国人失去了最多鲜活生命的一年，然而，却也是中国人更直接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人权的意义的一年。其中不能不提宝宝在地震灾区的那句“是人民在养活你们”的大白话，以及胡哥的“以人为本”。

这两句话对于中国人，也许比奥巴马一边大谈“你们松开拳头我们就握住你们的手”，以及一边奉劝人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边急忙把自己的国务卿送到历史的另外一边来握手拥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切实可行得多。

无论是政府如何逐渐开放，无论互联网如何给我们提供了平台和机遇，如果我们的民众自己不关心自己的“人权”，就算美国人把他的全部舰队开过来，就算宝宝总理喊破了嗓子，也还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学会去“干涉”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内政，以及关注我们自己的人权。

杨恒均 2009-2-27

美国国防部一年用掉多少卫生纸

前几天在香港机场逛书店，看到整整一大片书架上，足足有四十多本新书，几乎全部都是揭秘中国政府、政务内幕、领导人情况的，顺手翻了几本，发现这些揭露的“内幕”如果放在西方国家的话，你都可以到政府档案馆去查阅，在中国却成了“秘密”，养活了一大批书商。这几天，我又到了海外，结果碰上的“专家学者”满嘴都是有关中国高层会议与人事安排的“内幕”，大多是推测与瞎胡扯，不觉感叹道：一个不透明的中国政府，造就了多少变态的“专家学者”啊……于是，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到的“知情权”。

在胡主席提到的“四权”里，“知情权”是放在另外三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之前的，那么，什么是“知情权”，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呢？

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引进过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与美国。但大家不要误会了，“知情权”这么重要的民主原则与公民权利，并没有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宪法赋予民众的。至少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宪法中都没有这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就拿美国来说，“知情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法律正式认可的，当然，在这之前，民众以及新闻工作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揭露与揭秘政府行为与档案，民主的理念中也始终有“知的权利”这个说法。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认为他们选出的政府做事当然应该公开、透明，可是，在现实中，在没有法律保护公民“知情权”的情况下，要做到真正知情，实在是有一定困难的。

美国以法的形式彰显公民的“知情权”是从“联邦资讯公开法”开始的，这部法 1966 年获得通过，1967 年开始执行。签署这部法律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尼迪遇刺后的继承人）赞誉这部法律“让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能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

有了这部法律和没有这部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你去政府查档案，询问会议结果与决议之类的，他们会告诉你：无可奉告。你如果再问，他们甚至会把你赶出去，怀疑你问这些东西的动机，甚至威胁要告你妨碍公务。有了这部法律，你就可以去要求政府公开相关资讯，他们如果问你，你要这些资料干啥？你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无可奉告。——即便你“无可奉告”，他们还得乖乖地向你奉上你索要的资讯，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可见，要想落实公民的“知情权”，首要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的行为。可是，有了法律就万事大吉吗？当然不会，美国公民（尤其是媒体人）的“知情权”并没有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就得到了保障，知的权利甚至没有因此而扩大，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有决策我有对策”，大家知道，再公开的政府，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例如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人事细则、法律调查等等，就不能完全公开，而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正是利用这条法律后面附加的“九条例外”大做文章，弄得那些想去查阅政府档案的记者焦头烂额。

不过，美国媒体记者与活跃的公民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从来不吃“嗟来之食”，更不会对政府公布了保障他们的知情权的法律感恩戴德，他们知道，如果你不去实行，不去推行，不去探寻法律的边界，把自己的权利扩张到最大限度，那法律随时会成为政府用来对付你的双刃剑。于是，我们看到过去四十多年里，美国人常常拿这个法律作平台，想要跳得更高和更远。你说国防部的一切都是保密的，那好，就有记者出来挑战你，要求你公布国防部每年用于给士兵购买擦屁股的卫生纸，一共花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是否有收回扣现象？这你总能公布吧？

没想到，国防部连这个也找到了保密的理由：你要是知道了一个人每天用多少卫生纸，又知道了我们一年给各个驻地的士兵供应多少卫生纸，两个数字相除，不就知道了我们某个基地的驻军人数？那可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绝密啊……

这种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一旦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当然就遭到了的美国民众的一致嘲笑，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大多是记者）不停地站出来挑战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底线，终于，连国务院与国防部也招架不住了，只好也开始政务公开，趋向透明，结果，公众终于在媒体上看到了国防部某个水龙头的采购价高达 1000 美金，一个马桶盖的采购价是 400 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与民众对“知情权”的推动给我的启示是，政府不能只靠“仁政”来取信老百姓，必须得靠法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民众呢，有了法律还不够，还要去使用法律，用法律来对付政府，来保护自己。

胡锦涛主席之所以把“知情权”放到其他三权至上，并不是它最重要，而是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公民缺少了“知情权”，就根本无法谈什么“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你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参与？你什么都搞不清，又如何去自由表达？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又如何去监督？

中国的政府的政务公开这些年有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立法，完善规章制度，公民也应该主动督促、推进、甚至挑战政府，要求他进一步公开政务，打破各种黑箱操作，以此扩大公民的“知情权”。

杨恒均 2010-10-6

苏联东欧转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民主需要多高的素质？

二十年前发生在苏联东欧的那场变化到底有多剧烈，为什么被称为“剧变”？这是我每一次

行走在那块土地上都会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也许是时间的渐逝，也许是记忆的淡忘，让我不解的是，每一次搜寻到的答案都毫无二致地告诉我，二十年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其实是非常平和与有序的。就其政权的交接，除了罗马利亚之外，其波动和成本并不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场总统大选要高。就连罗马利亚，充其量可以说是一场宫廷政变，齐奥塞斯库自己的军队把他抓起来，打靶了，政权易手了。对比一下美国总统从党内候选人的提名到最后尘埃落定的花钱如流水的漫长过程，苏联东欧的“剧变”只从政权性质的变化上，才勉强称为“剧变”。

让我们看看没有团结工会也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党的前苏联，这也是拖了好几年，最后一个完成“政权交接”的铁幕国家。可整个过程并不是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一个执政 73 年的一党独裁政权在枪炮声中，在激烈的抗议中被推翻，你死我活，甚至血流成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博弈，是妥协，是辩论、是选举。而且，几乎大多是共产党内部的各派势力在折腾。

折腾到最后，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叶利钦用选票打败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的新总统。无论从卷入的人数，还是当时有群众参入的场面来看，所有场次加起来，都并不必美国总统选举造势更加夸张和花费巨大。这一现象，对于当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当然，对于那些前苏联政权的支持者和依恋者来说，除了不解，更多的还是极度的恐惧和失望。

这也许是他们的失望，但却绝对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希望。历史有其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三大不可阻挡的趋势之下，你可以走弯路，但不可能长期在邪路上死不回头。

这样说来，是不是苏联东欧剧变后，各国的转型都顺理成章，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呢？当然不是，上面我说的都是指政权更迭，结束以党专制，也就是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建立。事实上，苏联东欧的转型中，问题持续最长，世界各国关心最多，也是我们每一次都拿出来说事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归纳为一句话，也是我每一次到俄国东欧，朋友都想我回答的一个问题：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吧？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经济生活而不是民主政治？因为过去二十年我们也看到了，民主政治在俄罗斯和东欧已经逐渐扎根，而民主政治这种东西是很少有回头路可走的，相比较美国走了两三百年，谁能说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政治在过去二十年不是在进步？所以，对俄国和东欧的民主政治抱悲观态度的人，大可把眼光放远一点，无论是回头看，还是朝前看。无法放开目光的那批人，也是二十年前绝对不相信苏联东欧自我演变的那批人。

二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夜之间人家搞选举了，民主了，天啊，让人讶异的是，长期被愚弄的民众不但会搞选举，而且还挺适应的，连共产党中最左的、最保守的那批人，都证明为民主政治的熟练操盘手，而且表现还相当优异。

例如苏联分裂后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 11 个总统都是前苏共高官，克格勃和情报机关的人屡次出任民主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这说明，民主大概需要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能够玩，而且连脑子被毒化过的人也可以玩，看起来是不需要什么高智商和高素质了。这也同样说明，二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场双赢的博弈。用新体制代替

旧体制，输的只是陈旧过时的体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赢家。

只要政治好，一切都好了吗？

不用担心俄国东欧的政治，那么就没有值得担心的？就一切都好了？不是这样。恰恰是我们认为不用担心的经济却出了问题。我们怎么说来着？只要政治好了，一切都好了——这“一切”自然也包括经济。可苏联东欧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好了——一夜之间民主了，经济却没有马上好起来，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遭遇了困难。虽然不能说转型后俄国等遭遇的经济问题一定是政治转型带来的，但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那么这些经济困难从何而来？我是这样看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应该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上的。大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实行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者革命），可它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却原封未动。

计划经济为社么给政治变革后的苏联东欧经济带来了困境？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困境。苏联东欧变革后我们大陆常常看到的一个场景是：在严寒的莫斯科的冬天，市民们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轮到自己的时候，面包架子上已经空空荡荡，而要开小车离开时，发现车子里没有汽油了……

我曾经被这个画面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度这样自言自语：是啊，俄国人倒是有民主和自由了，可却没有了面包，难道面包和民主有仇？

多年前和一位在美国的俄国专家聊起此事，他只是用一句很幽默的话回答了我，没有面包？那是因为没有了政治局的原因啊……

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想一下我们三十年前的那种计划经济，虽说某个面包场具体生产哪一种面包不用俄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可相差并不远。在所谓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严格说，从部长以及以下的各级党政官员，都是靠执行上面的命令（计划）过日子的，没有了政治局的指示，可是寸步难行。面包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你一个月该吃多少个面包，真还和最高政治局的会议与计划分不开。

可苏联东欧一夜之间没有了政治局，搞了一个用来指导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也难怪，面包厂不知道如何生产了，老百姓不知道哪里去买面包了……现在回头来看一下，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的经济，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人家不是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吗？如果用市场而不是计划来调节，难道俄制小车不能在国际上换回一些面包？再说，当时的苏联拥有的那么多核子武器，随便拿一个出来“市场化”，不是可以给半个莫斯科人一人一瓶伏特加烈酒？

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后，当时特别是苏联面临着如何改革经济体制，也就是如何私有化，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叶利钦选择了大起大落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事后有人说他太猛，应该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或者象中国一样。这样说的人忽视了俄罗斯面临的困境，那就是人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改了，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允许慢慢市场化和私有化。

从绝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以及从人类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好了，经济等自然不会太差。然而，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者从短期来看，政治不好，经济未必就不能好，而且，政治好了，经济也不一定马上就能好起来。苏联东欧的情况从正反两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被堵死了？

苏联东欧变革后又经历了二十年，很多人悲观了，认为，其他国家例如中国错过了一个机会，不可能再那么平稳变革了。这话有很大的道理，二十年前苏联东欧的变革虽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性，还有很多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例如共产党内部促变革的愿望和热情。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剧变之所以如此顺利与平和是因为那是一场来自内部上层的革命。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全面，但很多事实是支持这一观点的。正如前面论述过的，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欧诸国，在那场变革中，共产党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国家的变革就是共产党内部分出的派别在唱独角戏，包括前苏联，也是共产党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地方党委书记叶利钦在玩，其他很多民主力量反而成了配角。

探讨一下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起来改变自己的政权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只强调一点，我认为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苏联东欧共产党当时促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经济生活也不怎么样，虽然有特供制度，但他们的特权，不但没有达到花钱如流水，住房宽敞等，而且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贫富差距都是相当小的。这让很多共产党员认为，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很可能让他们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同时摆脱政治上的被压迫感。

看看事实，也相差不远。苏联东欧变革前，那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富人”，例如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所住房子和待遇几乎都是党和国家的，下台后就没有了，更不用说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变革后的苏联东欧，很快出现了很富有的一批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正是以前的共产党人包括领导干部。当然也有很多普通民众，这些人如果退回到以前，没有机会去发财致富，唯一可以出人头地的是去申请入党或者进入克格勃这种可以胡作非为的党政机构。

其实即便不拿苏联东欧的情况说事，只要稍微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看看中国的情况也能明白一二，当时国家穷得叮当响，即便是享受很多特权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富裕”和特权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

所不同的是，同样是不满意的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人决定改变政治体制从而改善自己和所有人的待遇，而中国的则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

这也给我们今天造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改善民众的生活（这里抛开政治权利这些天生人权不表），那么通过经济改革达到了这一目标后的中国，是不是就不用政治体制改革了？

再说，那些经济上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各种利益集团，不但没有了改革政治体制的愿望，而且还会和二十年前的那些共产党人相反，誓死捍卫这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的体制。所以有人说了，无论从人性还是利益两方面考虑，今天的中国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都不一样了。政治体制改革变得举步维艰。这是悲观者从人性和利益两方面推测出的暗淡前景。

可是，人性是靠不住的，好的人性靠不住，坏的人性同样靠不住。而利益，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悲观是要不得的。这是我的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带来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

行文至此，大家也看出来我想说什么了，不错，从主观上说，我们确实感觉不到转型的多大希望，可从客观上讲，各种条件不但成熟，而且，我们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悲观的人总是悲观，乐观的人总是乐观。可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说到改革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了一部分人（利益集团）的个人意志，于是悲观之下，也就把我们自己的个人意志忘记了，实在有些本末倒置的可笑和可悲。再说，虽然一些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的改革意愿下降，但改革的客观条件却更加成熟，两者是可以互补的。

我们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变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我们恰巧在过去二十年里，在经济改革上走得很远，市场经济很发达，私有制也蔚然成风，这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相比，进步何其巨大？

二十年前苏联东欧要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上建立民主政治，当时的苏联东欧不但没有一点私有制，甚至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旦我们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苏联东欧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将不会发生在中国。

从东欧回来后，有一次我在广州街头散步时突然想，现在的广州领导是谁？他在干什么？随即我就设想，如果政府高层换人了，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广州的经济会如何？经济出现困境？

我很难想象，面包店的人会停止做面包，等着市委书记的命令，社会各行各业会停止不动，等着人家来指令他们明天如何赚钱。我想，上班的人早上起来会照样去上班，除了一两个意识形态部门失业了几个职业骗子之外，其他各个部门照常运转，警察维持治安，特务们继续到国外搞情报，更不用说那些小摊小贩会停止做面包了，他们会更加起劲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大赚特赚的……

我坚信，有了市场经济（虽然不成熟）和（部分）私有制的中国，即便经历苏联东欧二十年前的剧变，至少不会出现后来俄罗斯和东欧遇到的那种经济困难。

我常常对俄国和印度的朋友讲一句话，你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政治体制），但却存在很多小问题（经济发展，包括效率问题），所以一直在修修补补；而我们在一个大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却“很顺利”的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

结果会如何呢？谁都清楚，解决了大问题的国家，即便民众再一次饿着肚子走上街头排队买面包，也基本上会心平气和，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动乱；而那些没有解决大问题的国家，吃饱了面包的民众总有一天会走上街头的，到那时就不是排队要面包那么简单了。

杨恒均 2009-7-29 （阅读本人时评不是时评、学术不是学术的博文，别太认真哈。我试着把时评写得像学术一点，把学术弄得庸俗一些，你就将就着看，好不？我的新口号是“时评学术化，学术时评化”o(∩_∩)o…哈哈 o(∩_∩)o…哈哈）

俄罗斯的五百发炮弹

那艘中国商船被 500 发炮弹击沉，我很悲愤！俄国炮舰连发 500 多炮，击沉一艘据说违法了的商船，这艘商船虽然挂一小国国旗，但船长和船员都是以中国人为主(在国际上，一般认为这种就是中国船，只是为了方便而挂其他国家国旗)。我现在先假设这艘中国商船严重违犯了俄罗斯法律，我甚至也自我假设这艘船上走私的是比毒大米更严重的军火，还假设这艘商船不听指挥一个劲地想逃跑，在这样假设之后，大家也都许得出这样结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论是从俄罗斯法律还是国际法，它都有权开炮阻止走私船逃脱。那艘中国的商船侵犯了俄罗斯主权。

下面我给没有军事经验的朋友描绘一个场景：中国那只商船除非是经过严格改装的军事船只，否则，无论从他的吨位和船体设计上看，它都不可能逃过目前任何一艘俄罗斯军用和警用舰艇，更不用说能连续发 500 多发炮弹的军舰。这就是说，俄罗斯完全可以出动当时在场的船只拦截这艘商船，截停它后带回去扣留、检查、起诉，但它选择了开炮…… 允许我再描绘一个场景：一艘军舰连续开了 500 发炮弹射击一艘商船，就算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军事实力最低的国家，大家也知道，用军舰打商船，几乎是高射炮打蚊子，那是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只是我们这里说的老鼠是我们的中国同胞而已！

让我们设身处地：中国同胞在听到第一发炮弹的时候一定后悔了，但随后又有一百发炮弹、两百发炮弹、三百发炮弹……这个时候他们一定像受惊的老鼠一样四处躲猫猫，而在三百发炮弹的袭击下，那艘船要就是受到了重创，要就是没有人驾驶了，也就是说那艘船停了下来。船上的那些中国老鼠一定很后悔，等着俄国人来抓他们，但俄国人没有来，来的继续是他们的炮弹，把那艘中国的商船当成靶子，一炮一炮的慢慢玩，那些开炮者可能还想象着船上的老鼠如何惊慌失措，从而很开心。他们一直发了五百多发炮弹，直到一艘大船被打得底朝天…… 我很悲伤！很久没有写我老本行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了，今天却想写几句，可是我也知道外交无小事，而且我又不想惹起民族主义情绪，更不想干涉俄罗斯主权，所以，我想换个角度写，我想谈谈在国际关系中，除了起主要支配作用的利益之外，普世价值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谈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强调主权之外，国际社会更加强调的是人权。在这里，主权是俄罗斯的，而人权是我们那几个象老鼠一样被他们灭掉了中国同胞！普世价值在残忍的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步确立支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想，没有必要花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人会否认答案只有一个：利益，或者你加上两个字：国家利益。我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多少年，死记硬背了无数个国际关系理论和案例，到后来得出的结论也是这同一个答案。可是，除了这个主要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国家主权、国际法什么的，但仍然没有脱离国家利益的范围。有没有其他的超越了一国主权和利益的东西？或者说，如果只是利益在支配着国与国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

上个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重温一下现

代国际关系历史，你会惊讶的发现，这就是一部各国在利益博弈中讨价还价，在国际舞台上为本国利益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历史。或者你看一下这种历史的浓缩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历史。看一下英国人多么聪明地绥靖了德国，看一下美国人多么潇洒地置身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外，看一下俄国人多么明智地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保护了自己的主权完整等等，你会想，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真他妈的聪明，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都能够为自己的国家找到最大利益和最和平的环境。二战还是打响了，而且随着科技进步、武器的发展以及国家私欲的膨胀，这次战争的残忍程度竟然超过了历史上所有战争的总和。 这场战争带给了人类什么样的思考？瓜分战败者？胜利者更加疯狂地扩充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思考，当时的国家都在思考：人类为什么会如此残忍？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摧毁整个地球？我们这些国家难道除了各自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共同的东西？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主权，但是否有超越主权的共同的人权存在？有没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能防止私欲无限膨胀，防止我们对自己国民和其他的国民作出残暴的事？

联合国成立后，《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应运而生。这是人类第一次共同探索普遍适用于各国的价值观。这个不是关于战争和国家利益的，甚至并不是大谈特谈主权，而是关于人权的。为什么？

当时全世界几乎都认识到：如果法西斯德国在它国境内残忍杀害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它侵犯波兰后也一样会残忍地杀害波兰的犹太人和波兰人，而如果它能够残忍地杀害波兰人，那么，只要它有能力，他一定会屠杀俄国人、法国人，以及轰炸英国平民！

还有美国，当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烧杀奸掠的时候，它以为自己可以在太平洋那边独善其身，等到珍珠港事件后，它已经死伤了成百上千的官兵。

世界都看到了，如其说这些侵略国是在以武力追求国家利益，侵犯他国主权，不如说他们在用武力侵犯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逐渐为各个国家所接受的普世价值观产生并迅速蔓延，这得归功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但更应该归功于战争的残忍。 美国与伊拉克：利益和普世价值观 我想拿一个非常敏感也很难分析的例子来说明利益和普世价值观这两大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侵略伊拉克，我们即便认为当时布什的情报确实出了差错，他们确实认为萨达姆有大规模性杀伤武器而侵占了伊拉克，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美国说得非常高尚，就不是出于国家利益呢？

当然不是，因为朝鲜不但不隐瞒大规模性杀伤武器，而且整天威胁美国，可美国为什么不打它？因为除了中国的因素，朝鲜的战略位置对美国没有什么重要，而且，以朝鲜的科技能力，即使有了核子弹头，真要发展洲际导弹以携带弹头达到美国本土，至少也得 20 年，不但美国，可能全世界都相信这个国家垮台的速度比它制造洲际导弹的速度要快。再说，朝鲜有石油吗？伊拉克所处的中东可是美国这个巨大引擎耐以运转的，如果真拿下了伊拉克，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善莫大焉。

这些分析是忽视了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反恐的要求，可即便考虑进去，反恐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这就是国家利益。然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以美国的军力，它迅速攻占伊拉克，战争结束

了，美国胜利了。但后来又如何？大家看这几年来，美国在伊拉克泥足深陷，特别是伊拉克那些伪装成平民的恐怖分子，隔三岔五的袭击美国军人，结果造成了奇特的现象：美国所有伤亡几乎都是在他们打赢了那场战争后，裹着年轻尸体的袋子每个月都源源不断地运回美国，最终不但让美国人的神经崩溃，也让布什总统灰溜溜地下台。

那么，美国真的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或者说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攻占一个国家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难道连几个恐怖分子都对付不了？为什么？大家想了没有？如果你没有想通，那么你最好回忆一下当年和我们人口相差那么悬殊的日本军人怎么会用几十万人就把大半个中国征服得服服贴贴？屠杀，三光政策，强奸妇女再把她们用刺刀刺死，还有几乎每一个中国老人都记得的故事：我们的游击队员以偷袭的方式杀死一个日本人，结果日本人不分老幼，把你整个村子的人都灭掉！

美国将军因言论自由而到白宫做检讨

美国驻阿富汗总司令麦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大概以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讽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副总统拜登，并就自己的艰难处境对白宫政策提出批评。杂志出街后，舆论哗然，震怒的奥巴马总统目前正等他回白宫“做检讨”，可能会炒他的鱿鱼。麦克里斯托也在第一时间道了歉，并有可能主动辞职。

麦克里斯托是奥巴马亲自指定的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特种兵出身，在伊拉克就立过大功，指挥作战能力一流，好评如潮。然而，因为这次不恰当的自由言论，可能丢掉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的职务。

美国各大媒体岂肯放过这个话题？于是，各大电视频道开始找政要、议员、专家学者上电视发表评论，组织各种辩论，纸媒与互联网上的相关文章更是铺天盖地……

我最喜欢西方国家出这种“乱子”，看他们互相攻击，互相揭短，一片混乱，可最后总能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总有一种看不见的手把每一次危机都当成转机，把本来要让他们沉沦的危机，弄成了一次又一次把国家和民族向上提升的机会……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言论自由”。

从“水门事件”到“伊朗门事件”再到“拉链门事件”，从黑人抗暴、华人游行再到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坐在电视机前，从自由言说的媒体中揣摩西方，学习美国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跟踪每一个带来危机与混乱的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最终结果，我收获的远远超过我所有的学校教育能够带给我的。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很浅显，学不到真正的东西。其实不然，现在的媒体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载体，一个表达与传播的平台，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各种声音都能够借助媒体第一时间发出来。

就拿《滚石》事件来说，我一早起床就从电视上看到了好几位华盛顿熟悉的专家学者与将军

们在侃侃而谈，发表意见。有的批评麦克里斯托违反了军人的职业道德，有的谈到了美国的宪法与传统制度，还有的讲到民选总统对军人的绝对领导权；当然，也有的在为麦克里斯托司令官辩护，认为目前没有比他更适合担任阿富汗总司令一职的候选人，从国家利益出发，希望总统把他训一顿后，别撤他的职……

当然，更有趣的是，媒体说来说去，就开始讨论起奥巴马的阿富汗政策，美军在那里的策略……自然就有人开始攻击奥巴马在阿富汗政策上前后不一，竞选的时候承诺要撤军，上台后却立即增派了三万多美军……真不知道这种讨论还会牵扯出什么，好在对于我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免费的学习机会。

在大陆以外的地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如果你问我从哪里学到了最多的知识与理念，我的回答是从各类自由的媒体上。不管你是中国的专家学者、普通民众，或者是政府官员，研究一下当今西方人在媒体上争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争论那些问题，往往对解决中国当今的问题大有裨益。

每个国家都有突发事件。发生这类事件后，媒体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封锁消息，粉刷太平，维护执政者形象；另外一种是利用开放的媒体，把现实中的突发事件弄到媒体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民众通过媒体了解真相，听取各种意见，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言论自由”不但不会制造混乱，反而可以“转移矛盾”，甚至可以用集思广益的办法化解矛盾。“言论自由”的本质是对民众智慧与理性的信任。谁能想到，在美国推动官民之间、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幕后推手，竟然是让一些人提心吊胆的“言论自由”？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在这类事件中，各方都多多少少受到了批评，甚至包括那些出来评论的嘉宾们，也忍不住互相指责起来，可唯一没有人批评的反而是“罪魁祸首”——那本刊登了将军讽刺批评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的《滚石》杂志，还有那些“加油添醋”、“唯恐天下不乱”的全美国的电视、报纸和互联网媒体……

如果你此时正好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你一定会想，天啊，闹出这么大的事，“有关部门”为啥还不下令媒体收声？不让总编辑做检讨？还不关闭、整顿那本惹了乱子的《滚石》杂志？再这样“炒作”下去，岂不是要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理论，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抱了言论自由，国民用“言论自由”对付“党和国家的形象”，为了维护政府形象而去损害“言论自由”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少。可是，为什么一个将军批评总统就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什么才是言论自由呢？

只要大家还拥有“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定义就会一直自由言说下去。而我们也只能在争取言论自由中去认识、拥有言论自由，在言论自由中去体会、提升言论自由……

在这个尚未完全展开的事件中，我们对言论自由有了新的认识：现役将军没有讽刺和批评总统的言论自由，媒体却有刊登与“炒作”此事件的言论自由，而每个普通的民众则都有借题发挥地去批评和指责美国政府与其政策的言论自由……

这就是言论自由。

杨恒均 2010/6/23

美国当年猖獗的黑社会是如何式微的

这些年，“黑社会”三字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语之一。说到“黑社会”，大家脑袋里蹦出的一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孤儿寡母凄惨无比的景象，难怪要谈“黑”色变了。更有意思的是，被地方政府欺负了，马上就有人说“当地政府已经黑社会化了”，就连那位在湖北省委大门前被几位便衣暴打的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夫人，事后接受采访时也很傻、很天真地说：“我还以为他们是黑社会呢”。如果湖北真有“黑社会”的话，一定会很不服气，甚至会指责这位领导夫人在给“黑社会”抹黑：中国的“黑社会”什么时候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省委省政府门口暴打 58 岁的妇道人家？

诸如此类的毫无节制地使用“黑社会”三个字，弄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还真以为大家都被“黑社会”包围着呢。其实，从西方人对“黑社会”的定义，以及世界各国的存在过的“黑社会”现象来判断，中国目前社会上的“黑”，不应该简单颠倒成“黑社会”。这种简单的颠倒不但是推卸责任，也会混淆我们当今的社会重大弊端的症结所在。

中国“黑社会”现象兴起于民国时代，终结于 1949 年的“新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可与此同时，久违的“黑社会”现象也沉渣泛滥。那么，如何看待“黑社会”现象？用什么方法对付“黑社会”？我想，我们需要更理性地回顾黑社会的历史，客观看待、分析它在历史上的“功过”，以及检视世界各国都是靠什么来对付“黑社会”，消灭黑社会的……

这样的题目本来应该是共和国里拿政府钱财与民众税钱的“专家学者”们来做的，我自不量力，只是以此博文抛砖引玉，或者投石问路……O(∩_∩)O 哈哈~

海外华人“黑社会”的兴衰给我们的启示

我竟然说“黑社会”在历史上的“功过”？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黑社会”有过，难道还有“功”？我不妨换句话表达这个“功”：“黑社会”现象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的世界各国都没有避免的必然产物，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那么一点点“进步”的作用……在你开口大骂我脑袋进水前，请耐心看下去。

我先讲一种让我深恶痛绝的“黑社会”，那就是目前仍然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大家知道，西方国有不能歧视少数族群的政策，所以，政府不能有意泄露不同族群的犯罪比例，可我们大伙心里都清楚，美国个体黑人的犯罪率高得离谱，而贩毒、走私、卖淫甚至杀人的有组织犯罪，由华人黑社会干的比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族群。作为一名“华人”，我为此感到羞愧。

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由海外华人组织的“黑社会”在历史上不但曾经保护了成千上万的华人华侨，而且还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大家回顾一下，当成千上万的中

国人被卖猪仔到美国，扶老携幼逃亡到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些国家当时都对华人实行极严厉的歧视政策。更糟糕的是，华人被歧视被侮辱甚至被杀害的时候，却往往无处伸冤。在当时，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完善的保护人权的政治体制，主流社会也是歧视、打压华人等少民族，华人甚至没有聚会和言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华人要自保自助，除了形成自己的“小社会”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绝大多数华人的“黑社会”、“地下”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有相当多的“黑社会”，在当初只不过是一群背井离乡的中国人聚在一起，帮助来自唐山的同胞，共同对外（大多是当地的主流族群，包括白人），世界上的唐人街有一大半就是这样形成的……

大家知道，如果当初西方政府真要下决心剿灭华人的“黑社会”组织，并不是没有能力的，几个“严打”就搞定了，当时的西方国家也并不完全是“公民社会”，至少对少数民族如此，但它也不是一个超级无比的“黑社会”，所以，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后来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华人“黑社会”组织逐渐瓦解，尤其是那些有互助性质，用于自保的“黑社会”组织，几乎没有了，因为，民权运动取得了成功，法庭成了说理的地方，公民享有了人人平等的权力。公民社会形成了，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可以游行示威办报纸了，华人能够参政议政了，华人能够投票选总统了，华人不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可以当部长州长的，请问，你还要“黑社会”干啥？

在这种情况下，“黑社会”发生了分裂，原来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已经越来越少，当今存在于西方的黑社会，几乎都是走私贩毒卖淫等等，但数量已经小得可怜，而且，警方在侦破一些案件后，也几乎不用“黑社会”这种词，只是使用犯罪团伙。大概是因为，他们只是躲在暗地里犯罪的一群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号召力，也没有能力在当今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去开辟一个叫“黑社会”的阵地。

从海外华人的“黑社会”组织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在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在各种“社会”百家争鸣的时候，在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之前，“黑社会”作为“社会”的一种应运而生。没有人喜欢黑社会，但它却有在一个历史阶段内存在的必然性。

没有“黑社会”的日子一定是最黑暗的日子……

有人也许对我的“必然性”提出质疑，我想这是那些拿工资的严肃的学者们的工作，他们不妨去统计一下：当今世界上，是否有哪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黑社会这种现象？我在网络上同一位在美国访问的德国籍社会学家聊天，问了他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下说：可能有，但这样的国家政权一定不存在了。

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黑社会”的国家政权一定不会存活到今天！这就是那位德国社会学者的有点极端的结论。这位学者可能也感觉到话说过了，于是提醒我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德国：纳粹上台后，用了短短几个月，就用“严打”唱纳粹歌曲的方式，用国家权力“一统社会”，“黑社会”荡然无存的同时，连“社会”也被国家垄断和包办了……而同时期的美国，却是历史上黑社会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这样两个西方最优秀的国家，后来带给世界的后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也许有人说，这和允许“黑社会”存在没有必然的关系吧？错，不但有关系，而且有直接的关系。回顾世界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与成千上万个朝代，只有独裁专制和集权国家，才不会有“黑社会”存在。当然，就更不会有“黑社会组织”，因为，民众根本没有结社聚会的自由，何来“组织”？

中国的秦朝和后来的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只有农民起义运动），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兴起和最猖獗的时候正好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最宽松的年代。而此后中国人遭受最大灾难的时候，例如 1949 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是绝对没有任何“黑社会”组织的年代，那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法犯法、杀人放火的年代，却也是干净得连“黑社会”都没有的年代，民众只是政府的附庸，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累了就唱唱红歌……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来，那位德国大学者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对我说，不允许任何“黑社会”存在的国家，其自身政权一定不存在了，他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朝鲜等一两个国家依然存在，那里，绝对没有任何形式的“黑社会”，只有政府主导的“红社会”——问题只是，这唯一的一两个国家政权，还能存在多久？

好莱坞大片消灭不了“黑社会”

一个脑袋没有进水的人，绝对不会傻到去为“黑社会”辩护，但一个良心没有被水淹的人，却绝不能对历史与现实都视而不见。中国人始终生活在极端之中，不是把幻想中的乌托邦当成了现实，就是不得不把丑恶的现实当成了乌托邦来接受。我也想中国永远没有“黑社会”，或者这个社会里没有一点“黑”，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从三十年前的“红社会”一下子跳到当今文明国家早就拥有的公民社会，可是，在这个地球上，有哪一个国家是能够“大跃进”而成功的？“大跃进”让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还不够吗？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提到美国的黑社会，大家都想起好莱坞大片《教父》等，于是，就有了一个印象，美国的黑社会就是靠“严打”搞定的。这就大错特错了，那是好莱坞电影，不打打杀杀，能够赚你的钱吗？那么，美国的“黑社会”是如何摆平的？为什么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有历史上一度猖獗的黑社会现象？

简单一点说，美国的黑社会是被公民社会搞定的，更形象一点的说法，搞定美国黑社会的人，正好就是美国黑社会的“最大的头目”（一些美国作家讽刺语）——美国总统肯尼迪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大家大概都知道一些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丑闻吧，一个是搞女人，一个是同黑社会有瓜葛。肯尼迪和美国“黑社会”的关系一直是 FBI 关注的对象，后来的一些传记也证明，他确实和“黑社会”勾勾搭搭，不清不楚。但怎么说是他搞定黑社会的？大家看一下美国民权运动发展的历史就知道了，虽然肯尼迪总统在任内被暗杀，但他在生前开始全力支持的美国民权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在他的接班人约翰森总统任内，签署了民权法案。

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标志美国公民社会的最终形成，歧视政策不在，也是导致了今天奥巴马总统当选（他的偶像就是肯尼迪），华人最终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与权力……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击败、取代“黑社会”的典型案例。

其实，无独有偶，世界文明诸国与地区几乎都走过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日本不用说了——现在很多成为日本人骄傲的、让我们惭愧的“株式会社”当初都是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是看看台湾地区，我们大概都记得当初的“法务部长”小马哥马英九严打黑社会的事迹，其实，台湾的黑社会逐渐式微，绝对不是靠小马哥的严打，而是靠台湾公民社会的形成，尤其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彰显、司法独立的法治，小马哥只有在这个大环境下，才能展开公正公平的严打，他的“严打”是法治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法治的破坏……

没有“公民社会”的国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故事讲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否则就有点“画蛇添足”，也让编辑朋友难堪。可我还是忍不住说几句作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和负面的现象。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泥沙俱下的阴暗面？又如何去对付以至消灭这些负面的社会现象？是用开历史倒车的办法？还是认清现实，坚定信心，大步走向未来？这就不再是专家学者们的课题，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思考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选择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就拿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黑社会”现象来说，我们都想消灭这种社会的丑恶现象，但如何去消灭？是用回到过去，回到“没有黑社会”的秦皇汉武的集权专制时代？回到“阳光灿烂”的文革时代？回到不但没有“黑社会”甚至连“社会”也被国家无孔不入地侵占与腐蚀的时代？ 用 x 早请 x 示晚汇报用唱红歌的办法？用破 x 坏法 x 治精神的办法？用剥 x 夺公民权 x 利，让所有的人都重新回到一个严 x 密的“组 x 织”之下的办法？还是……

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都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社会问题要用社会来解决，“黑社会”要用公民社会来对付。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依宪法享受自由的社会，就是公民拥有民主权力的社会，就是公民享受人权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迟迟没有到来的最大原因，不是中国人愚昧落后，而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太强、太野蛮……所以我要说，用政府不受限制的权力去打压社会，去清除“黑社会”，不但无法清除“黑社会”，而且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更黑。

杨恒均 2010-7-14

参考阅读：

《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看完文强的罪证，我发现他是无辜的》
《富士康跑不了，但“国家”与“社会”在哪里》

唐人街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令我羞愧不已

中国 23 岁女留学生在纽约被一疑似醉酒的暴徒袭击、强奸和残杀，事发繁华的法拉盛唐人街附近，事后公布的录像带显示有好几位华人眼睁睁看着暴徒把中国女子拖进小巷施暴，没有阻拦，没有报警，甚至没有帮忙呼救，只是冷漠地转身离开了……

即便警方没有公布录像带，我也相信，如果当时确实有好几位目击证人，却无动于衷的话，一定是中国人，而且，我甚至可以更武断地下个判断，那些冷漠的“中国人”一定是第一代新移民，也就是说移民或者偷渡过去不久的中国大陆人。

这件事让我想起三年前在悉尼唐人街遇到的一件小事。当天我约了一位悉尼的作家在唐人街购物中心（Market City）的快餐厅见面。快餐厅 （Food Court）中午人较多，我提前赶到占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大概快到中午 12 点的时候，整个快餐厅的一百多个坐位几乎都被占了，朋友还没有来，我在喝奶茶看书……

突然听到一声惊呼，伴随着椅子擦地与摔倒的声音，我随着惊呼声与大家的目光看过去，发现一位老人家从椅子上滑到地上，旁边的老伴惊呼出声。我站了起来，朝事发地点走了几步，想看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时，整个餐厅一百多号人的注意力也都被紧紧被吸引了过去，除了零星的跑步声与询问声，一片寂静，很多食客送到一半的食物停在半空……就在这短短十几秒的时间里，一位冲上去的年轻人已经蹲在了老人家面前，好像在询问病情，以及是否需要叫救护车。另外一位跑过去的帮忙挪开了椅子，随即，那老人家好像没事一样，在第三位赶过来的青年人的帮助下，缓缓站了起来……

站起来后的老人家重新坐好，向旁边食客歉意地点了点头，用中文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清他讲什么，但从坐在他附近人听到他的话后，脸上的表情立即放松来判断，老人家没事了。随即大家都很礼貌地移开了目光，停留在空中的食物继续它们的旅程，纷纷落于众人的嘴巴中……这位中国老人家显然只是跌倒了，好在没有跌伤。我也松了一口气，准备坐下来继续悠闲地喝我的咖啡、看我的书——然而，就在我坐下前又扫了一眼大家不再注意的“现场”时，我一下子愣住了，随后，那整个中午，甚至在后来三年的时间里，只要我一想到当时的“现场”，我几乎都会立即回到“坐立不安”的反思中……

这是悉尼唐人街上最大的中餐快餐厅，当天中午这个餐厅里已经坐满了人，而这些人中至少超过五分之四是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其他人种，例如白种人或其他亚裔人。当那个老人跌倒的一瞬间，就在我转头寻找目标，站起来走近几步，想搞清楚那老人摔倒后是否会爬起来的时候，已经有至少六位年轻人从各自的座位上跳起来，第一时间冲了过去……其中三个就是我说的冲到老人身边询问他，并帮他站起来的。还有三位跑了几步，看到没事，就停了下来。

这种情况当然是经历了不到一分多钟的事件结束后我才观察到的，因为，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继续忙不迭地把食物送进嘴里的时候，那几位冲过去的年轻人开始缓缓走回自己的座位，这也就是我准备坐下时突然注意到了他们，注意，他们并不是坐得离老人家最近的，有一位甚至在我后面的座位，但他们之间有一个特征，那也是至今让我想起来还深感羞愧的特征——

除了一位之外，其他冲过去或者正在跑过去施救的五位都是年轻的白人！注意：当时坐在这个餐厅里的一百多人中只有不到二十位“外国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人），其他的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当然，很多已经是澳洲国籍的“外国人”)。而坐在那位老人附近的，几乎都是华人。更要命的是，当那位唯一一位冲过去施救的华人（从他和几位华人坐在一起判断）经过我座位回到旁边一条桌子上的时候，我从他几乎不带任何口音的英语判断，他要就是第二代移民，要就是很小就来到了澳大利亚……在这个餐厅吃饭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讲

普通话的……

中国老人从坐凳子时摔倒到爬起来，前后也就两分钟左右，我相信当时没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注意到这两分钟从四面八方冲过去的人是什么种族的。可这件事对我的冲击之大，至今让我想起来都依然会脸红。

也许我的读者会问，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写出来？原因是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少写我想不清楚的事件，更不愿意用没有答案的问题折磨我的读者。这件事如果如实写出来，如果我写出来时还没有自己的结论和观点的话，我的读者大多会得出"中国人（甚至中国这个种族）真他 M 的冷漠"的结论，这对于始终对中国人怀抱希望的我来说，是雪上加霜的羞辱。也许，那位唯一冲过去的华人给我们另外一个思考？让我们把结论换成："凡是在大陆受过教育的人都如何如何"。同样是中国人，换一种教育，换几本课本，教育出来的是不同的中国人……也许，更大的原因是：就在我为满餐厅华人都不冲过去而感到震惊的时候，我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自己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冲过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我站起来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从头到尾没有想到要走过去帮忙……

我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我当时并不常住在悉尼，来到这里，我属于不习惯环境的外国人；我坐得比较远，加上我不懂得急救知识（这个很重要，注意，前面提到的外国人上去后不是马上去扶老人，而是先询问情况，因为有些突发疾病不能立即扶起来。这显示第一个冲上去的外国青年懂得急救知识），而据我所知，当地澳洲学生，很多人都业余学过人工深呼吸等急救知识；还有一个理由，当时这个餐厅里几乎都是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坐在那两个老人周围的就有很多，我有点依赖他们……

当然，上面这些理由一条也占不住脚，那天的事实是，在一个中国人云集的地方，一位中国老人跌倒了，而冲上去施救的竟然是少有的几位白人青年。如果说三年前悉尼唐人街那间挤满华人的快餐厅带给我的是震惊与失望，那位同五位白人青年一起冲过去施救的华人小伙子毕竟还给我留下了一些希望。当然，不让我绝望的，还有我自己三年来一刻也没有消除的内心深处的深深羞愧。

也许，当大多中国人看到纽约唐人街的新闻时还能够感到愤怒、悲哀与羞愧的时候，说明我们的民族依然还有希望……

就在纽约唐人街发生那个悲剧的时候，悉尼唐人街迎来了好消息：鉴于华人把唐人街弄得热闹非凡，美味的中国食物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当地与世界各国食客，悉尼市政府决定，扩建唐人街，把附近的小巷子都弄成美食一条街……可以预见，中国人还会络绎不绝地涌向世界各地，开辟一条又一条的唐人街，向世界输出我们美味的食品，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向世人展示我们不是只顾温饱而不知廉耻的人种，也不是没有价值理念、甚至失去了道德底线的民族……？！

杨恒均 2010/5/23

揭秘西方国家比间谍更神秘的人

我先讲一下不久前美国一下子抓了十几位俄国间谍的事。我早就说过，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会有情报间谍斗争。正如只要有男人和女人存在，又一时半刻没有实现消灭家庭，以及什么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之前，很难消灭嫖娼卖淫一样。

从公开的新闻看，这次间谍案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与以往美苏、美俄之间你抓我的间谍，我就立即驱散你的外交官有所不同，俄国这一次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第二点，俄国的间谍很山寨，而且和冷战时期间谍截然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为了理想而战的意识形态战士，更不是我书中描述的“为了光明而潜伏在黑暗中”的爱国者。他们中有的为钱而战，有的纯属追求惊险刺激，有的则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沦落为“间谍”……

我在《致命弱点》里提到过一个现象：美国有两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先进的民主制度与理念，以及更加先进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美国一边向全世界推销民主制度，要全世界都学习仿效他；另一方面却竭力阻止世界各国获得美国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

我当年在美国当愤青的时候，就常常质疑美国佬：你们也知道中国现在挺穷的，搞不好民主，但你们为啥不解除对华高科技禁运，让中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中国不是更容易走上民主与自由的道路？这观点当然很幼稚，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所有先进的东西发明出来，大家都可以无条件的共享（或者都可以靠钱买得到），那么，这个世界很可能会停止发展，因为，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民族都将等着其他的人和民族为自己去发明创造。

这种情况显然没有出现，于是就有了间谍。我当然不是肯定间谍这种东西，这东西毕竟是违反文明与法治的玩意，再说，间谍并不都是用来窃取对方的科学技术为民造福的。有些国家甚至用间谍特务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大家也都注意到，凡是涉及到情报与间谍的故事，总是弄得神秘兮兮的。神秘到当有人把这个的机构的情况都泄漏出来了，却依然没有一个人相信。因为，这个神秘的机构已经让正常的人无法相信：任何一个人能够全面了解情报间谍机构，更不用说掌控了。你想，这样的机构若是掌握在邪恶政权之手，那就有得民众们受苦受难了。

所以，就在情报间谍机构让一般人觉得神秘与恐惧的同时，一些人——例如我自己——就感觉到揭露情报间谍机构的所作所为不但有必要，而且有意义。这就难怪，当我无意中了解到不少西方国家里竟然还隐藏着一群比间谍特务更神秘的人时，我忍不住有了揭秘的冲动。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他们的：他们（应该绝大多数是女性）是西方政府供养的一批专业人士，从事极其秘密的工作，其神秘程度，比西方的间谍特务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批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听说不但他们的亲戚朋友，甚至连自己的配偶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工作，他们的工资却很优厚，纳税人的钱养活着他们。

这批人更神秘的地方还表现在，迄今为止，连无孔不入、没事找事甚至造谣生事的西方媒体中的狗仔队都没有揭露过这批人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工作的具体细节。真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西方媒体可从来不会放过揭露他们政府的隐秘机构与神秘人士，以及总统的私人生活。

这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最近，一位澳洲的作家在演讲中又提到这么一群神秘的“地下工作者”对她写作的启发与鼓励，也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回国之前，我给一位澳洲朋友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找熟人介绍我去探索一下这个神秘的政府组织，我想了解一下这批政府工作人员的情况。这位澳洲人听到我对那批人的描述后，马上警觉起来，他问，你要写出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会写出来的。我加了一句，我只是好奇，因为，我很难相信，在非常注重隐私的国家，竟然有这样一种职业人，干的是这种工作……

那位澳洲朋友听后停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不愿意打听就是为了尊重和保护他们，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确实有这样一群人，应该是从福利署拿工资的……

写到这里，你一定以为我在装设弄鬼、故作神秘吧，其实，我一边写一边在思考，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他们是干什么的？最后我想，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每一次想起这样一群工作在隐蔽战线的人，我都挺感动的，有一次连眼睛都湿润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我一样生下来就四肢发达、健康完整，加上另外一些人因为后天的疾病与不幸的事故造成的，于是，在这同一个世界里就有了很多肢体残缺的“不方便人士”，有的坐轮椅，有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有的只能完成简单的动作……可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却和我们一样拥有健康的大脑，拥有对生活的热情与欲望……

这些人也会在政府与社会的帮助下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大多也是“不方便人士”），也会结婚组成家庭，也会享受天伦之乐——然而，有一些身体极度残障的人士，却不知道如何去做爱，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他们想要享受的性爱行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这一辈子也可能无法享受我们每一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天伦之乐……

现在你知道我说的最神秘的地下工作者、无名英雄干的是什么工作了吧？是的，他们（她们）就是被政府福利部门培训后秘密分派到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残障人士家庭，指引这些“不方便人士”如何做爱，在必要的时候，还会亲自扶着他们、抱着他们，协助他们完成……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比西方国家里间谍更神秘的一群人的故事，也许你会抱怨写惊险间谍小说的杨恒均怎么会用这个故事来糊弄你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可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写出来的。对于我这个喜欢揭秘的间谍小说作家，上面这种“国家机密”不是用来揭露，而是需要去捍卫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情报间谍故事更神秘也更神圣的故事。而且我坚信，当一个国家开始高薪养活这样一批“秘密工作者”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依靠情报间谍机构的需求会大大减少，尤其不再需要那么多间谍特务去对付自己的国民……

杨恒均 2010-7-7 香港

执政党为自保，用“党内民主”换掉总理

今天早上起床，吃早餐的时候顺手打开电视机，看到澳洲总理陆克文正在主持一个党内选举的会议。因为要去唐人街会朋友，匆匆吃罢早餐后我走进房间换了一条裤子，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拿起遥控器关电视机时却瞥见屏幕上换上了陆克文的副手茱莉亚.吉拉德讲话，下面打出的字幕竟然是：澳洲新总理茱莉亚.吉拉德。

我大吃一惊，原来在我换一条裤子的时间里，澳洲竟然换了一个总理，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60 后，没有结过婚，目前和男友同居……^_^

我换了一条裤子而错过了澳洲政坛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刻。澳洲实行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不同，四年一次的大选，选的是执政党而不是最高领导人。澳洲的总理职务是由选举上台的执政党党魁出任的。

像今天这种情况很少见，那就是执政党搞了一次“党内民主”，把党魁给换掉了，按照法律，也换掉了澳洲的总理。我出门的时候，在火车上，在街道咖啡厅里，听到很多澳洲人在谈论这件事，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议论同事身上穿的一条新牛仔裤似的……

工党这样做其实也是冒一定风险的，2007 年的时候，大家选你这个党执政，很选民可能也因为同时看好陆克文这个人。当然，工党大佬们换掉了陆克文的理由也是为了今年十月份的澳洲大选，他们声称，如果让陆克文继续当党魁，工党有可能在十月份选举中失去执政党的地位，那时，总理职位就是人家的了。

澳洲大多媒体也是这样议论的。我一直对澳洲的政治没什么兴趣，可既然正好碰上了如此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也就多看了几眼新闻，心中免不了生出疑问。这两年陆克文的民调都居高不下，高得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虽然最近跌得厉害，可仍然高于在野党推出的候选人。而且，离大选还有好几个月，作为总理，陆克文争取连任的机会还很大。可他的党说他“独裁”，不和党内大佬商量而做出一些决定，破坏了常规和游戏规则，于是就把他给提前“民主”掉了……

我一直对西方民主产生的政治人物有兴趣，在研究他们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归类。例如，我按年龄、出身和性格、行为方式等把陆克文、奥巴马归成一类领导人。他们出身普通（甚至底层贫困）家庭，野心勃勃，靠奋斗爬到最高位置；他们始终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内心时常愤怒，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不满，对底层民众生活熟悉，而且常常想打破常规帮助民众做一些事；他们的激情、能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常常让他们大起大落，民调也像过山车一样……

虽然从来没有深入研究澳洲政治，可政治直觉告诉我，陆克文下台和他的这种性格有直接关系。目前最明显的原因是他坚持要征收高达 40%的矿业暴利税。大家想一下，矿产资源可是澳洲的大产业，澳洲很多大富翁都是矿业巨子。陆克文要征收矿业暴利税，首先得罪的是谁？当然是澳洲最富有的那个阶层。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估计用来倒陆克文的钱绝对不会少。

大家再想一下，澳洲是高福利国家，征收的这些税收最终会用在哪里？相当一部分会成为福

利，用到穷人和普通人身上。所以，如果等到十月份选举，即便陆克文执意要征矿业暴利税，他仍然可能连任。可是，谁让他得罪了澳洲最富有的那批人？他得罪得起，他的党也得罪不起啊。于是，工党的大佬们联合起来，逼迫陆克文今天临时举行“党内民主”选举会，把他自己给选掉了。

我这里只是挑选一个突出的问题，简单议论两句，政治当然不会如此简单。每一个执政者都有失误，但如果陆克文所在体制和美国是一样的，这些失误绝对不会让他失去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更何况，陆克文在位短短几年，干了很多了不起的好事，例如，他是澳洲第一个向原著民说“对不起”的总理，他带领澳洲人走出了金融危机，他比较草根，对富人征税，有可能用于相对不富裕的澳洲人……

也许有人说，陆克文的下台，难道不说明西方的民主是富人的钞票操控的？问题在于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例如，澳洲人当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不是“矿业巨子”，可所有的澳洲人都对政府加税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有天生的反感。你今天可以对澳洲矿业征收暴利税，明天也可以对其他行业征税啊。福利往往帮助的是低收入人群，而在澳洲社会里，中产阶级才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最害怕的是加税。

我再以奥巴马作为例子。美国的总统制不可能让奥巴马中途下台（如果他不违反宪法的话），可是，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从奥巴马去年的表现看，他真有可能只干一届就得搬出白宫，去找新地方住。他和陆克文上台后的民调都像过山车一样，高得吓人，跌得可怕。

奥巴马上台两年折腾最成多的是全民医保，现在总算向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大家可能纳闷，美国有四千多万没有医保的人，奥巴马的医保改革，让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受益，为什么他的前任搞了大半个世纪都不能成功，而他在几乎要成功的时候，民调竟然会跌得如此之低呢？

大家看一下，他推行医保都得罪的那些人：全美的保险公司和美国商会。你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吗？在奥巴马搞医保改革的去年，全美商会仅仅一年就花了一亿四千五百万美金，专门和奥巴马作对；而保险公司每天都花费一百四十万美元反对奥巴马的政改方案——所以啊，各位，你在网络上看到的辱骂奥巴马是希特勒和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很可能是美国“五毛党”（五毛美元啊）写的。

也许又有人要质疑，奥巴马为穷人着想，要搞全民医保，为啥民调（选票在平时的表现形式）如此之低？

我不说得太复杂，简单一点：你看到了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可你看到了比这个三千二百万低收入要多得多的近两个亿的美国人没有？他们靠勤劳致富，靠自己的辛苦赚来的钱购买了医疗保险，结果，你奥巴马一上台，就把那些没有医保的穷人也“医保”了，请问，这些为数更多的将近两个亿的美国“富人”，他们心理能平衡吗？会不会有人从此再也不想出去工作了，等着你奥巴马来“医保”呢？

当然，又有人来质疑了：这样说，资本主义的穷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份，比我们富士康的工人还惨？你正好又错了，澳大利亚始终是高福利国家，这个国家的穷人是世界各国穷人中过得最舒服的。而在美国，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毕竟获得了通过……

哎呀，你杨恒均到底想说啥呢？——糟糕，各位，这篇文章已经写了两个半小时，可我始终不知道如何结尾。所以，今天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来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请大家结合我前面写的六论民主，特别记住我强调的“钞票与选票的博弈”、“民主理念”与“游戏规则”这几点，畅所欲言，给我写信，也可以在文章后面留言。

如果你能够写出令我满意的结论，下次你到澳洲旅游时，我会给你一个惊喜——我带你去找澳洲总理茱莉亚.吉拉德的同居男朋友，让他给你洗头、理发……

【后记：原澳洲副总理，现任澳洲新总理茱莉亚.吉拉德同居的男友是一位理发师。大家知道，这位理发师即便荣升为“第一家庭”的“第一先生”——错了，应该是“第一男朋友”，在澳洲这种民主国家，估计他还得继续给人理发维持家用。本人正在打听他在哪个理发店工作，等你到澳洲时，我带你去……O(∩_∩)O 哈哈~】

杨恒均 《论民主》系列之七 2010/6/25

后记

这本书终于出了……我说这本书，而不说《家国天下》，是因为她曾经有好几个名字，有些名字已经被印上了封面，可千呼万唤，始终出不来，不是流产，就是夭折。当世界知识出版社把书名最终定为《家国天下》并决意推出的时候，我愣了一下，这本书的名字不够生猛，但出版社劲头十足。

“家国天下”的四个字概括了我写作的历程。我写作的源泉就来自于“家”，我最早的文字也是写家的，直到今天，每当我和读者讨论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宏大的议题时，也常常离不开“家”。父亲是 1949 年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担惊受怕了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远走高飞到国外，所以 1983 年选择大学志愿时，他只挑前面带“世界”与“国际”字眼的，于是我进入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当时那个专业是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国防与安全培养人才的，一旦毕业分配进入那些单位，可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

父亲教我读书、识人、看社会，我早先的观点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当了一辈子的妇产科医生，但质朴的她，却以自己勤劳、清白与正直的一生教会了儿子如何做人。在我决定放弃很多而投身写作之后，遇到了很多艰难与白眼，在众多的支持者中，母亲弱小的身子支撑起了我的精神家园。母亲去世前一年，用一只放大镜阅读儿子文字的镜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她那有些歪斜的留言“如果在政人员看了，可能有帮助，对人民有好处……”依然感动和激励着我。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也献给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我不可能走这么远一段路而依然挺立。我也要感谢无数支持我的网友，尤其是那些义务为我管理博客与传播文章的朋友，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是连接我们的纽带。

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我是一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民族主义者。对于我来说，热爱中国不但不和我的民主追求相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当大学毕业后为中国外交与安全工作的时候，我热爱这个国家；当身负重任远赴重洋为国家工作的时候，我热爱这个国家；当我走遍天下再回到故土并为建设民主与法治而写作的时候，我更加热爱这个国家……

在我 45 岁的生命中，除了家人与朋友，那无数的老师和长辈，给了我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从我工作的第一天起，我的领导和单位的前辈，一直对我照顾有加；当我开始写作时，又认识了如袁伟时、沙叶新、鄢烈山、冯崇义等等老师，我当然不敢说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我能够写出拥有很多读者的文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我尊崇的老师们的著作，铺起了我进步的阶梯。谢谢你们！

另外要感谢的，还有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的几位朋友，特别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叶青女士和《世界华人周刊》的张辉兄，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本书。也感谢过去两年里，先后同我签过出书合同的数十家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能够标出价格出售的书，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没有出版，但你们对我文字的高度评价，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谢谢你们。

更要感谢的是无数个遍布世界各地的读者，过去这么多年，无论在天涯海角，我们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咫尺天涯，同呼吸共命运，你们的每一个留言，每一个点击，都让我看到了希望，也给了我勇气。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能够一起走过。

杨恒均

2010 年 11 月 23 日